

炎黄春秋

■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 我与前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论争

■ 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

■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 不能忘记的新启蒙

目 录

春 秋 笔

- 1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余焕椿

[附录] 李维汉谈话 汪子嵩 宁培芬 记录整理

- 6 我与前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论争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 吴 江

一 家 言

- 11 不能忘记的新启蒙 李慎之

- 16 舆论监督的回顾与探讨 孙旭培

英 杰 谱

- 20 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 朱 楹 熊铮彦

沉 思 录

- 26 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 杜导正

求 实 篇

- 28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许人俊

亲 历 记

- 33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 赵发生

- 39 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冯兰瑞

遗 闻 录

- 42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迟泽厚

时 代 风

- 50 王众托院士和他的“元决策” 张天来

人 海 浪

- 55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王炳根

- 58 台湾女作家苏雪林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傅宁军

- 60 用草制云丝的女专家酆云鹤 罗先哲

人 物 志

- 64 平津保军事斗争中的“怪胎”王凤岗 李 克

文 荟 园

- 68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改革楚剧 刘作忠

- 70 西南联大民主精神长存 张 彦

- 72 《温济泽纪念文集》出版记 杨兆麟

- 74 漫画家张诤的战斗人生 黎 辛

古 镜 台

- 79 汉代张释之断案不唯王命 江仁宝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杜润生 任仲夷
周 惠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 健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锲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范敬宜 凌 云
曾彦修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 (法人代表): 杜导正

副 社 长:

方 实 宋文茂 徐 孔 程理嘉

执 行 主 编: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编辑室主任: 赵友慈

办公室主任: 郝爱存

理 事 长: 杜导正

副 理 事 长: 陈 渊

理 事 单 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
有限公司

秘 书 长: 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 100045

电 话: 68532569 68534879 68532048

印 刷: 唐山市润丰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总公司
(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 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 址: 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 版 日 期: 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 价: 4.80元

李维汉痛定思痛疾呼反封建

● 余焕椿

反封建主义,自五四以来已有 80 年的历史。五四的科学民主精神,曾使中国革命排除千难万险,取得辉煌胜利。但是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 1957 年反右后,为什么又渐渐丢掉了科学与民主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对封建主义任务没有完成。家长制、一言堂、任人唯亲、个人崇拜等封建主义的东西,阴魂不散,终于导致“文革”十年封建主义复辟。

“文革”使许多人上当受骗,吃尽了苦头,但也大大提高了人们的觉悟,开始懂得了消灭封建残余影响,对中国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对中国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远影响。《人民日报》在这方面曾经十分投入,发表过许多有分量的文章,做了不少工作。但问题并不简单,维护封建残余势力的人,他们还有力量,还能够一次次地制造障碍。已故历史学家黎澍曾指出:“不重视有两千年历史的封建传统文化的批判,不坚决清除旧制度的残余,片面强调‘批判资产阶级’,特别是批判所谓‘党内资产阶级’,其结果必然是封建势力乘机在各个方面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死灰复燃,暗中取代社会主义,还要冒充是最革命的。”(《历史研究》,1979 年第 1 期)所以,不反对封建主义,就发扬不了科学与民主精神,没有科学与民主精神,也就建设不成社会主义。

在反封建问题上,《人民日报》曾受到过很大压力。先是某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出面阻止,后是中宣部一位负责人出面干预。这位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说:目前不要单独提反封建主义,还是提反对封建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现在民主革命胜利已经那么多年了,宣传战线的任务反成了反封建,不合乎实际。

刚刚兴起的反封建宣传,就这样被压下去了。编辑部感到一些“理论家、政治家”又要用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来衡量新时期的新实践了,凡事都要问一下是姓“社”还是姓“资”。

为了把反对封建主义宣传继续下去,编辑部积极地寻找新的突破口。不久,报社获悉李维汉同志同邓小平同志有一次非常重要的谈话,话题正是反封建,而且引起了邓小平的重视。报社获知这一消息,决定派懂理论的资深记者访问李维汉,以图扭转局面。第一次采访在李维汉家中,担当起此任务的是原理论部副主任、哲学家汪子嵩教授和原理论部主任编辑、历史学家宁培芬女士。

访问时,李维汉先是惊讶,说他“同邓小平两人讲的事情,你们怎么知道”?继而说,“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只有邓小平比较合适”。接下来谈了很长一篇话。

李维汉说,“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反帝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没有继续进行下去”。他说,这个问题,几个领袖人物包括毛泽东都没有解决。家长制、等级制、终身制、特权、特殊化、派性、个人崇拜,这些封建主义的东西,在“文革”中“是一次大暴露”,“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李维汉还说,林彪、“四人帮”“他们的纲领、口号是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

第二次采访在北京医院,汪子嵩带刚到报社的年轻人张书林(现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主任)一同前往,这次主要是探视,李维汉在病榻上回答了他们提出的几个问题。

1980 年 8 月 18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

上作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的报告，其中有一部分专门讲肃清封建主义残余问题，邓小平说：“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邓小平文选》296页）这个报告与李维汉这次谈话有密切的关系。李维汉出席了这次政治局扩大会，他在8月19日的发言中说，“我曾向小平同志建议，要补上反封建主义思想这一课，并且由他来补。”现在他补了，“我拥护小平同志的报告。这个报告，总结了我们30年来作为执政党的经验教训，有理论，有实际，讲得很好。”

[附 录]

李维汉同志谈话

汪子嵩 宁培芬记录整理

时间：1980年6月19日上午

地点：李维汉家中

你们要我写文章，我不能写。现在由我来写这样的文章，是不得体的。我是向小平同志建议，希望他出来带个头，只有他比较最合适。我向秘书讲过，这个问题是不能谈的。你们从哪里知道的？中宣部传达了？我和小平同志只有两个人谈，是他说出去的？这两天都有人来找我谈这个问题。

我认为反封建的问题是党和国家带根本性的问题。从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到五中全会的决议，我都是拥护的。但有些问题实在想不通。为什么毛主席到晚年会造成这样大的悲剧，走向自己的反面？这问题怎样解释？我解释不了。还有，周总理也是悲剧呀！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说，他只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自己说的这个话。他作了斗争，对林彪、“四人帮”进行了抵制，使党

采访结束时，李维汉重申，他不能写这样的文章，他说他没有这个权威，只有邓小平最合适。但李维汉所谈问题的深度和权威性，是无庸置疑的。编辑部根据所谈情况，整理了一份访谈录，争取公开发表，但因种种原因，终未实现。

最近，我去看望采访者之一的汪子嵩教授，同他谈起了这篇访谈录，他为当时未能发表而深感惋惜。他说，李维汉所谈内容十分重要，现在仍有重要现实意义，可惜现在连底稿都找不到了。我说我有同感，我正是为此而来的。我告诉他我保存有一份他亲笔写的原稿，希望他同意，不加任何修饰将它呈现给读者。他高兴地同意了。

下面就是这篇尘封20多年的访谈录的全文。

和国家没有完蛋，他有功劳。但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有两方面，一方面是他进行了抵制、斗争；另一方面，用一句不好听的话说，又是他效愚忠。我慢慢地想到这个问题上，觉得有许多问题。

我们的民主革命是要反帝反封建。反对帝国主义做得比较彻底，而反封建却只做了一半，而且是比较容易的一半。我们用武装斗争解决了问题，人民政权取代了旧政权，改变了所有制，这些都做到了。但革命却也到此为止，没有继续下去。现在说阶级已经消灭，不再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好像肯定反封建任务已经完成了。实际上怎样？共产党应该与过去彻底决裂，做到了没有？没有。我们是革命战争胜利了，这方面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当然，那时候我们很忙，战争刚结束就抗美援朝，又要搞向社会主义过渡，那时不过渡要犯错误。

毛主席接触了封建主义没有？接触了。在毛选四卷中他个别地零星地把问题提出来了，可是又放下了。这也有个历史原因，那时一个战争接

着一个战争,不打行吗?毛主席对于革命战争是非常熟悉的。他是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这是没有问题的。毛主席在农民运动中提到要反对四权——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但他提过后也就丢开了。这里面有历史的条件,也有认识的原因,他个人的原因。在民主革命阶段对他提出过分的要求是不对的,但后来的发展就不同了。



李维汉和邓小平在政协会议上(1981年)

此外的几个领袖的情况,少奇同志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我没有全看他的著作,是从他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引起来的。这篇文章,三九年在延安发表时,我是同意的。现在看,这篇文章应该是给年轻的党员看的吧。老家伙有没有人再拿它作镜子对照自己的呢?对年轻一代,他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这五个人的话,一共17处,而引证孔孟两个人,倒有15次,什么“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什么“慎独”,全引上了。为什么要引证这些?青年又不熟悉这些,还不要去翻书,翻论语,孟子,钻到孔孟中去了。少奇同志大概没有想这个问题,他确实读过这些书,我也读过,不过没他那么熟。马恩列斯毛五个人引了17条,孔孟两个人引了15条,分量就相当重了。周总理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产生悲剧。总司令的文章,我没有注意查。

总之,从历史上说留下了这么个大问题,是不是?

现在看,是不是家长制、等级制,等级很严,真是严得很。北京医院的这座楼,是高级病房,里面还有等级。每层有两个大房间,只有政治局委员、副委员长、副总理才能住,没有人就让它空在那里。前两天要我搬去住,我不住。七五年我被下放在××,那里也造了个楼,真了不起,楼堂馆所,

虽然禁止搞这个,实际上是从中央开始搞起来的。这里有个病人,病得很严重,有人陪他,几个人住在一间,为什么不放到那间大的去?所以,我没有接受搬过去。看着总是有点儿不顺眼。为什么车子、座位,都有等级森严,很周到,哪个地方都能看到。资本主义国家是不是这样的?他们是谁有钱就能住,这就不叫等级。

还有终身制,现在中央要改,看来是很难很难。这是长期积累下来的。家长制很厉害,从上到下,公社书记、大队长可以打社员,这难道是剥削剩余价值吗?不是的,这不是资本主义类型的。

现在中央许多政策为什么不容易落实?就是有些人在那里阻挠。我们当初革命时有什么等级?在白区工作从来没有想到书记和别人有什么不同,我当过两任省委书记,从来没有想到要做到老,那时候是连头都保不住的。反正这都是渐渐积累起来的。还有特权、特殊化,派性。派性,文化大革命中表现出来的那种派性,资产阶级有没有这样的?那是封建宗法性的,是流氓无产阶级的,是青红帮的派性,很多是封建性的。小资产阶级闹事,自己想称王称霸,农民起义,最后想自己做皇帝,洪秀全是这样,陈胜吴广,推翻了一个皇帝,自己做过皇帝,朱元璋也是这样。斯大林说过:“农民反对地主,拥护皇帝”,这句话是马克思主义的,我看就是这样。

还有个人崇拜。我曾在一个会上讲话,说:封

建时代、帝王时代留下庙宇遍天下,我们不要到将来,搞成纪念馆遍天下。毛主席的纪念馆不少了,现在不香了,仿佛一切错误都是他的,正确的都归于另一个人,又搞他的。

你们知不知道,现在周总理都变成神话了?有个电视剧,写一个男孩儿一个女孩儿,一面叫“周爷爷你在哪里?”一面往上爬,爬到山顶,周总理果然出现了。现在关于周总理的高楼大厦已经不少了,有些不用他的名义,用八路军办事处的名义。搞了自己面上有光,不搞别人有话。前几天有个同志来找我,他是在周总理身边工作的,热心搞纪念馆。是不是武汉、桂林、重庆都要搞?他说是进行传统教育。我说,周总理在世时,几次都不许修他老家的房屋。周总理的一生都是朴素的,为什么不拿这点去进行教育,而拿高楼大厦去纪念他?这是拔高他,还是贬低他?

现在写小说,写传记,这种个人崇拜不少,有些人有点联系就夸张起来,有的是莫须有的,也要搞点联系。为什么要这样搞?写个烈士,一定要写得从小就是神童。毛主席说过:金无足金,人无完人。有人总要把领袖人物写成完人,硬找些联系,有人将二十年代的烈士写成紧跟毛主席路线的,那时候怎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我认为关于杨开慧的戏不是好戏,还有电影《北斗》,你们看了没有?关于领袖人物,要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和党的领导的关系;二是和群众的关系;还有他自己,还有个单位,和集体的关系。看他如何处理这三个关系。总之,现在个人的英雄到处是。

有个问题很值得深思。最近安徽张劲夫同志乘汽车出去,路上遇到一个女病人,他下车让了车子。那地方的群众传颂很广,新华社发了通稿,《人民日报》也登了。这在共产党,本来是一件很平凡的事情,群众为什么这样称颂呢?因为多少年了,群众遇不到这样的事情。当年打仗的时候这样的事情是很起码的,这很值得我们去深深想一想。为什么这样?不是偶然的。这样的事情报上登是可以的,这是一种社会的反映;但值得我们深思。这样的事情不以为奇,很值得我们想一想。

上面这些问题不是一天发生出来的。像个人崇拜是长期积累出来的,毛主席自己也反对过个人崇拜,一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中

不是写上了的吗?可是后来自己也搞了。搞家长制,对人家的一点不同意见都不能容忍,发展到这样的悲剧。把那么多人都关起来,毛主席不点头能行吗?实在是家长制,一言堂。是不是他自己想这样搞呢?这是事实上中国革命搞起来的。革命遇到那么多失败,是遵义会议才改变了情况。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写的诗中有一句“而今迈步从头越”,我是这样理解这句诗的,就是说现在革命要从头做起。威信是一天天积累起来的,是很自然的,党没有一个有权威的领袖行吗?这是从遵义会议走过来的。但是,真理如果过了头,就变成荒谬。这里面当然也有他个人的作用。

文化大革命彻底地深刻地暴露了封建主义对我们党的侵蚀,这是从各个方面都表现出来的大暴露。林彪、“四人帮”的纲领口号是批判唯生产力论等极左的东西,手段是封建法西斯主义。有些文章简单化地说他们是极左,就把他们那个封建的东西掩盖起来了。他们的目的,是要回到封建法西斯专政去,这是很明确的。不是说“打着毛主席的旗子,打击毛主席的力量”吗?说得很对。这是所谓“五七一工程纪要”上的话,那个东西究竟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四人帮”为了摆脱自己和林彪的关系而造出来的?

老人家原来搞理论和实际结合,后来被人包围、割断了,完全走上自己的反面,是个很大的悲剧。小平同志主张维护这面旗子,这是正确的,但要维护这面旗子,还要做很多工作。我想要兴无灭封,这是主要的。只有和封建思想决裂,无产阶级思想才能上升。无产阶级要有权威,所以我要求小平同志出来带这个头。现在说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的体系,但这个科学体系中缺少了反封建这一方面,现在要加以补充。毛主席清算洋教条,很早就讲反对本本主义,他在山沟中取得胜利。王明路线说山沟里没有马列主义,把他推翻了,遵义会议才改回来。后来,毛主席又花了十年功夫,在哲学、政治、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彻底清算教条主义,有破有立,树立起正确的东西。一直到1957年在《夏季形势》中提出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这是顶峰,到这里就走下坡路了,慢慢走

向反面。有的文件中说这是因为骄傲起来了,这是个理由,但不是个人的骄傲。对于个人迷信,我常对人说,为了要说服人,我有。我当然不是“四人帮”,也不是“凡是派”,但也有个人迷信,我也包括在里面。这是在党内,社会上都有基础的,不能怪他个人。周总理就是个个人崇拜的典型,发展到知道是错误也跟。党内有这个基础。我原来反对过他,后来承认他正确,以至于遇到了问题,就希望他说一句话。这有社会基础,不能简单归于个人,因此这问题就严重了。现在有人说这一切都是他的错误,这也不对。这几年大量的文章,把一个人从小到老、从上到下都说成是圣人。我提过意见,看来中央也没有办法解决。人民日报的文章是不是也要好好考虑一下,有没有看人说话的?我看是有的,看人,看政治气候来抬高或贬低,肯定或否定。

上面讲到毛主席反洋教条,但对封建主义没有碰。封建主义侵蚀党很厉害,你们信不信?可以到各方面去看一看,是不是相当严重、普遍?为什么中央的政策不能落实?因为有些人他手中有权。“四人帮”宣传法家,韩非讲“权、术、势”三个字。要有权,有势,还要有术,就是权术。林彪、“四人帮”他们,军队要掌握在自己手里,要夺权,夺取最高的权,还要集中在一个人手里,还要耍一些手段。文化大革命中这三者都有,相当厉害,也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无论党政军各方面都受侵蚀很厉害。这些问题我回答不了,我想这个问题,所以去找小平同志。

修纪念馆,我认为南京雨花台应该大修,蒋介石统治了那么多年,那里死了多少人?现在是无名英雄没有人管,我到处提倡,希望报纸杂志要给无名英雄一个位置,小的也好。你们说好不好?好是好,就是谁都不干。这些烈士可以写,几千字不行,几百、几十字总可以吧。我就知道白洋淀有个烈士碑,还有青岛四方有个烈士碑,别的地方也还有。报刊上登一下,那地方的群众看了,说不忘记我们这地方烈士也流过血,就起很好的作用。《人民日报》如果能开这个天窗,我就高呼万岁!你登了一篇,人家就送稿子来了,这个传统教育不深刻吗?对毛主席搞这么大的纪念堂,最近我才知道,北京医院对面的两个大楼是专为纪念堂迎宾用的。那么多外国人来,毛主席的像的

脚这么摆(右腿搁在左腿上),不是那么摆(两腿并摆),为什么不能对人家礼貌一点?马克思现在有几个纪念的地方?恩格斯有没有纪念馆?我不知道。列宁有个遗体,建了个墓。毛主席曾经要大家签过字,死后都要火葬,当时他是注意这个问题的。现在怪谁,怪毛主席吗?现在的纪念堂不是已经超过了列宁的吗?

外国人也在这方面投我所好,他要和我们做生意,所以也替我们搞。如果中国自己不搞这个,他才不会搞呢。《人民日报》登过一篇巴黎纪念点的文章,那个地方其实我也住过,二四年周总理住过,赵世炎也住过。周总理是好总理,不是要贬低他,问题是我们要按历史唯物主义来看问题,对不对?《人民日报》第一篇报道的是事实,但过了几天又发表了篇文章,是根据日本人说的,说周总理和蔡和森在那里建立了共产党,没有那回事,是虚构!日本人为了赚钱,就乱编,可是党报登了,人家就当真的了,其实这是神话。

有人写回忆录也是这样,抬高别人,自己沾了光。有的是无意的,有的是有意的。编辑这样做是无意的,有人却是有意的,搞个人的东西,利用个人崇拜。“四人帮”利用了封建传统,家长制,好处是充分暴露了。没有“四人帮”也不行,像我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感觉。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现在是我们怎样去看这些问题。

我和小平同志谈的就是这些,我连提纲都没有写,想到什么就谈什么,今天还比较系统一些。

现在要我写文章还不能写,我还要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既然你们赞成我的意见,就希望小平同志出来说话。你们回去告诉胡绩伟同志,现在不要我们写文章,将来可以写,现在他要去胡乔木同志的工作,你们自己也可以找小平同志谈,去发动小平同志来带这个头。我们总得有个领袖,有个权威嘛。我是这样想的:八月份有两个大会,人代会小平同志不好去讲,可是他是政协主席,在政协开会时他讲一下反封建问题,作为文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带回去学习、讨论、酝酿,在历史问题决议中写上,党章也要写一段反封建的,在修改党章报告中再专门讲一段,就可以写进十二大决议中,就成为全党、全国人民通过的决议,就好办了,是不是?

我与前南共领导人卡德尔的论争

——关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关系问题

● 吴 江

在我的写作生涯中，有一件憾事，回想起来愈益感到放不下，觉得必须写点东西作一个清算和了断。那就是当年撰文批判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领导人卡德尔，批驳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中提出的关于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以及关于“共处”问题的看法。卡德尔的某些看法虽也有失当和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当时提出这些问题来让人思考是有益的，同时这也是各国党的自由权利，对错都是各国自己的事。何况，卡德尔在他的书中在不少地方表现出南共独具的见解，尤其对于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说了一些颇为尖锐的话。但当时我国正处于“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批判“修正主义”时期。按常例，凡属党与党之间的争论文章都出于领导授意集体写作，以党报社论或编辑部名义发表。唯独我这篇文章不是奉命之作，纯属个人创作、个人署名发表。此文题为《我们的时代和卡德尔的辩证法》，以学术论文形式，从“左”的方面对卡德尔书中的观点持过分批判的态度。写此文的时间是1962年初，即还在公开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即“九评”）之前。特别要指出，这篇文章除发表在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1962年第5期）上外，还由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特批印发给中国各驻外使馆作为宣传材料之用，这就在更大范围内产生了影响。

论争的缘由

这个问题，要从当时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特别是苏联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之间的关系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地区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首先是东欧地区几个国家由苏联红军从德国法西斯占领下解放出来，其中只有南斯拉夫是独立进行武装斗争并趁苏联红军发动攻势时自行挣脱敌人的统治、获得国家独立

的。这些国家相继成立自己的共和国而被苏联划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并驻扎红军(除南斯拉夫外)。苏联为了控制这个地区,于1947年9月成立“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形同一个小“共产国际”,并要求这些国家按照苏联的模式改造自己。南斯拉夫是苏联地缘政治(空间)的重要资源,但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却试图按自己的国情独立走自己的路,因此激怒了斯大林,很快便与苏联闹翻,并于1948年6月被开除出“情报局”,罪名是“反苏”,搞“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这时中国共产党也作出谴责南共的决议,并由刘少奇撰写《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一文。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包含着许多在其后暴露出来的各方面的后遗症及其深远影响。后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在革命胜利后立即采取“一边倒”政策并接受所谓“两个市场”(社会主义市场和资本主义市场)的理论,虽说主要决定于当时的国际大环境和美国对中国的封锁,但说到底,苏联采取严厉惩治南斯拉夫的措施对中国也不无影响。而从长远看,这恰是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使一个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先进科学技术相隔绝。

南共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以坚毅的精神探索着自己的路。在社会主义国家阵营全面封锁之下,南首先大胆向西方国家开放,改革从苏联搬来

的一些模式,实行生产资料社会化,不搞集体农场,特别试行市场社会主义经济,通过工人自治实现经济民主。南斯拉夫可说是首先实行对外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打交道,输出劳力,引进外资,主要是美国资本,所以当时被诬为“接受美援”,背叛社会主义。(其时中国却正以“内无内债,外无外债”自夸)实际上,这正是当年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所追求的目标之一。至于美国有自己的打算,这是不言而喻的。南斯拉夫的所作所为,很快便得到了回报。据一些外国学者记载,1950年南斯拉夫还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而从1952年起其面貌迅速改变。60年代,南斯拉夫的经济增长率居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首,国民收入在当时低中等收入的国家中也名居前列;公民可以自由到国外旅游或寻找职业而不受限制。但也有一种说法,说南是“民富国穷”,这大概是因为国家缺少大企业支撑和国税来源不足之故。但是只要老百姓富裕了,高兴了,这就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于1954年向有关社会主义国家建议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次年,中国与南斯拉夫建交。1957年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南共参加了会议,但是拒绝在会议声明上签字(毛泽东进行说服也不成功)。1958年4月南共召开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反映南共对国际形

势的看法(主要是不同意“两个阵营”的提法而将自己置身于“阵营”之外)和它的内外政策的纲领。1960年莫斯科又召开了一次没有南共参加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发表了《莫斯科声明》,对南共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其对外政策进行了批判。但这时中苏矛盾也开始显现出来了,原因是赫鲁晓夫露骨地将大国沙文主义加到中国头上,甚至以反美为名企图侵害中国的主权。于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复杂起来。1958年5月5日中国《人民日报》发表了《现代修正主义必须批判》一文,实际上批判的矛头是指向苏共,但却将南共作为公开批判的靶子。这就是1962年我撰写《我们的时代和卡德尔的辩证法》一文的历史背景。

论争的内容

1960年8月,南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和主要理论家卡德尔,撰写了《社会主义与战争》一书,这书是用来解释南共制定的纲领的,有的地方直接回敬中国的批评。其中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看法,以及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关系的看法。作为对南共纲领的说明,其所表述的是一般学术问题,但却用了大量的哲学解释,其观点大致可以概括如下:

今天由于社会的对比,世界正从两方面发生变化:“资本主义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变化,社会主义也在很多方面

发生了变化”。

关于资本主义的变化,该书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在许多国家的新胜利和殖民体系的瓦解,由于工人阶级日益增强的影响,已“引起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改变”,资本主义“不断向工人阶级妥协和让步”。

资本主义的最大变化,“主要表现为国家资本主义倾向的加强”。由于工人阶级的压力 and 经济发展本身的压力,“引导社会将某些社会经济职能和生产资料日益国家化”,“由于私人资本转给国家的某些经济职能愈多,经济中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压力就愈大”(《纲领》草案修改稿专门指出,经济中新的社会物质因素“就其客观倾向来说是社会主义的”)。

因此结论是:国家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典型特征”,“资本主义蓬勃发展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极其明显地证明: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避免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

这些有什么问题没有呢?不错,即使在今天来看也可以说,把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卡德尔也说明这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义语)看作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典型特征”(按:而不是为社会主义过渡准备经济物质条件),尤其说今天“人类正在通过各种途径不可避免

地深深地进入了社会主义时代”,这种估计是明显地夸大了的,与实际情况不符。但是,今天我必须郑重声明:当年我们把这种见解看作是典型的“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加以批判是不公正的。谁都不能保证对国际形势的估计完全准确。马克思曾经估计“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响了”;列宁也曾经将帝国主义即国家垄断资本看作是“垂死的资本主义”,因此认定“世界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了”。这些也都已证明与实际情况不符。何况,在二次大战以后,五六十年代,世界(主要是西欧)资本主义正处在恢复、调整、改革的阶段,为了挽救资本主义的危局,其国家经济职能确有所增长,有的甚至还仿效社会主义的国有化和计划化做法。由于工人阶级的压力和某些社会民主党、工会等左翼政党执政时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个时期实施了资本的高额累进税和高额遗产税(注意:资本主义国家征收高额累进所得税已和《共产党宣言》提出的主张相符,而征收高额遗产税则比《宣言》主张废除遗产继承权要宽容些),以及实施社会保障制度和福利政策,以至出现“福利国家”现象,确使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局势得以稳定下来,经济迅速恢复并发展,人民生活和社会公正有所提高,甚至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得以缩小以至在其后渐归消灭,到70年代终于迎来了资本主义的一个黄金时代。因此

说资本主义本身的改革促进了一些社会主义客观因素的增长,这是并不过分的。资本主义的本身改革活力确要强于当时的社会主义。

说到这里,不妨插一个故事(完全是事实)。上世纪70年代末,中国有一位将军出身当时主管国家工业的副总理访问英国,他对英国的社会经济情况进行了较全面的考察。访问结束时,中国驻英使馆的人问这位副总理对英国的观感如何,这位副总理高兴地说:“我看英国搞得不错,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本消灭,社会公正,社会福利也受重视,如果加上共产党执政,英国就是我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了。”(摘自中国驻英使馆前商务参赞于日先生所写《旅英十年》一文)——请读者诸君客观地评论一下:中国这位政府高级官员对于资本主义国家里“社会主义客观倾向”的评价,难道不是比卡德尔还要卡德尔吗?可惜的是,他们两位都不明白最终决定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的东西是,非真正属于社会所有的资本和其他生产要素居于社会的统治或支配地位。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不是唯一的标准,虽然是不可缺少的标准。

现在,通观世界,资本主义这个最复杂的社会机体,确实比马克思和列宁等人亲历的时期复杂多了,也比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和卡德尔亲历的时期复杂得多了。真是五光十色,丰富多彩,因此说它“物质极大丰富、三大差别基

本消灭、社会福利受重视”，并不过分。但是，在那里，我们看到，可能除个别国家，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仍在大资本家、大股东、大证券商、大跨国公司及其政治代理人的统治和支配之下。他们拥有的资本及生产要素已经打破国界，创造了一种新的“世界体系”，变成了跨国资本主义，亦即我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资本市场侵扩力要比过去大得多，它还以高科技改变了生产要素和资本流通的规律以及社会各阶级阶层的面貌。现在的工人阶级及其他工资劳动者几乎没有机会创造出能与全球化形势相适应的新的组织形式和斗争方式。因此有人说现在的资本主义是一种“新资本主义”。自然，也应当看到，即使在这种情势下，新的变革力量（尤其是直接掌握科学技术的力量和经营环节的工资劳动者）也在逐渐生长起来，有朝一日能够积聚起来成为一股有社会责任的觉醒力量；在资本主义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被迫不得不采取诸种社会改革和妥协措施时，社会主义因素将不可避免地会在其中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不过，这里我要指出一些差别：在卡德尔看来，资本主义的变化是由量变直接达到质变（即根本的质变），资本主义在上世纪的60年代已经处于根本质变的过程中。而在我看来，资本主义的变化是要在总的量变过程中经历若干次部分性质的变化，而这种部

分质变事实已证明要经历一个很长的过程，然后等到经济、社会、政治各方面条件具备时，才能达到根本的质变。就资本主义的发展情况来看，其总的量变过程中的部分质变，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长过程，其中包含新社会因素的积累和旧的资本特权的顽强抵抗，有斗争又有妥协。这里，谁掌握着政治特权和主要资本，是放任自由还是也根据社会的共同利益来行动，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就是在社会发生根本质变以后，即新社会产生以后，某些旧社会因素也还可能在不同程度上残留着。

关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共处问题

论争的另一重要问题，就是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共处”问题，即是，是你死我活的战争还是和平共处？

这里所谓“共处”，并不是指资本主义社会里有社会主义因素存在，或社会主义社会里有资本主义成分存在，两者共处或互相包含，这是社会发展中的正常现象。论争之点并不在此，而是当时最为尖锐的问题，即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共处”还是你死我活？

“和平共处”这一字眼首先不是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领域内提出的，最先提出“和平共处”及其所属原则（包括互相尊重各国的领土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等）的是中国和印度在50年代初签

订的《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美国一个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应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而不诉诸武力，并相应地提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论”。1960年除南共以外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制定的《莫斯科声明》承认这一原则，并作了如下的说明：“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共处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据说，这是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写上的，修正主义者是暗指南斯拉夫，但也有提醒赫鲁晓夫的意思在内。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中国当时正处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狂热时期。

卡德尔的小册子在这个问题上着墨不少，并公开点中国共产党的名，进行争辩，其实不过是对中共批判的答辩。卡德尔开宗明义地说明：我们把自己的政策叫做积极共处政策的这个事实，是使中国的理论家得以“区分‘修正主义’共处和非‘修正主义’共处的侥幸情况。‘积极’一词竟成了关于南斯拉夫共处概念的修正主义性质……”卡德尔遗憾地指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批评南斯拉夫对外政策的某些批评家也参与了中国的这种歪曲。”他认为事实是，差别“不在于对‘共处’的质的理解”，而在于，在南斯拉夫，共处政策是“社会主义国际政

策中持久的、原则性的因素”；而在中国，共处只是“过渡性的和暂时的”，意即是策略性的。

很明显，“共处”问题的分歧主要发生在中南之间。而我的批评文章在这方面只是为《莫斯科声明》辩护，指出：“各国间的和平共处，并不像修正主义者所断言的那样，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这也就是责备南共的“积极共处”是放弃了阶级斗争（其实卡德尔在他的书中已声明他在任何情况下无意排斥“国际阶级斗争”）。这个论点，在今天我们自己不但已实行对外持久开放，而且业已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现实（因此在这方面已淡化意识形态）来看，可说是毫无意义，纯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教条主义式的强辞夺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积极共处这个问题上，南斯拉夫根据自己的经验，在当时不仅同意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应当和平共处，更为难得的是，提出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讲和平共处，相互间不应以武力甚至以战争相威胁，并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给人以“好战”的印象。南斯拉夫提出这个问题来自然首先激怒了苏联，因为正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对南斯拉夫以武力相威胁；而且接踵而来的事实证明，这还是一项卓越的预见，因为不久以后即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苏联以武力进行了镇压。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又发生内部“骚乱”（由

改革引起），苏联又以武力入侵捷克。此时中苏两国已发生了直接冲突，苏联大兵压境，所以这一次中国也公开表示反对苏联入侵捷克，和南斯拉夫的立场一致。也就是从这时起，中南两国又开始接近，关系逐渐正常化。

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与毛泽东会晤。这次会晤历史性地揭开了国际政治的新一页，中国被迫执行联美抗苏政策。

1975年，南斯拉夫总理访华。毛泽东在接见时高度评价了铁托，说“铁托是铁”，意指铁托是一个不屈服于任何压力的人，一个了不起的共产主义者。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历史到此可说是澄清了过去争论的许多问题，即使不是全部问题。正像邓小平后来在回顾这些论争时所说的（大意）：一个党评论外国党的是非，往往是根据自己某种定型的看法，事实证明这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不应该由别人写文章来肯定或否定，归根到底只能由他们自己的实践作出回答。任何大国、小国，都要互相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别人不能任意干涉，即使错了，也要由各国自己去总结经验，重新探索。邓小平在同外国党一些来访的同志谈到过去的相处和争论时说：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也并不都是对的，对外国党发表过一些不正确的意见。同时着重指出：一个党和由他领导的国家的对

外政策，如果是干涉别国内政，侵略、颠覆别的国家，那么，任何党都可以发表意见，进行指责。特别提到：我们一直反对搞霸权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

我想，总的问题到此可算是有个了结了，个别问题个别论争的是非已不值得再提。一切都过去了，改变了，遥远了，当然包括改变了自己在内。不少人和事物已经消失不可复见。许多事情要再从头做起，重新探索（这在历史上并不奇怪）。不过对于原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我最后还想说几句：继1975年南总理访华之后，1977年底铁托也亲自到中国访问，那时中国的“内乱”刚结束，但毛泽东已经过世了。我记得，当中国结束了自己的“内乱”之后，曾经不止一次地派代表团前往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考察，详细研究他们所走的与苏联截然不同的道路和所获得的经验。我想，中国后来采取对外开放政策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多或少总和这种考察和研究所获得的成果有不同程度的联系。因此，勇敢地走自己的路的南斯拉夫朋友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怀念的。

（责任编辑 程 度）



不能忘记的新启蒙

● 李慎之

一年多以前,我以《革命压倒民主》为题给《历史的先声》写序的时候,自以为已经想清楚了许多问题,但是反复再思考的结果,觉得至少还有一个关键的概念,或者历史事实,没有交代清楚,这就是在那篇一万多字的文章中只提到一次的“新启蒙”。

现在,翻检中央党史部门出版的党史中,根本没有提到新启蒙这回事。理由可能是因为新启蒙不是党中央,不是毛泽东发动的一场运动,也从来没有成为什么“路线斗争”的议题。然而它实实在在是起源于中国共产党生死存亡之际,而一直影响到它以后发展壮大终成大业的一件头等大事。

现在我能找到的提到新启蒙运动的书只有一本,就是《中国近代社会思潮 1840-1949》。(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吴雁南、冯祖贻、苏中立、郭汉民主编)在该书的第十一编《文化领域中的思潮与斗争》中有一章(第七章:《新启蒙思潮的兴起》)专门谈这个问题,然而谈得很简单,一共一万多字。不过总算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可贵的资料。再就是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9 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由左玉河主编的第四章《新启蒙思潮的涌现》,给我们提供了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几位新启蒙运动发起者倡导这一运动的八篇文献。其他的史料,我有于见闻,实在所知不多了。

据《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思想的倡导者是时任中共北方局宣传部长的陈伯达”。他首先在 1936 年 9 月的《读书生活》第四卷第九期上发表了《哲学的国防动员》,副题为《新哲学者的自己批判和关于新启蒙运动的建

议》,开了头一炮。接着起来响应的是《读书生活》杂志的主编艾思奇,自称受了陈伯达的启发而在十月份的《生活》周刊上发表《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一文,认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它自己的任务,因此在“九一八”以后民族敌人的政治、军事、文化的猛烈进攻下,必须开展“以爱国主义为直接的主要内容”的文化运动;“这个运动完全是民主主义的性质”。

进入 1937 年,在五四运动 18 周年之际,北平一些文化团体和救亡团体提出了一个鲜明的口号:“纪念五四,要展开新启蒙运动。”5 月 19 日,张友渔(共产党员)、张申府(其时已脱离共产党)与吴承仕(其时尚未加入共产党)等九名教授在北平正式发起成立了“启蒙学会”,发表了《启蒙学会宣言》,引起了文化界、思想界的热烈响应(其中也包括当时在上海的艾思奇、何干之等人)。

各种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拥护的文章,新启蒙运动就此轰轰烈烈地开场了。

为什么这次的启蒙运动要冠以一个“新”字?其实从上面的引文中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陈伯达说自己是“新哲学者”,意思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者,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当时的中国学术界,这还应该算是一种新的思潮。(请注意:毛泽东在 1949 年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都是把马克思和列宁并称的。)艾思奇明确指出“五四”的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任务,实际上是说“五四”的所谓启蒙是以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启”中国传统的专制主义所加于人民之“蒙”,而新启蒙则是以无

产阶级的新哲学、新思想不但“启”传统文化之“蒙”，而且“启”五四时代资产阶级旧民主思想所加于人民之“蒙”。这个定义愈后而愈显。

总而言之，新启蒙是由“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占东北以后国难深重的局面所刺激出来的。用陈伯达的话说，“这是目前救亡运动的一部分”；用张申府的话说，“这种新启蒙运动，对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应该不仅仅是一种继承，更应该是一种扬弃。”所有新启蒙运动的发起者都强调新启蒙是爱国主义的运动，是民主主义的运动，是理性的运动，是建立现代新文化的运动。而陈伯达则明确指出：“新哲学者（按：即马列主义思想家）乃是目前新启蒙运动的主力。”

1986年，李泽厚同志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提出了“救亡压倒启蒙”的著名论点。这话好像也颇能耸动一世之听闻。但是，仔细推敲起来，也许还不够确切。且不提汉代的太学生运动与明代的东林、复社等运动，近代的启蒙运动从戊戌算起就无不都是民族危机刺激起来的。李泽厚的文章一上来就说，世人往往笼统地看待而不区分“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五四学生爱国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其实，两者本来就难分难解，可以说是火借风力，风助火势，才能形成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运动。新启蒙运动照其发起人的说法，早在30年代初就有人提起了，但是如果不是1931年9月18日日军侵占东北，也许发展不了这么快，这么大，最后甚至极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胜利。因此，比较准确的说法毋宁是：

还是救亡推动启蒙

只是启蒙本身转向

为什么说转向？因为七八十年前的中国学术界和今天的中国学术界总是把启蒙认为是与西方的启蒙大同小异的提倡人权、自由、平等、法治、理性的启蒙运动，而新启蒙运动都偏偏以马列主义作为真理来宣传，这就是新启蒙之“新”，而且决定了中国今后几十年的命运。它与1840年以来中国实际上的民族要求不一样，而且也与21世纪中华民族要求的重新启蒙不一样。学者在中国的政治大环境中稍有疏忽，就很容易看不到概念的不同。事实上，今天要求的启蒙是直接上承“五四”的旧启蒙，而与新启蒙没有多少共同

之处的。

我自以为是新启蒙典型的受众之一。“九一八”的时候，我正在上小学三年级。老师在课堂上谴责日本侵略者时捶胸顿足，义愤填膺。还有一名老师居然留书告别学校，投笔从戎去了，第二天大家奔走相告，这对我们幼小的心灵的震撼是很强烈的。我家的报纸订得比较多，不但看无锡本地的两张大报，还有上海的老《申报》，我虽然还不大看得懂，但是从“九一八”以后就每天都要仔细阅读。因此“九一八”可以说是第一次唤醒了我的政治意识。不料几个月后的1932年1月28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我们小学生也都上街游行示威，宣传抗日，抵制并查抄日货。十九路军的宣传队还沿京沪线西上，而且就住在我们学校里；市民拥护抗战，踊跃慰劳，十分热烈，有些场景到今日还记忆犹新。这样，我们的心田已准备好迎接新启蒙的种子了。

到初中一年级的時候，做我们的级任老师并且教我们国文的是一个地下共产党员陈迅易先生（原名陈凤威，是无锡有名的烈士），我大概是他看得上的一个学生。那年暑假开始，本来已经准备要离校回家了，他忽然把我叫到他的屋里，从抽屉里拿出两本书来，还神秘地把其中一本的封面撕掉了，又仔细地包好，叮嘱我暑假里好好读。又在我们那个时候流行的赠言纪念簿上写下了一页：“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这是伟大的导师列宁昭示我们的。”我回家一看，原来一本是艾思奇的《哲学讲话》（几年后改名《大众哲学》），另外被撕掉封面的一本是萧军的《八月的乡村》。我没有花多长的时间就看完了。虽然也不能说看懂了多少，但是至少打破了我对哲学的神秘感，也启发了我对哲学的好奇心，随即把我父亲藏书中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看了一遍，虽然也是似懂非懂，但是倒也兼收并蓄，奠定了我以后对“理论”的兴趣。至于《八月的乡村》则打开了我生活中从来没有过的眼界，知道在沦陷的东北还有一支游击队在对日本鬼子进行着殊死的斗争，大大激发了我对革命的向往。

大概这段历史就可以算是我接受“新启蒙”的开始了。

我是一个秉性腼腆而不善交游的人。从此以

后,我多年没有碰到过真正的共产党员,但是我始终在心里怀着结交有“正义感”的“进步青年”的愿望。如果说实现这个愿望比较困难,读“进步书刊”就容易得多了。30年代的书店里的左派书籍越来越多。我记得给我特别深刻印象的是一个叫佐野袈裟美的日本人写的一本书,叫做《中国历史教程》,虽然一本不到20万字,但题目就觉着新鲜,内容更使我惊讶。我本来以为自己上到中学,多少读过一些古文,对中国历史的知识也大概有一些了,不料这本书根本不谈三皇五帝,就讨论中国原始公社是什么时候转变到奴隶社会的,又讨论中国的青铜器是什么时候被铁器取代的……这些问题都是我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想像所不能到的。书中还常引用《诗经》、《尚书》、《左传》里的文字,如“雨我公田,乃及我私”,说明当时的中国实行的是井田制,是奴隶制等等。这些话,我原来也读过或者见过,却从来没有料到背后还有这么大的学问,觉得马列主义真的是“人类智慧的最高结晶”。总而言之,从那时起,也不知道读了多少进步小册子。钱亦石、潘梓年、沈志远、邓初民、李平心、华岗、曹伯韩、张仲实……都是我心目中崇拜的青年导师,名字少说也有好几十个。

新启蒙的中坚力量当然是理论家,但是就我所知,当时的“进步青年”大抵都在20岁前后做过一段“文学青年”的梦,像我这样没有多少才情的人也做了有两、三年这样的梦,因此文学界也是新启蒙的一大力量。其无与伦比的大宗师当然是鲁迅,而鲁迅则刚好在20年代末迁居上海以后,政治思想急剧向左转,成为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名震一时的“左联”的旗手。他所器重的萧军、胡风,我们当时不但不知道他们并不是共产党员,而且以为他们特别左,这当然是我们的幼稚与误解,但是我可以肯定它确实是存在于一般进步青年心目中的“事实”。

附带还可以说一句,当时上海福州路上书店林立,也许除商务、中华、世界,这几家大书店外,都大量出版“进步书籍”,现在组成三联书店的生

活书店、读书生活出版社和新知书店就是其中的最著名者。还有如南强书局、神州国光社等,都出版这类书。甚至如水沫书店、辛垦书店,我们后来才知道是共产党的叛徒叶青办的,也因为它们出的书总是谈卡尔和伊里奇,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也被我们这些无知的进步青年认为是左翼的。连属于基督教会的广学会也出版了许多宣扬苏联社会主义的书。

除开以上两界,新闻界也对新启蒙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中最著名的当然是1938年出版的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中国上空的红星》)。虽然斯诺在几十年后还被毛泽东定性为资产阶级,但是他的书的影响力对于推动中国人民对中国共产党“四海归心”的作用,可能超过许许多多的理论著作。另外,上海租界上英文的《密勒氏评论报》,中文的《大美晚报》都起了不小的为共产党宣传的作用。一直到抗战时期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美国记者如福尔曼,中国记者如赵超构都对延安备致赞美,也都是我们这样的左派学生向其他同学进行启蒙的材料。

随着读的书越来越多,马列主义在我思想里的地位也越来越崇高。例如有的书一上来就宣布



李慎之

“哲学是有党性的,新哲学耻于隐瞒自己的观点,我们的哲学就是与剥削阶级的哲学对立的”,这种直率的气魄一下就把我镇住了。再读下去,我知道了人类的历史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生产力又决定生产关系。自从脱离原始共产主义以来,人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人类社会的发展要经过五个阶段,而我们今天斗争的目的就是要消灭剥削阶级,建立没有战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我们的斗争一定会胜利,因为这是规律,是科学,是对任何社会都适用的,是必然的,是不可抗拒的,这是最后的斗争。至于说“无产者在这场斗争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而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更是使我热血沸腾。

这些在解放后已经尽人皆知的道理,在当时却如同惊雷闪电一样打开了我的脑筋。当然,我也还读别的书,但是越读越觉得它们无法与马列主义的真理相比。

不过几年,到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我已经可以说醉心于马列主义了。考虑上大学选什么系的时候,很快就决定了经济系,不过动机与今天的青年大有不同,我是过于简单地相信了马列主义的所谓“经济决定论”,觉得自己在知识方面最大的缺憾就是完全不懂经济学,因此一定要补这个缺口。不料一进大学的门,老师首先讲的竟是供给与需求的曲线,边际效用递减率,使我大失所望,只好硬着头皮学到毕业。提这件事,只是为了说明我痴迷的程度。

总而言之,新启蒙运动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强有力的传播。照《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思潮以唯物一元论、辩证唯物论为其哲学底蕴就决定了在终极目标上,它要求达到社会运动的根本解决。正如何干之指出的,‘从救亡这一点说来,我们不只是要举起我们的铁锤,粉碎了敌骑,使他们绝迹于太平洋沿岸,解放了一切束缚着我们的不合理压力,并且要在这一伟大的运动中解决社会问题,使中国不再走着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就是说,要在这一历史行程中完成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双重任务。”按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定目标而言,这个任务已在1949年人民大革命胜利之日完成了。

但是,奇怪的是,照《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说法,新启蒙运动到抗日战争开始就结束了。而

且,“由于新启蒙思潮存在的时间短暂,影响的社会层面也极为有限,所以在中国新文化史上的地位根本无法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潮相比。”不,不是这样的。我可以以过来人的身份证明,事实恰恰相反:在抗战开始以后,新启蒙运动是大大扩大了而且加深了。由于言论自由空间的扩展,无数共产党员和左翼文化人参加到启蒙的行列中来,千千万万青年知识分子(照当时延安的标准,从正式的大学毕业生到好歹念过几年书的小青年统统叫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自愿地接受这样的新启蒙,跨度大到现在70岁以上到90岁以下长达20岁的这个年龄段。其中许多人最后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大大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后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新启蒙的成就表现为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以至被毛泽东称为是“第二条战线”。

新启蒙运动的最后完成应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在1949年的胜利,在那以后,新启蒙终于彻底否定了“五四”的“旧启蒙”。

我自己虽然自以为启蒙较早,但是在抗战开始以后还是更加积极地接受启蒙,纵然许多问题始终弄不清楚(比如说形式逻辑是低级的、甚至反动的,辩证逻辑才是高级的、革命的。在中国,民主革命就是农民革命……),还是本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精神,先后也启蒙了几十个年龄小于我的有“正义感”的青年。这段时期,“新启蒙”这个概念是一直存在的,不过一般只说“启蒙”而已。两个进步青年熟识了以后,很可能会相互问起“你是什么时候启蒙的?”至于参加了共产党的人倒因为要严守党的纪律和秘密的缘故,很少有这样相互询问的。

事例多到不胜枚举,随手抓一个来说罢。去年8月9日的《光明日报》上就刊载有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列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高放的文章《启蒙助我成为学者》,他就是抗战开始以后启蒙的,还以抗战胜利以后抵制过反苏大游行而自豪。他的启蒙当然是完全不同于旧启蒙的新启蒙,他自己说读的也都是左翼作家和苏联人的著作。

所以说新启蒙结束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胜利,是因为在那以后,马列主义成了官学,政治学习成为政府要求。愿意学得学,不愿意学

也得学,形势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点大体上相似于此以前解放区与国统区的差别。因此可以说新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在国统区的一种运动。事实上,全国解放以前,左翼文化人与左翼出版物也大体上集中于国统区。

应该说,毛泽东也是新启蒙运动的受益者。在1936年以前,他戎马倥偬,难得有静下心来好好读马列的机会,据他同斯诺讲他建立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主要是读了马恩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的《社会主义史》三本书。红军到了延安,建立了陕甘宁边区以后,他可以有时间认真学习,清理一下自己的思想了。根据现在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选集》,他不但读陈伯达、艾思奇、何干之这些新启蒙运动的发起人的书,还常写信向他们“请教”。当然,毛泽东是聪明绝顶的人,常常能从对方的论点中发现问题,然后别立新义,毛泽东之所以为毛泽东,真是良有以也。

1940年1月,毛泽东写成并出版《新民主主义论》,这应该被认为是新启蒙运动的高潮。作为中国革命的领袖的毛泽东已经完成了马列主义的中国化,不但在以农民为主力军,依托农村包围城市逐步取得胜利的军事战略上,而且在建国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上都有了(在我们看来是)完整的、成熟的一整套主义与方略。从此以后,新启蒙就有了标准的、权威的教科书。不但是见识幼稚而感情易于冲动的青年学生愈来愈大规模地左倾,而且连许多过去一贯反对共产主义的国家主义者、自由主义者的知识分子也由于日寇侵略的深入,对蒋介石政权腐败与无能的失望与反感,自身生活的贫困化与对下层人民生活的苦难的认识加深,越来越感到是毛泽东给他们指出了一条解放的道路而越来越“进步”起来。共产党的统一战线不但扩大到了闻一多、马寅初……这样的知识分子身上,而且扩大到了黄炎培、张澜……这样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代表人物身上,甚至扩大到龙云、刘文辉这样的地方实力派军阀身上。

在因毛泽东逝世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四分之一世纪里,经常可以听到一种议论,就是有不少的老同志慨叹:“毛主席要是在革命胜利以后认真地实行新民主主义就好了。”但是

我们如果打开这篇文章再看,不用细读就可以发现毛泽东的理论正是在说明,在苏联革命胜利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不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而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了。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由中国无产阶级领导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

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国体就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政体就是民主集中制。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亦即共产党领导的……毛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所做的就是他在那以前所说的,并无二致。

把“救亡与启蒙”的命题扩大来看,也可以说是外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刺激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化,这是20世纪世界史上的一件大事。作简单的回答是不可能的,用新启蒙提供的理论尤其无法解释。它牵涉到中国两千多年“百代皆行秦政制”的大传统,也牵涉到时伏时起的农民造反的小传统。它也牵涉到整个世界形势的发展。在“五四”以前以及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好像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几百年来都是世界的主流思潮。其实在我们青年时期看,马列主义大概确实是当时最强劲的单个世界性大思潮,尤其在二三十年代之交美国发生经济危机而苏联的五年计划又提前完成以后,好像实践已经检验证明了马列主义的真理。中国要实现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非要依靠它指明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道路不可。虽然全球化是20世纪末叶才出现的概念,实际上国际间相互影响早就开始了。新启蒙不但不能忘记而且不能低估,因为它不但是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章,也是20世纪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中国的反映。对比起五四的启蒙来,新启蒙可以说是胜利了,因为它不但依靠了强大的世界性思潮,而且植根于中国自己的传统中,它的胜利是各种合力的结果。而五四运动的反传统的启蒙虽然现在看确实应该进行到底,但是当时实际上只是触及了传统的一层表皮。中国要赶上和融入世界发展的主流,任务还是同五四时期一样的艰巨。

注:本文引语凡未注明出处的均见《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840—1949·第十一编第七章》及《中国近代启蒙思潮·第四章》

(责任编辑 仲文)

舆论监督的回顾与探讨

● 孙旭培

舆论监督这个话题已经谈了二十多年了,至今仍是世人关心之所在,因为它确实是于国于民意义重大的话题。本文打算简单回顾舆论监督提出的过程,探讨舆论监督的确切含义以及当今条件下应该着力的重点和怎样才能保证舆论监督得以顺利进行。

“舆论监督”的提出

在古代汉语中,“舆”即“车”,“舆人”即是车夫,引申为普通老百姓,“舆论”是“舆人之论”,便是指普通老百姓的议论。在中国几千年封建专制社会中,有“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观念,没有可能出现主动接受舆论监督的思想和制度。在近代,梁启超提出了有关报馆监督的主张。他在1896年发表的《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中,说报馆有两大天职,一是监督政府,二是向导国民。他在这篇文章中,还运用了“舆论”一词,他说,“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虽谓报馆为人道之总监督可也。”梁启超虽然只提了报馆监督,没提舆论监督,但已经鲜明地有了舆论监督的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只提报纸批评,不提报纸监督。报纸批评与报纸监督,在运用的形式和

承担的任务、发挥的作用上都有不同之处。1982年7月,甘惜分教授出版了他的著作《新闻理论基础》,指出舆论对社会具有监督作用。笔者在1981年5月完成的硕士论文《刍议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中,使用了“舆论监督”一词,说“舆论监督是实施社会主义民主的有效手段之一”,并把它和别的监督方法进行比较,说明“舆论监督具有别的监督方法不能代替的特点”。此文被多次收入有关书籍。同时笔者陆续在报刊上阐述对舆论监督的观点。到了80年代中期,“舆论监督”一词已频繁见诸报端。1987年“舆论监督”一词第一次进入党的文件,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

一个词汇提出以后,常常随着人们理解的不同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其含义变得复杂起来。笔者用“舆论监督”一词时,无非是指新闻媒介对国家施政活动、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监督。其中所讲的“舆论”,并不是像后来一些同志所论述的,也包括用来信、来访等各种渠道所反映的民意,而仅仅是指舆论机关,也就是新闻媒介。例如有文献记载:1942年,太平洋

战争爆发前夕,孔二小姐带着哈巴狗从香港飞往重庆,全国舆论哗然。这里的舆论哗然,是指报纸一片异议之声。新闻媒介是舆论的载体,舆论监督自然也是指新闻媒介的监督。当然,新闻媒介若不反映民意,被人卡着嗓子说话,自然算不上舆论之载体。但这是在极少有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事,不影响一个通常说法的成立。

“舆论监督”中的“监督”,通常是对权力的监督。现在已被扩大解释到对各种坏人、坏事的批评,如某商店出售劣质商品,某居民区乱放垃圾,弄得臭气熏天,等等。现在一些都市报就是进行诸如此类的监督。当然,把这些算在舆论监督的内涵和外延内也未尝不可,但它们绝不是舆论监督的主体和重点。

舆论监督的宪法根据和主要对象

舆论监督到底应该怎样理解?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从法律上说,舆论监督的行为主体是新闻媒介。新闻媒介的监督权利是以公民的三项权利为依据的,即言论出版自由权、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第四

十一条规定:公民对任何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党的“十三大”则明确提出“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从政策层面上为知情权提供了依据。

舆论监督,从广义上说,它可以包括对党务、政务的公开报道和评论,对国家机关和公务人员施政活动的监督,以及对坏人坏事,特别是腐败行为的揭露和批评。舆论监督的主要对象应该是公共权力,所以它首先是面向国家各级权力机关及其公务人员,其次才是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人和事。前者可称为高层次监督,后者可称为低层次监督。这样理解舆论监督是符合世界通行规则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新闻媒介的运行规则。

舆论监督并不仅仅是批评,它实现的形式包括:一、公开报道。如为实现党务、政务公开,公开报道决策过程和结果。二、评论。如评说政府事务和公共事务。三、批评。如批评各种违法活动、腐败行为。以上三者不能绝然分开,比如批评不可能离开报道事实和根据法律和社会公德作出评说。但通常人们说到舆论监督时就想到是批评,这是对舆论监督的狭义上的理解。

我国与发达国家 媒介监督的不同重点

我国与发达国家相比,媒介进行监督的重点是有区别的。

发达国家新闻媒介监督的重点是在前面所讲的高层次监督上,而不是在低层次监督上。这是因为,监督国家权力机关及公务人员,一是符合公众利益,二是这种监督没有什么风险,因而也符合媒

介自身的利益。因为媒介对权力拥有者的监督,即使失当(如报道和批评不准确甚至失实),也很难被追究责任。美国判例法规定,“报纸除非煽动以暴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推翻政府,它的一切批评政府的言论都不受法律的制裁。”所以,在现代美国找不到从政者因为报纸批评而起诉媒体并打赢官司的案例。因为政坛人物手中资源很多,对他们批评错了,他们也有办法解决问题,比如可以通过记者招待会、新闻发言人发表谈话,以正视听。但是一个国家如果造成媒介都因害怕揭露权力者发生错误而受处罚的社会氛围,那么滥用权力导致的许多腐败和谬误,就会得不到揭露和纠正。当然,媒介若因此就轻率发表不实报道和不当批评,也会受到新闻职业道德的谴责和社会公众的蔑视。这些基本原则已经在那里形成社会共识和社会习惯。

在我国,由于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都具有高度集中统一的特点,对权力者的监督历来十分困难。我国报纸都是相关的党委、党组的喉舌,不但要服从1954年就已形成的“报纸不能批评同级党委”的金科玉律,而且实际上,也不能批评下一级党委,除非党委做出决定要在报纸上公开批评某下级组织(这时的批评实质上算不得报纸批评,因为报纸只不过是上级党委对下一级组织的批评的载体而已)。比如,《人民日报》不但不能批评省一级权力机构,甚至也很难由自己决定批评地一级权力机构。依此类推,省报就无法批评县一级,县级报纸连村一级也很难批评。上述原则及其在实践中形成的习惯,使得我国媒介独立进行对权

力机关及公务人员的批评非常困难。

我国政治的特点,讲究一元化领导,不讲究分权、制衡,在这种情况下,又不给新闻媒介以较大的活动空间,使新闻媒介完全没有担负反馈的功能。新闻媒介在任何政治指令前面,都只能起放大信号的作用,而不容许有减弱信号的作用,这就是建国以来的历史上,我国新闻媒介多次为错误路线呐喊助威的重要原因。像“大跃进”、“大炼钢铁”这些明显违反经济规律的政治指令,在全国引发了大量灾难性后果以后,新闻工作者明明看到吹牛浮夸之风刮遍神州,仍然将亩产几千斤、几万斤,最高达20万斤,以及一个县日产生铁20万吨的神话充斥各类媒体。这就是机关报体制下,媒体与被错误路线支配的机关进行正反馈互动的必然结果。

舆论监督—— 反腐败的利器

近二十多年,我们有幸生活在党的基本路线和政策正确的时期,尽管新闻体制未发生多大变化,但那种全局性的极其荒谬的错误也就没有再现。但是,也正是由于新闻制度建设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变化,新闻媒介在新时期所面临的反腐败斗争中,没有能够发挥应有的作用。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经济行为的复杂性和人们利益的多元化,更由于经济转型期的制度建设的滞后性,加上我国政治体制缺乏监督制衡和我国传媒获得的自由度较低诸特点,以贪污、受贿为主要特征的腐败得以快

速滋生和蔓延。20世纪80年代后期,我国媒介在反“官倒”、反腐败中,披露了一些主要是纪委处理、法院判处的案例,受到社会广泛的好评。可是,在1989年的政治风波以后,却出现一种观点,认为学生上街是由于报纸反“官倒”、反腐败太多,于是出现反复强调报纸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情况。其实,我国传媒从来都是以正面报道为绝对主体,批评与表扬之比最多时也没有达到二八开,更多的情况下连一九开也没有达到。这时反复强调以正面宣传为主,使得传媒对揭露、批评腐败,更是裹足不前。

90年代正是我国市场经济在旧交替、立法跟不上的情况下快速发展的时期,也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社会心理普遍存在的时期,许多有权者利用两种体制转型时的漏洞拼命敛财,这时正是需要新闻媒介依据法律和社会公德进行揭露和批评的时候,可是媒介却在“正面宣传为主”的旗号下,几乎没有发表任何有震撼力的批评,只做些不痛不痒的监督。一位研究者对《人民日报》1993—1997年期间的批评报道作了抽样调查。根据科学抽样的方法,从5年的1825天的报纸中抽取420天的报纸,共得批评报道1082篇。在这些批评报道中,有58.6%是发在读者来信版上的。而批评是以现象为主的(不涉及具体的单位和人),占半数以上(53.2%)。在针对具体的人或单位的批评中,针对集体或单位的占批评报道总量的17.8%;针对不法分子的占17.1%;而针对各级干部的批评,不到总量的十分之一(占8.5%)。而针对处级和处级以上干部的仅为2.6%,且大多是根据有关部门查处的结

果报道的,完全由报纸自己揭出来的实在太少。正是这种舆论监督上的退让,使得腐败分子更加心存侥幸,目无法纪。据中纪委的一位领导同志说,揭发出来的腐败分子的犯罪事实主要是发生在1993年至1997年之间。这个时间与上面所述的“在正面宣传为主”的旗号下放松舆论监督的时间,颇有一致之处。

以1998年1月中央领导人多次称赞中央电视台的以批评见长的《焦点访谈》节目为转机,我国传媒进行舆论监督的积极性、主动性开始增强,几年来违法违纪的揭露性报道明显增加,尤其是对重大事故的报道有显著增长。广西南丹矿难和其他不少事故都是媒体揭露出来才得以查处的。朱镕基总理多次表扬记者披露南丹矿难,说:“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国家安全生产局的一位领导人在一次会上说,由于新闻界对安全生产的监督,今年重大事故比去年同期有明显减少;而且在重大事故揭发以后,往往也带出了严重腐败的内幕。正如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副主任张宝明说的,从近年来查处安全生产事故所揭露出的大量情况看,几乎每起特重大事故背后,都与某些腐败现象有联系。

但是,舆论监督的进步是有限,虽然在报纸上的揭露违法、腐败的报道明显增多了,但稍加辨别,就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这些报道中,多是对司法机关惩处或纪检机关处理的报道,被人戏称为是“打死老虎”,真正由新闻媒体发现线索,主动进行揭露和批评的,被称为“打活老虎”的,还是不多。真正叫作舆论监督的应该是后者。《焦点访谈》的可贵之处,就在于

它进行的批评监督性的报道,大多是独立进行的,是“打活老虎”。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地方的人们都来中央电视台门前排队,请求中央台派人前去进行采访报道的原因。二是各媒体刊发的报道,很多是转载全国其他媒体的报道。中国大,媒体多,多搞一些转载,就给人揭露、批评报道不少的印象,其实从事揭露批评报道的很不均衡,特别是一些市、县报,批评报道很少,有的地方报纸的领导人干脆说:我们从不进行对身在官位上人的批评,除非党委下令。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新闻媒介还远没有将舆论监督的责任担当起来,还没有将舆论监督作为反腐败的利器加以运用。

放手让媒介监督 一切违法、腐败行为

舆论监督从监督对象上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国家决策(特别是在决策前或决策过程中)作报道和评论。二是对国家各级公务员的施政活动作报道和评论。三是对一切违法违纪的人和事进行报道和批评。

就现实情况来看,前两个层次自由度还很小,我国媒介只有宣传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义务,没有进行批评的权利。只是在某些法规、政策(特别是经济领域的)不利于改革、发展时,可以提出修改的意见。对于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施政活动的批评,不能由媒介自己决定,除非是批评比该媒介级别低得多的机关和人员。只有在违法违纪活动和腐败行为方面,媒介的自由度稍大一些,如果它们不是发生在权力机关及其领导人身上的

话。

在我国现阶段,政治体制和新闻体制没有改革的情况下,前两个层次的舆论监督,几乎没有可能提高其自由度。但有可能提高第三个层次的自由度,就是准许媒介批评一切违法违纪活动、贪污受贿和其他一切腐败行为,而不在乎当事者属于何种级别。能够做到这一点,对遏制和减少腐败会发挥一定作用。

与司法监督、行政监督等其他监督手段相比,舆论监督具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那就是它的及时性和公开性。新闻工作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专业的调查研究工作者,他们可以了解到许许多多违法、腐败的事例,如果给他们适当的自由权利,他们可以迅速地将违法、腐败行为见诸报端和荧屏,使得违法、腐败在造成损失较小的时候,就被披露和制止,行政、纪检、司法机关迅速跟进,使得搞腐败的人心存“伸手必被捉”的畏惧感,也就会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者大为减少。

而现在的情况不是这样,许多搞腐败者都知道,并不是新闻工作者了解了底细,就能报道。能不能报道,决定权掌握在党政机关的头面人物手中,搞腐败的都注意打点这方面有权力的人物,而且一些权力人物就是违法违纪、搞腐败的先锋,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搞腐败的人物在报刊上披露,实在是难上难。新闻工作者中,自然也有私心较重者,一遇到阻力,就放弃监督。有的甚至退避三舍,怕影响自己的位置。更有人认为“搞监督担风险,不如去写拿红包的新闻得实惠。”在这种思想驱动下,舆论监督只是批评在非政治权力阶层中

存在的问题,甚至只批评那些不涉及具体人、具体单位的现象,或者只转载外地报刊的舆论监督报道。

目前,我们的媒介几乎都是机关媒介(机关报、机关台),习惯上都被用来展示相应机关的政绩,各级机关对媒介监督薄弱司空见惯,虽然他们自己也承认违法、腐败的情况严重,也觉得无力改变。山西《长治日报》,在市委书记吕日周的积极支持下,敢于进行舆论监督,每天都有一篇或多篇批评和监督的报道发表,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我们希望这样无私无畏的媒介多起来,更希望这样开明有为的领导人多起来。

有些人总认为揭露腐败的稿件登多了会影响社会安定,其实只有腐败,才是社会不安定的根源。有腐败就予以揭露,使腐败越来越少,才是长治久安之计。如果每个地、县媒体都把这样的任务担负起来,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不但本地媒体不揭,还怕上级媒体来揭,那么我国成千上万家媒体,有多少腐败的人和事揭不完呢?托马斯·杰弗逊说:“一切谬误,只有大家都可以批判,就不可怕了。”只要违法、腐败的人和事一露头就受到揭批,人民对党和国家前途就会充满信心。我国处于GDP年增长7%的大好时代,还有什么理由不敢放手让新闻媒介揭露违法、腐败呢?我们不能错过历史给予我们的大好时机。

舆论监督法规和跨地区监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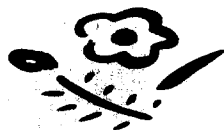
要在目前条件下搞好舆论监督,实现新闻立法,保障新闻媒介进行舆论监督的权利,是至关重要

的。但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新闻立法,呼喊了近二十年,也没有实现。在这种情况下,搞一个舆论监督的条例是需要的,也是可能的。

在没有国务院条例的情况下,地方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制定适用于本地区的条例,也是有意义的,这不仅有利于本地的舆论监督的进行,也可以为国家舆论监督立法积累经验。珠海市出台过一个舆论监督条例,对推动珠海舆论监督的顺利开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即使在没有现成条例的情况下,只要能支持跨地区监督,也会使舆论监督出现新的面貌。现在地方保护主义很严重,许多地方准许媒体转载外地媒体揭露腐败的稿件,却不支持、反而压制本地媒体揭露本地的违法、腐败情况。广东的《南方周末》长期以来在进行异地监督方面,做出了成绩,积累了经验,批评了许多外省、而当地媒介难以进行批评的违法、腐败案例,成为一张受全国人民欢迎的报纸。媒介的跨地区监督,在国外也照样有,那主要是怕得罪本地的广告客户。而在我们这里,则主要是需要冲破滥用权力对正当批评的压制,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跨地区监督既是服从法治,也是服从党的领导,因为任何跨地区批评,都是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的,并且是以党和国家的全局利益为服务目标的,因此应该是无可非议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粟裕对中央战略决策直陈异见

● 朱 楹
熊铮彦

在解放战争的一些关键时刻，粟裕几次对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看法和建议，并且最终被中央采纳，对推动战局发展和缩短解放战争进程起了重要作用。重温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我们一方面为粟裕自觉从战略全局出发，敢于坚持实事求是、无私无畏“斗胆直陈”的高度党性原则折服；另一方面又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从善如流，听取不同意见，重新确定战略决策的好作风感奋。

1946年6月建议，改变战争初期对我不利的局面

1946年夏天，蒋介石把他的80%正规军193个整编旅调集到解放区周围，妄图“速战速决”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武装。面对这严峻的形势，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在作出“蒋介石准备大打，恐难挽回”的正确判断同时，分析战局发展认为：“大打后，估计6个月内外时间，如我军大胜，必可以议和；如胜负相当，亦可能议和；如蒋军大胜，则不能议和。”根据这个分析，确定了“我军必须战胜蒋军进攻，争取和平前途”的解放战争初期战略方针：蒋介石着重向北，我军反其道而行之着重向南，以外线出击的胜利迫蒋议和。1946年6月22至26日，毛泽东接连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起草电报，指示太行、山东、华中三支野战军互相配合，南下外线打大仗。中央军委给华中野战军的指示非常明确：命令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主力（不少于15个团）离开苏中根据地，西出津浦线，配合陈毅领导的山东部队作战，并在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攻击准备。此时新四军军长陈毅亦电令华中野战军主力西进淮南。根据中央指示，陈毅不久率山东部队南下。

粟裕此时正在苏中前线海安部署军事，准备迎击蒋介石的进攻，接到毛泽东26日令华中野战军西出津浦线作战的电报后，立即同野战军参谋长刘先胜、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一起研究，权衡留在苏中和西进淮南作战的利弊。粟裕说：“苏中是老根据地，地形复杂，物产丰富，群众基础好，并且有苏皖、鲁南、豫皖、中原各个根据地策应，各方面条件都很好，现正面临蒋介石的15个旅围攻，我们留在苏中作战歼敌更为有利。”刘先胜、钟期光同意粟裕的意见，认为：“苏中根据地是苏中军民用鲜血和生命开辟、建立起来的。现在我们一枪不放就撤退转移，苏中老百姓不理解，部队的士气也会受影响。”

如何使中央军委、毛泽东能同意他们的方案呢？三位

领导人经过反复商量，确定由粟裕亲自起草电报，建议：“我们是否在苏中先打一仗再西移？”并当即发往中共中央、陈毅和华中局。

粟裕考虑到这个建议事关战略全局和华中野战军几万人马的作战方向，还必须由华中分局研究、同意后正式向中央提出才好，便从海安赶到中共中央华中分局所在地淮安。华中分局立即召开会议，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一致同意粟裕的意见，商定了从苏中实际出发执行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指示的具体方案，6月29日，由四位领导人联名上报中央军委和新四军军部。

第二天陈毅复电，坚持华中主力“应立即西开”，同时把这个意见报告了中央军委。

毛泽东接到华中分局和新四军军部不同意见的两份电报，没有立即下结论，6月30日又发出两份电报，一份给华中分局、华中军区，指示华中野战军“暂缓调动”，并强调“待与陈军长商酌后，即可决定通知你们”；一份给陈毅，明确指出粟裕等的建议“似有理由”，并征询“你们觉得如何，望告。”

就在此时，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对南线各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就要开始。7月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指示粟裕“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显然，粟裕和华中分局的意见已被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采纳，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毅然调整了战争初期的战略决策。粟裕没有辜负中央和毛泽东的期望，充分运用根据地优势，面对四倍于我的蒋军，出奇兵连连大捷。首战宣家堡、泰兴，歼敌3000多人；随后挥师如（皋）南，声东击西，再歼敌逾万。中央军委来电“庆祝你们

打了大胜仗”。

苏中已经打了两个胜仗，华中主力是继续留在苏中歼敌，还是西移淮南作战？陈毅从苏皖战区敌情出发，一再发电中央，催促华中野战军“向西转移”。但毛泽东为苏中的胜利大为振奋，发电明确指示粟裕：“结束战斗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战”，而且要他“准备打四五个大仗”。

苏中获胜，粟裕想扩大战果，又深感兵力不足，两次建议调淮南第五旅来苏中参战。已经率部外线出击的陈毅则认为津浦线是主战场，“五旅不宜东调”，要粟裕率主力西移。8月初，苏中出现有利战机。粟裕8月5日第三次致电中央军委，坚持五旅到苏中参战，并在电报最后用了“斗胆直陈，尚祈明示”8个字。在两种不同意见的争论中，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一次接受粟裕的建议和要求，发电指示陈毅和华中分局“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显然毛泽东此时已把苏中作为主要的作战方向。

有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支持，粟裕的军事才能得到了尽善尽美的施展。从7月13日起到8月31日止，华中野战军在苏中七战七捷，歼敌5.3万余人，歼敌总数为华中野战军参战部队总数的1.76倍。



粟裕（右二）在淮海战役

苏中战役胜利的意义是全局性的,使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迅速形成了在解放战争初期实行内线作战的战略方针。苏中战役创造的作战经验也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发给各战略区首长,推广华中野战军的经验。

1947年8月建议,促成三支大军共同经略中原

1947年的夏季,解放战争处于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关键时刻,7月21日至23日,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在靖边县小河村召开中共中央小河会议,作出了解放战争第二年的战略部署。中央军委命令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率一、二、三、六纵千里跃进大别山;指令华东野战军陈士榘、唐亮率3个纵队,叶飞、陶勇率2个纵队,渡运河西进鲁西南,与刘邓大军靠拢;指令陈赓、谢富治与秦基伟的九纵、孔从洲的三十八军等组成一个集团,至豫西开辟鄂豫陕根据地,“三军配合,两翼钳制”。毛泽东形象地说:“蒋介石搞了个黄河战略,一个拳头打山东,一个拳头打陕北……可他没有想到,自己两个拳头这么一伸,他的胸膛就露出来了。所以,我们呢,给他来个针锋相对,也还他一个黄河战略:紧紧拖住他这两个拳头,然后对准他的胸膛插上一刀!”可是战局发展常常出人意料。陈、唐、叶、陶5个纵队兵进鲁西南后处于被动局面,未能很好发挥配合刘邓大军行动的作用。刘邓大军鲁西南战役胜利结束后,直趋大别山。蒋介石调集8个整编师(军)18个旅约14万人分进合击,并企图将刘邓大军困于黄泛区。

8月4日,中央军委连发3份电报,指令粟裕带炮兵速去鲁西南,统一指挥陈、唐、叶、陶5个纵队,策应刘、邓作战。中央军委还决定成立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委。中央军委强调指出:“刘邓南下作战能否胜利,一半取决于陈、唐、叶、陶5个纵队是否能起大作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一次把重担压到了粟裕身上。

粟裕认真领会中央精神,考虑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战略重心从内线转到外线,华东

野战军今后的主要作战方向和重心也将相应转变。为了更好地完成中央赋予的任务,粟裕向陈毅建议:考虑到人事关系和指挥便利,请陈毅一同西进,以加强领导。增调华野六纵到西线,进一步集中优势兵力。留在山东的3个纵队组成华野东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领导,继续执行内线作战任务。陈毅立即把粟裕这个建议发电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8月6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特别强调“惟陈粟应速西去,愈快愈好”。8月8日,陈、粟率部挺进鲁西南。

8月16日,粟裕在行进途中接到中央军委电报,询问华野西兵团今后行动打算。关于华野西兵团的行动,中央军委曾明确指示华野各个纵队要从内线,即从刘邓大军的相反方向钳制敌人,认为这是最有力的钳制,还特别强调陈士榘、唐亮“不可轻出陇海以南”。西兵团应该如何执行中央军委指示,完成中央赋予的战略任务呢?粟裕一路行军一路思考。他认为,中原的形势已经发生变化,刘邓大军提前挺进大别山,正受到大批敌军前堵后追,困难重重。当前对刘邓大军作战最有力的策应,应是华野西兵团相机把作战区域扩大到陇海路以南,破袭津浦线,威胁徐州城。这样既可有效拖住敌人不能南去,减轻对刘、邓的压力,又可迫使鲁中、胶济线敌人分兵西来,从长远看,还能为今后三支大军经略中原创造条件。

粟裕深思熟虑的打算,显然与中央的指示相左,而且这个方案还加重了自己的作战任务,相应也会加大华野部队的伤亡。但是从战略全局考虑,他在接到中央电报的第三天,即8月18日,便把自己的想法和建议毫无保留地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并特地在电报中说明,此电是他个人的意见。

接到粟裕的报告,毛泽东整整考虑了6天,最后完全接受粟裕的建议,于8月24日复电:粟裕同志18日电“意见极为正确”。重新规定西兵团作战范围为“黄河以南,淮河以北,运河以西,平汉以东”,并嘱转示陈唐叶陶及进入鲁西南的其他3个纵队“坚决执行”。毛泽东的电报满腔热情赞扬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第一年取得“全国各区战绩最大”的胜利。殷殷嘱咐粟裕尽快赶至鲁西南,统一指挥西兵团

各纵,配合地方兵团,完成中央交给华东野战军的伟大任务。

粟裕反复思考进入鲁西南以后如何打好第一仗,夺取战场主动权。此时,刘邓大军正徒涉黄泛区,处境越来越艰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接连急电陈、粟率部星夜兼程急进,统一指挥西兵团歼敌,直接援助刘邓作战。

9月初战机出现了!粟裕迅速集中华野西兵团各个纵队于山东鄆城西南小镇沙土集,从9月7日至9日清晨,不到3天时间就全歼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十七师9500多人,俘虏中将师长段茂霖和少将旅长罗觉元,缴获大量枪炮弹药等军用物资。

沙土集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扭转了我军在鲁西南的被动局面,有力配合刘邓大军和山东内线我军行动,标志着华东战场已胜利实现由内线歼敌到外线出击的转折。中共中央来电热烈祝贺,指出沙土集战役胜利“对于整个南线战局之发展有极大意义”。

1948年4月建议,创造解放战争史上空前战绩

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经略中原,调动和吸引了南线蒋军160个旅中约90个旅的兵力,使蒋介石在战略全局上渐处被动地位。但他仍在中原战场调集了强大兵力,对人民解放军实行战略进攻。刘邓、陈粟、陈谢三支大军虽互相作战略配合,但彼此分兵作战,无法打较大规模的歼灭战,中原战局处于反复拉锯状态。

如何迅速改变这种局面,粟裕认为,我军在中原战场上已集中十几个能打硬仗的纵队,并且有华东、华北和中原解放区为依托,具备了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关键在于集中更大兵力。只要我们能打两三个大歼灭战,中原局势很快就会改观。

1948年1月22日,粟裕把他的战略思考和建议电告中央军委和刘、邓。在电文最后加了“管见所及,斗胆直陈。是否妥当,尚祈裁示”16个字。

此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有了和粟裕的建议观点相距更远的新安排。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

召开会议,作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战略部署,在南线,要粟裕率3个纵队渡过长江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为了筹划这个战略部署,毛泽东特地和正在陕北的陈毅当面商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由华东野战军主力组建东南野战军,执行南进战略任务;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陈毅任东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兼副政委,又任东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同时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粟裕率第一兵团3个纵队于1948年夏季或秋季先行渡江南进作战,1949年二、三月间由华野另外3个纵队组成的第二兵团随后过江。

粟裕持有异见的“子养电”到了中央军委后,毛泽东对粟裕的这份电报十分重视,手持毛笔,逐句圈点,然后送周恩来、任弼时、陈毅传阅,并批示“再送毛”。周恩来批示:“请陈毅考虑,粟所提各项问题,是否需再议一下?”但中央复议结果:维持原决策不变。5天以后,也就是1月27日,中央军委正式下达命令,要粟裕率3个纵队渡江,并强调采取这个战略行动,是要使敌人改变集中兵力于中原的部署。中央对南进提出了3个方案,要粟裕“熟筹见复”。

粟裕经过3天缜密思考,1月31日他再次向中央军委发去了长达2000字的电报。

电报认真回答了中央军委要求“熟筹见复”的关于渡江南进的几个问题,同时重申他在“子养电”中已经详细阐述的观点。毛泽东对粟裕坚持的意见更为重视。陈毅原定2月1日离开陕北返回华东,毛泽东把他留下来再次共同研究粟裕的电报。研究结果认为派重兵南进,最能调动中原蒋军主力去江南,扭转中原战场局面,发展战略进攻,仍坚持原来的决策不变。毛泽东当夜给粟裕发电,指示部队休整1个半月,3月下旬出动;华野其他各纵队配合刘、邓大军作战,采取粟裕提出的“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粟裕接到电报即率部北渡黄河,到河南濮阳地区休整。后来,中央军委根据全军统一部署,指示粟部休整到5月15日,然后执行南进任务。

粟裕一直没有停止原来的思考:是分兵渡江南进,还是留在中原集中力量打大歼灭战,究竟采取哪种战略行动才能确有把握地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呢?这时陈毅从陕北返回华东来到濮

阳。粟裕两次把自己的思考向陈毅详细汇报,又发电征求刘伯承、邓小平的意见。4月18日,粟裕再次向中央发电,“斗胆直陈”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歼灭战。

此时毛泽东已率中央机关东移到达河北省阜平县城南庄。毛泽东接到粟裕电报后更是关注,即于21日复电陈毅、粟裕,请他们来中央当面“商定行动问题”,25日又致电在西柏坡的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提议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重要议题之一就是研究“陈粟兵团的行动问题”。

陈毅、粟裕29日抵达西柏坡,第二天就随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到阜平县城南庄。这是粟裕1931年与毛泽东分别后第一次见到自己敬重的领袖。毛泽东也很激动,大步走到门外迎接,与粟裕长时间热烈握手,兴奋地说:“我们的英雄回来了!欢迎你。”毛泽东有个习惯,接待和会见党内的同志,从不出门迎接,这次是个破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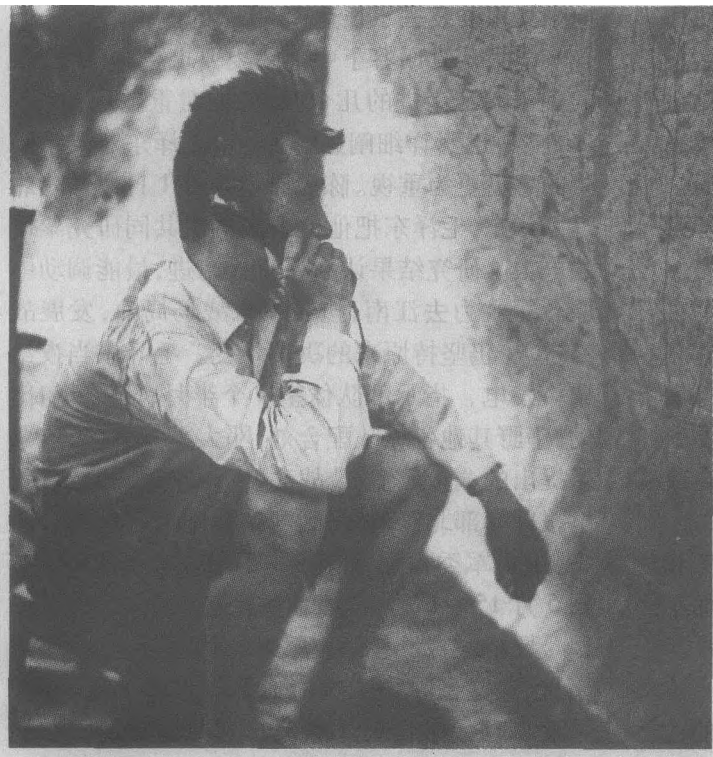
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会合后的第一次书记处扩大会议,就在这一天召开了,第一个议题就是集体听取粟裕汇报。粟裕详细对比两种战略行动,既有对当前全国政治、军事形势的科学分析,

也有历史经验教训的认真总结。他认为,3个纵队过江,既达不到调动敌人回防江南的目的,又削弱了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力量。3个纵队过江以后长途转战,估计要有五六万人的减员,以这样多的减员,在中原战场可歼敌3至5个军,粟裕向中央军委有理有据地阐述华野3个纵队留在中原集中兵力更大规模歼灭敌人的有利条件和深远意义。

毛泽东听了粟裕当面的汇报和阐述,觉得他的意见符合全国和中原战场的实际情况。中共中央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华野3个纵队暂不过江。但强调渡江南进是中央坚定不移的既定方针,只有渡江南进才有全国的胜利。5月5日书记处会议尚未结束,毛泽东就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向刘伯承、邓小平和华东局通报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决定,以中央军委命令的形式,正式确定华野3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继续留在中原作战。与此同时,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军区、中原野战军工作,陈毅在华野的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

此时,中原战场国民党军集中有25个整编师(军)57个旅,其中12个整编师(军)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人民解放军只有13个纵队及一些地方武装。根据中央赋予的作战任务,面对敌我力量悬殊的战局,粟裕精心筹划、设计了集中兵力“先打开封,后歼援敌”的作战方案。华野部队出敌不意兵临开封城下,刘邓大军调集5个纵队全力阻击胡璉兵团北援。只用5天时间,粟裕指挥的大军就攻占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全歼守敌3万余人;阻援方向也歼敌1万余人。豫东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后,粟裕率部不怕疲劳,连续作战,巧妙调动敌人,敢于从多路进逼的敌人援军中寻找一路,抓住战机,集中主力,又在睢杞地区激战6昼夜,围歼敌区寿年兵团,重创增援的黄百韬兵团。豫东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歼敌5万多人。

豫东战役两个阶段歼敌近10万人,创造了解放战争史上一个战役歼敌的空前战绩,迅速改变了中原战局。



粟裕在豫东战役

适时建议举行淮海战役， 促成南线战略决战

解放战争时期的“三大战役”中规模最大、歼敌最多的是南线决战的淮海战役，而促成举行淮海战役是粟裕最先向中央建议的。

粟裕指挥战役有一个特点，有人形象地比喻他是“嘴里吃一个，手里夹一个，眼里看一个”，也就是走一步运筹几步，具有很大的预见性。豫东战役的胜利，粟裕脑海里进行南线战略决战的构想越来越清晰了。他认为，随着敌我力量消长和战略战术变化，最后势必要和敌人作战略决战。他觉得在长江以北决战比在长江以南决战有利得多，而在长江以北决战又以在徐州、蚌埠地区最为有利，是决战的最佳战场。9月24日清晨7时，济南战役的枪声还未完全停息，粟裕关于下一步战略行动的电报就飞到了中央军委，向中央献策：兵出徐州以东，“建议即进行淮海战役”。

中央军委审慎考虑粟裕的建议，25日复电要粟裕召集部队领导干部会议讨论，把最后斟酌意见电告中央。25日下午，中原野战军刘伯承、陈毅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中央军委经过一天的磋商考虑，毛泽东于当晚7时发出第三份电报，表示“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并确定第一个作战目标：歼灭黄百韬兵团。

一经中央军委批准，粟裕加紧了淮海战役的各项筹划。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先后攻克郑州、开封，进至徐州、蚌埠地区，新的战场形势使粟裕的战略构想有了新的发展。他预见到两支野战军将由战略上的配合作战，发展为战役上的协同作战，淮海战役的规模将比原来设想的要大，必须建立统一的指挥体制。此时刘伯承还在豫西，粟裕一再致电中央军委，强调“此次战役规模很大，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这是粟裕在关键时刻关键问题上第二次向中央提出的重要建议。当时集中在徐蚌地区参战的部队，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有15个纵队，还有中原野战军1个纵队暂归粟裕指挥，共16个纵队；陈毅、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有4个纵队。按照惯

例，一次战役有几支部队联合作战，一般都由主要方向的指挥员指挥次要方向的指挥员，先打响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后打响的部队指挥员，兵员多的部队指挥员指挥兵员少的部队指挥员。粟裕的建议立即被中央军委采纳。毛泽东复电指示：“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后来中央军委进一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和指挥淮海前线作战和支前工作。

11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粟裕指挥部队全力围歼黄百韬兵团，又敏锐地发现徐州蒋军有南撤企图。粟裕认为，不论战局如何发展，截断徐州之敌陆上退路甚为必要，必须当机立断，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11月7日，粟裕一夜未眠起草电报，把他和华野参谋长张震的判断火速报告中央。8日清晨，粟裕和张震都在电报上郑重签名，并注明时间“齐辰”，发往西柏坡。“齐辰”即8日上午7至9时。“齐辰电”精辟分析、估计蒋介石可能会采取的两种方针，提出了迫使敌人采取第一方针即在江北与我决战的战略部署，以便我继续在江北大量歼敌，为今后渡江作战和渡江之后解放江南各省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怎样把敌人抑留在江北呢？“齐辰电”又提出，消灭黄百韬后我军主力立即西取徐州，这样不仅可以抑留徐（州）蚌（埠）之敌，还能调动前来驰援的敌黄维十二兵团，以便我军在运动中歼灭之。

这是粟裕在淮海战役中第三次向中央军委献策。中央军委立即采纳了粟裕的建议，不失时机地把淮海战役发展为南线战略决战，9日深夜中央军委复电粟、张，并告华东局，陈邓，中原局：“齐辰电悉。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华东、华北、中原三方面应用全力保证我军的供应。”

战局发展完全证明粟裕对蒋介石分析、估计的正确。蒋介石确实曾考虑“放弃徐州，守淮保江，拱卫京沪”。由于种种因素，加上粟裕的正确判断、建议和中央军委的及时果断决策，国民党军不得不在徐蚌地区与人民解放军决战，最后乖乖被歼。

（责任编辑 方 徨）

（朱楹：原粟裕秘书；熊铮彦：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军事宣传中心主任）

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

● 杜导正

《光明日报》离休干部殷毅，与我曾为同事，在70岁之际，学会了使用电脑，在键盘上一个字一个字地敲出了10余万字的《回首残阳已含山》一书，书中叙述了自己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这是一个老记者的故事，也是55万人的故事。而它的牵涉面，却广及55万个家庭及几百万亲友。这就是共和国历史上很悲痛的那一页：反右派斗争。

这55万人，其中的绝对多数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及干部阶层的精英：一部分是在解放前从各大中城市投奔根据地、投奔共产党的学生志士；一部分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从西方回来忠心报国的科学家、学者；一部分是长期与共产党相依为命的民主党派铮铮盟友；还有很大部分是共产党自己一手培养的干部、大学生……

一夜之间，他们从美好的人间，跌进了深不可测的地狱。炼狱之长，延续了20多年。法国有个大文豪说过这样的话：如果法国失去了500个达官贵人、政府政要，对法国没有太大影响；但如果法国一下子失去了500个科学家、艺术家、作家、

音乐家、诗人，法国历史会倒退半个世纪。这用到中国不一定妥帖，但不幸的是，这句话在中国的20世纪的几十年间几乎成为现实。

这个故事更令人痛彻之处还在于：这55万“右派分子”，不是被种种外部的敌人，而是被他们信赖的党组织“引蛇出洞”之后“揪”出来，打翻在地。在他们的脸上和心上，均被烙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火印”。许云峰和江竹筠之所以在国民党设置的监狱里、在刽子手的毒刑下能坚贞不屈，是因为他们自信自己在为真理而献身，坚信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得解放的这一天终将到来，为此，他们愿把牢底坐穿，他们含笑赴死。而这55万“右派分子”，是被他们所热爱的党组织“判决”为“罪人”的，并且在被炼狱之火熬炼的漫漫长夜里，他们还得被迫苦苦“悔改”连自己也说不清楚的所谓“罪行”，而且，他们也完全不指望自己还会有什么“未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给他们一个个平反，是他们和他们的朋友们做梦也不曾料到的。



“反右”批斗民主人士、交通部长章伯钧

作者是一个高级记者，他用自己的记实而生动的文笔朴朴素素道来，叙述了故事的发展，也尽可能地展示了故事发生的背景。从字里行间，我们感受到一种浓重的社会氛围，这种氛围包括党内由来已久的根深蒂固的“左”倾思想、中国国民素质的某种消极因素以及我们许多领导人的个人品性等方方面面的复杂情况。这种氛围令我们今天读来仍然震惊，进一步逼着人们思考，中国历史上类似民女窦娥被冤杀案尚且曾有关汉卿等人为之鸣冤，而55万社会精英——占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总数的百分之

十一——被打入十八层地狱，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却几乎无人敢为他们公开呼吁一声，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物上，几乎见不到一个“不”字。显而易见，这场历史悲剧，已不能简单地归罪于某个领导人、某些单位的错误，而必须从社会体制、社会运行机制和社会氛围中去寻求其产生和发展的深层次轨迹。

事实上，反右派斗争，只是新中国历史上类似悲剧的延伸和更大浩劫——“文革”的前奏。从此，中国知识界一片肃杀，风声鹤唳。世人禁口箝声，不敢再有独立思考。于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在全国城乡通行无阻，之后又是“反右倾”、“四清运动”、“个人迷信”盛行，直到爆发赤色恐怖的“文革”，悲剧和破坏也发展到了极至。大批当年“反右派”、“反右倾”中的领导干部和积极分子，此时，自己也在瞬息间变成了“牛鬼蛇神”。本书中叙述的故事被放大百倍、千倍后，在中国 960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更野蛮地重演。

这 55 万“右派分子”，据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书中所提供的数字，现已有 99% 被宣布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据我所知当年被划的“右派分子”，不是 99% 错划，而几乎是 100% 划错了。这场完全错误的“反右派”斗争与那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浩劫，现在都已成为过去，成为历史。我们的党和国家，在痛定思痛之中，召开了类似遵义会议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庄重地总结经验教训，改革开放，使党和国家重新站立起来，出现了这 20 年欣欣向荣的中兴局面。十六大的召开，进一步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总体目标，并完成了新老交替，为确保十一届三中全会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连续性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提供了保证。面对今天的蓬勃祥和盛世，回顾 20 多年前的曲折艰险人生，大家真有说不尽的感慨。

如果说反右派斗争是新中国诞生后消极甚至黑暗的一页，那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则是一个展现新时代的“分水岭”。新中国今天的正确的治国方略，正是建立在建国初那许多错误做法所引发的教训上。正如恩格斯说的：“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从“反右”到“文革”那一场场历史悲剧所产生的深层次、多方



作家丁玲（前排中）划为右派后发配在北大荒

面的沉痛教训，是用无数血泪换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后代，绝对无权淡化、忘怀这段历史，更不该再允许此类悲剧在我们的国土上重演。

我也是这场悲剧中的一个角色。我整过人，55 万右派中，有经我手送下牢狱的。随后在 1959 年反右倾运动中我又挨了整。至于“文革”那甬提了。经历了这反反复复整人、被人整的坑坑坎坎，我还在继续反思。今天我想到的是，我党我国已经总结接受了许许多多经验教训，使我们重新行进在健康的大道上，前途无限光明，但我个人以为历史经验教训太多了，太深刻了，我们还没有完全地彻底地予以总结，这个工作还应该继续进行下去。就是彻底总结了，纠正它更好地前进，仍是一个艰难的长过程。因此，到今日还不能说，在中国产生“反右派”甚至“文革”的那种土壤、那些条件，已不复存在，已经完全消失，这就是现在众多仁人志士仍常常心存余悸的原因所在。所以回顾总结我党我国成绩、经验的同时，切不可轻视我们失败、教训的反思，这后一条如恩格斯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尤为重要。为此，我感谢本书作者，我的老同事在古稀之年写下这一篇赤诚的文字。季羨林教授多次呼吁大家执笔写写“文革”，其目的也是想借此教育后人，也包括今人。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 许人俊

“花生夜间开花”奇闻,是“文革”期间“四人帮”炮制出来的一场荒唐闹剧,目的是借工农兵学毛著、搞科研之名,贬低、打击知识分子。闹剧的主要人物是“花生大王”、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姚士昌。

姚士昌是山东蓬莱县原团结公社团结大队农民、党支部书记,在种花生过程中,他迎合当时弄虚作假的思潮,利用活学活用毛著的机会,谎称“发现了花生夜间开花的科学规律”,一度被新闻宣传部门吹捧为“花生大王”、“杰出的农民科学家”,顿时成为山东和政治舞台上的一颗耀眼的明星。随后,姚士昌官运亨通,由一个普通农民迅速被委任为蓬莱县委副书记、烟台地委副书记,继而又调入省城任山东省文教办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粉碎“四人帮”后,他被查处回乡,我因参与调查处理其问题,了解详情,现将有关情况披露如下。

他编造谎言,欺世盗名,鼓噪一时

1970年前后,学毛著在全国已进入高潮,从地方到中央所有的报刊、广播电台等,每天都连篇累牍发表各地工农兵活学活用毛著的心得体会和“动人事迹”。

当时,我们这批国务院农办的干部,正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劳动改造,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每天“天天读”后就下地干农活,收工回来还要念报纸,开展斗私批修活动。

一天,军代表发来《人民日报》,让大家认真学习。报纸刊登了山东花生大王姚士昌学毛著、种花生、夺高产的先进事迹。大标题《毛主席的

哲学思想打开了花生增产的秘密》赫然醒目。文章很长,几乎占了一整版,还配发了编者按语,按语高度评价农民科学家姚士昌活学活用毛著,通过长期实践,终于发现了“花生夜间开花的真理”,揭开了科学家们过去一直未解开秘密,是花生研究领域里的“重大突破”。

文章详细描述了姚士昌学毛著,运用哲学思想指导自己研究花生生产,终于把精神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夺得了花生高产,实现了从精神到物质的飞跃。文章说花生能否高产,关键在花生开的花要多,花越多,落地成果的机会越多,花生产量越高。为此,姚士昌刻苦学习《矛盾论》,领悟到花生增产的主要矛盾是开花,而研究花生何时开花又是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于是,他把这一点作为主攻方面加以研究、突破,认真翻阅、研究了许多花生专家、权威的著作,但感到那里面写的“尽是一些洋话”,看不懂,不解决问题,只好转而学毛著,从毛著中寻找答案。

为了研究花生何时开花,他反复读《矛盾论》、《实践论》,体会到一切研究结论都来源于实践,实践出真知,实践出真理。于是,他着手生产实践,起先在房前院子里用盆盆罐罐种花生,作为“试点”进行观察研究。后来又意识到只有“试点”不全面,既要有“点”,也要有“面”,“点”、“面”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于是,他又到离家一里外的大田里搞“面”上的实践,观察研究。为了掌握花生开花的规律,他说:“我一连在花生地里蹲了20多个夜晚”,“第二年我又一直观察了60多个晚上,初步发现了花生生长的一些内在联系,摸到了花生生长的一些规律。”“通过两年实践,我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不但发现了真理,而且有了新的发现,花生产量大幅

度增长。”

文章还披露,两年来姚士昌一心扑在花生研究上,天天在花生地里爬来爬去,裤腿都磨破了,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掌握了“花生白天不开花,而是夜里开花”的真理,填补了科学家们在花生科研上的“空白”。

那篇文章的震撼力很大,全国所有报纸一律全文转载。随后,上海《解放日报》、山东《大众日报》、北京《北京日报》等报纸,均争先恐后发表姚士昌活学活用的各类心得体会,掀起了一个宣传姚士昌的热潮,声势浩大。为了形成更大的宣传高潮,突出报道我国农民科学家发现“花生夜间开花”的奇迹,1970年秋天,北京有关方面指派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赶往山东蓬莱县团结大队拍制姚士昌《种花生的辩证法》,并迅速发给全国放映。

那时,我们“五七”干校的文化生活极度贫乏,除了听广播、读报纸,很少看电影,偶尔碰上看电影,也都是样板戏,或者是群众顺口溜形容的“中国的新闻简报,越南的飞机大炮,朝鲜的

又哭又笑(《卖花姑娘》),阿尔巴尼亚的一片胡闹。”恰好有一天轮上看电影,是北京刚拍制的新闻纪录片《种花生的辩证法》。不巧天公捣乱下起了大雨,而电影当夜还得转移到别处巡回放映,作为政治任务,不得改变。于是,军代表带领我们冒雨步行数里,集合到财政部干校场院,共同看姚士昌种花生的电影。雨越下越大,场地上的水越积越深,到处流淌。但是大家纪律严明,一个个都冒着大雨,静坐在小板凳上看电影。只见银幕上的姚士昌也冒着哗哗大雨,摸着黑夜,提着一盏马灯,急匆匆地钻进花生地里,趴在大田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精心尽意地观察花生何时开花。雨水顺着他的脸颊不断流淌,他的裤腿也明显被磨得破破烂烂。其景动人,其情感人,引人入胜,给我们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谁也没有想到这部新闻纪录片竟然是弄虚作假、哗众取宠的产物,害得我们冒雨受骗上当。

正是这样弄虚作假的宣传报道,加上姚士昌本人的表演,为他后来大踏步进入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他借“活学活用”, 以怨报德,不得人心

然而,姚士昌的风光岁月仅持续了六年。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全国拨乱反正,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第二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科技、教育工作座谈会上,强调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后来,他又提出要批判“四人帮”打击迫害知识分子、破坏我国科技教育事业的罪行。

广大知识分子深受鼓舞,不久山东省机关一位知识分子干部大胆执笔向党中央写信举报:“姚士昌不是花生专家,而是政治骗子。他所吹嘘的发现花生生长的规律,都是骗人的。所谓花生夜间开花之说,是十足的屁话。”举报人对姚士昌在花生问题上编造的谎言作了详细剖析,并反映了姚在经济和生活、思想作风上的种种问题。党中央很重视,一位副主席批示要农林部党组派调查组赴山东,会同省委联合调查处理此事。

农林部当即派红军出身的部级领导干部吕



大跃进年代,商庄人民公社红薯“计划”亩产15万斤

清同志带队,并从武汉抽调长期从事花生研究的孙大荣教授参加调查组。巧得很,一向对姚士昌学哲学、种花生印象深、感兴趣的我和另一名干部,也被调进调查组。山东省委对此事极为重视,第一书记白如冰立即召开常委会,确定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孙毅等参加调查,弄清情况,严肃处理。

在白如冰书记的直接领导下,我们在济南、烟台、蓬莱等地深入公社、大队和省花生研究所,通过集体座谈,个别访问,查阅报刊、图书,调看影视片,审查账目,同姚士昌面谈等方式,反复调查、核对、讨论,历时近两个月,终于将“花生夜间开花”问题的来龙去脉逐一查清。

山东蓬莱县历来是花生的传统产地,当地农民种花生经验丰富,产量高。姚士昌所在的团结公社团结大队比较突出,是远近闻名的花生高产先进典型,该大队队长是群众公认的种花生能手,经验更多。五六十年代,我国粮油严重短缺,省、地、县农业、粮食部门每年都要选择一些高产典型召开现场会,通过参观、座谈、典型发言等交流经验,促进生产发展,团结大队理所当然经常成为现场会的人选地点。但大队长文化低,为人本分老实,开会不善言谈,影响效果。于是,后来改由党支部书记姚士昌代表大队介绍经验。姚有文化,口齿伶俐,过去做过小买卖,机智灵活,能说会道,种花生也是能手。在现场会上,他把本地的经验介绍得头头是道,深得到会代表和各级领导的好评,他还善于把外地代表种花生的好措施、好经验,移植到本地、夺取花生高产,久而久之,他就成了团结大队的代表人物。

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的科研人员,通过现场会发现蓬莱县团结大队的花生生产很有一套,有培养前途,于是,决定派出一些科研人员到该大队蹲点,传授有关科学知识,介绍日照县等地花生增产的措施,帮助开展花生科学实验,努力提高产量。当时,姚士昌态度谦虚,学习勤奋,巧于钻研,表现出色。

1960年,山东省农科院为加强同农村的联系合作,决定选聘一些“在本地某科专业上具有代表性的先进生产者”为农民研究员,姚士昌是其中之一。这就成了“文革”期间把他作为“农民科学家”大肆宣扬的根据之一。

此后,省、地、县各级领导经常组织他到各地

现身说法,传授花生生产经验。那时,他都实话实说,多次承认团结大队的一些增产经验,都是自己在花生研究所研究人员手把手指导下,吸取了临沂地区日照、莒南县“青棵蹲苗”等先进措施取得的。

我们调查证实,姚士昌在“文革”前各种场合的讲话或文章,一般均符合实际,没有胡说乱编。然而,“文革”开始,尤其是1970年以后,随着整个社会风气变化,他的思想也在不断变化。加之他受到康生、曹轶欧的赏识、鼓励,他逐步迎合政治形势的需要,发挥能说会道的独特优势,开始了胡编乱造的政治生涯。

调查资料表明,1970年8月底,康生以毛主席关于“学习马列”的号召为借口,大抓工农兵学哲学用哲学。他和妻子曹轶欧指令中央党校立即组织力量调查工农兵学哲学的情况,选编工农兵学哲学的文章,邀请各地学哲学积极分子进京宣讲。姚士昌有幸入选,曹轶欧对这位胶东老乡的宣讲材料很感兴趣,亲自批示:“很好,颇像姚士昌的口吻。文章坚定有力,比姜某的那篇文章写得好,更真实,个别词句再斟酌一下。”姚随即应邀进京,给首都党政军机关做宣讲报告。曹轶欧还特地将胶东老乡安排在她所在的中央党校居住,热情接见,当面给予种种指示和鼓励,甚至赠礼品作纪念。姚士昌受宠若惊,兴奋不已,他心领神会地顺应时代潮流,到处开展宣讲活动,着重吹嘘自己刻苦学习毛主席的哲学著作,勇于从事花生研究,敢于同花生研究所的资产阶级专家、反动权威进行斗争,夺取花生高产的光辉历程。会议规模越大,人数越多,他吹劲越大,越善于发挥,而且越吹得活灵活现。为了哗众取宠、蛊惑人心,他竟以怨报德,把当年花生研究所派往大队帮助搞科研种植、夺高产的科研人员,作为“臭老九”批判,攻击他们是阻挠、破坏农民花生研究的反动权威,将他们说得一无是处,完全混淆黑白,颠倒是非。

姚士昌从首都宣讲回山东后神气十足,逢人就讲康老、曹大姐,炫耀曹轶欧大姐接待了自己,赠送了纪念品,还说某某、某某部长请自己吃饭等等……这些都成了他的沽名钓誉的政治资本。北京之行,使他名利双收,他做梦也没想到官运来得那么快、那么顺,很快他就登上特快列车,迅

速由蓬莱、烟台直达济南,当上了省里的大官。他作为省文教办主任、省革委会副主任,以农民科学家的身份被派去占领山东省文教领域的政治舞台,承担同资产阶级专家、反动学术权威进行坚决斗争的历史使命。在省高等院校教师大会上,他不时对教授们拍桌子、发脾气,严厉训斥“臭老九”,要大家脱胎换骨改造思想。他公开扬言:“我是种花生的农民,头上没有帽子,有劳动的双手,不怕同你们斗。大不了,我回家种花生去!”许多老教授、老专家坐在台下挨他训斥,心里憋气,但敢怒不敢言,只能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他拿科学开玩笑,最终身败名裂

中国农科院油料研究所孙大荣教授,是长期从事花生研究的专家,他为人正派沉稳,熟知国内外花生科研的信息。他同许多花生研究专家一样,在调查姚士昌的问题时都反复强调:花生开花是光合作用,完全受阳光支配影响。白天开花,夜间不开花,阴天迟开花,这是自然规律,也是科学真理和定律,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古今中外概莫例外,已成为国际公认的普通常识。不仅花生是如此,其他所有植物开花也是如此。只有昙花等少数植物具备个别特性,它是夜间开花,故有“昙花一现”的说法。

历史资料也表明,我国古代书籍上早有花生的花“晨开暮落”的文字记载。50年代山东省花生研究所对花生何时开花,曾作过长期观察、测定、记录,标明烟台地区,晴天,花生开花的具体时间是:6月份五点半,7月份六点,8月份六点半。这说明花生何时开花,早有定论,并非新问题。

我们从查证的历史资料中看出,1966年10月15日以前,姚士昌在所有口头报告和文章中,尽管也提到他夜间曾观察花生何时开花的情节,但从未敢说发现花生夜间开花的秘密,那时的提法尚属恰当,基本符合实际情况。

1966年10月15日,他在山东《大众日报》的文章说:“怎么开花?我头天晚上九点多去看了一个多小时,第二天晚上十二点多又去看了一个多小时,第三天夜里三点半裂了小缝。过了一

个半小时,花生开花了,计算起来是五点钟开花。”这个说法,同省花生研究所测定的烟台地区花生五点半开花大体吻合。此时,他依然没敢胡说花生夜间开花,而是如实说凌晨五点钟开花。

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姚士昌在活学活用过程中,凭着聪明的脑袋、灵敏的嗅觉,逐步嗅到了一些新的政治气味。尤其是1970年新华社记者专程到蓬莱县采访他后,他心有灵犀一点通,突然大彻大悟,开始大讲过去从未讲过的动人故事,尽力渲染,吸引了新闻宣传部门的注意力,争相宣传报道。应邀进京宣讲,受到康生、曹轶欧的关怀、接见、鼓励后,他更是天花乱坠大吹大擂。先是把日照、莒南县创造的“花生青棵蹲苗”法,说成是自己“摸索”、“创造”的,谎称“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青棵蹲苗。”继而在花生开花问题上,他又充分发挥想象力,讲述一些引人入胜的故事,而且把这些故事同《矛盾论》、《实践论》中的哲学思想,巧妙地结合起来加以渲染,使他研究“花生夜间开花”之事更富有故事性、生动性、理论性和欺骗性。

随后,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北京电视台奉命派摄制组到蓬莱县团结大队,加紧制作姚士昌冒大雨研究花生夜间开花的新闻纪录片。但天公不作美,总是不下雨,只好从县里调消防队,动用救火车往花生地的上空喷水,人工制造夜间下大雨的气氛。县里农业部门有关技术干部对“花生夜间开花”本来就有不同看法,加之如今又动用消防车降雨,更有意见,认为明显弄虚作假。然而,此时此刻的姚士昌已忘乎所以,依然提着马灯,冒着人工大雨,在花生地里故作姿态进行精彩表演。通过那次调查,我才发现当初在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冒大雨观看的感人电影,竟是如此弄虚作假炮制出来的作品,大有受骗上当之感觉。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周报》(英文版)当然也不甘落后,迅速将姚士昌活学活用、发现“花生夜间开花”一事视为“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成果,列为重要新闻,用英语向海外广泛传播,力图扩大国际影响。殊不知,“植物开花受阳光支配”这一观点,在国际上也是公认的

普通常识。如今中国农民科学家居然宣称发现了“花生夜间开花”的秘密,并向海外大肆宣扬,岂不是拿科学开国际玩笑!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很快收到群众来信反映:外宾听了广播后曾公开向我方索要“夜间开花”的花生品种。一些科研单位的专家也证实:英国皇家学会曾致函我国外交学会,要求中方提供“夜间开花”的花生种子,给我我国造成被动,严重损害了我国科研事业的国际声誉,对外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许多科研人员都愤怒谴责姚士昌胡说八道,拿国家形象当儿戏,给中国人丢脸!

当然,这些情况一般人均不知道,而且在极左错误路线占主导地位的时期,谁也不敢去揭露“花生夜间开花”的谎言。所以,姚士昌的仕途生涯一直未受到任何影响,反而步步高升,直至登上省革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权位。他地位变了,思想和生活作风随之变化,贪心也大了,逐渐由好吃好喝,进而发展到公开要吃要喝,越吃范围越大,越吃越严重。他好吃羊肉、喝羊汤,吃得全省闻名。只要姚士昌一到,当地赶紧捉羊、宰羊,煮肉,炖汤,酒肉伺候。地方群众不满说:“共产党养不起这个阔老爷。”更有甚者,他在县、省两处还领取双份补贴和救济金,而且利用职权为亲属子女谋私利、走后门。

姚士昌是个聪明人,思想转得也快。当“四人帮”被粉碎,康生、曹轶欧受到揭露时,他在省委领导下立即积极投入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作了一些工作。当我们找到他调查、核对“花生夜间开花”等问题时,他态度诚恳,承认世界观

没有改造好,私心杂念严重,在花生问题上弄虚作假,说了谎话,影响很坏,犯了严重错误,辜负了党的培养教育,对不起党和人民。他悔恨交加,流了眼泪,在经济问题上迅速退赔。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白如冰,农林部党组书记杨立功为此分别主持会议,详细听取联合调查组的汇报,对姚士昌在花生问题上弄虚作假的问题多次进行研究,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他们认为既有他主观上的思想路线不正,党性不纯,世界观未改造好,个人主义严重,喜欢胡吹乱编,弄虚作假,争名夺利等个人因素;也有“四人帮”借助活学活用的旗号,诱导他借题发挥,帮他造假“拔高”,开展政治宣传,制造思想混乱等客观因素。两个方面,相互影响,互为作用,致使姚士昌在花生问题上谎言越说越多,范围越传越广,名气越吹越响,危害越来越大。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传统,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山东省委、农林部党组一致同意请中央:

1、撤销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省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在适当范围内通过整风对其错误进行清理、批判、教育,然后安排其回基层工作、劳动。

2、全国宣传出版部门一律停止对姚士昌学哲学、种花生的宣传,原有宣传“花生夜间开花”的影视、幻灯片、图片、书籍、戏曲等立即停映(演)或封存,不得出售。

风光一时的姚士昌政治生涯至此结束,他悄然离开了历史舞台。

(责任编辑 吴 思)

欢迎邮购《炎黄春秋》近年合订本

2002年合订本已装订完毕

1996年合订本:简装:49元;精装:52元

1997年合订本:简装:无;精装:52元

1998年合订本:简装:无;精装:56元

1999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0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1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2002年合订本:简装:51元;精装:56元

(免收邮费 挂号邮寄)

通 告

本刊编辑部从1995年以前45期的650万字中精心筛选出150万字的文章,分类编辑了一套五卷本《炎黄春秋》精品书系。各卷分别为:《历史谜案揭秘》、《政坛高层动态》、《重大决策幕后》、《名流写真》、《血荐轩辕》,现已全部售完,特此告知,请勿再汇款。

《炎黄春秋》发行部地址:北京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电话:(010)68532048 邮编:100045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 24 年

● 赵发生

1953年6月,我从江西省商业厅调到武汉工作,任中南局商业局局长。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中南局军政委员会财贸委员会的会议上,来了30多人,都是中南局军政委员会领导和财贸口的负责人,在座的我认识的有林彪、叶剑英、邓子恢、曾传六、牛荫冠、牛佩宗等人,他们大多是我的老上级。先念同志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关于解决目前湖北省粮食紧张的问题。

先念同志讲话一开头就直奔主题,他说:“现在湖北省粮食问题吃紧,全省缺口达300万斤。本来希望中央调拨一些粮食以解燃眉之急,看来是不可能了,全国都在告急!全国粮食收支已经出现40亿斤的赤字。今年小麦受灾,又减产70亿斤,形势相当严峻。全国财经会议的粮食组也感到粮食供销形势问题很大,办法不多,难以为继。今天特请大家来,共同出谋划策,看看如何解决我省的粮食缺口问题。”

先念同志讲完,大家开始议论纷纷,会场气氛凝重。有的说,今年是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随着全国范围内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城镇人口增加,吃商品粮的人数大大增加,造成商品粮消费的急剧增加。有的说,在粮食自由市场上,一些粮食投机商利用产需矛盾,兴风作浪,抢购粮食,与国营粮食部门争夺市场,也是造成粮食形势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听来听去,大家确实把粮食紧张的原因都摆出来了,但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还是没有找到。

会议休息时,在延安时期的老首长叶剑英向我走来和我打了个招呼,还问到:“黎浩可好?”我曾经当过剑英同志的政治秘书,当时妻子黎浩在延安鲁艺工作,和他也熟悉。一晃十来年没有见到叶帅了,我这次见到他还是那么精神抖擞,依然风度翩翩。

休息之后继续开会,大家还是一筹莫展,就连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林彪也沉默着,自始至终一语未发。眼看快

到中午了,我要求发言,先念同志颌首。我说:“我是刚刚从江西调来的,对江西的粮食情况比较了解。江西这两年风调雨顺,全省连续获得半收,征购大于销售,市场稳定,储备粮食比较多。我和江西省委、省政府的领导同志比较熟悉,我想我去向江西省借几百万斤粮食,估计问题不大。”

先念同志兴奋地点着头,说:“那好,借粮的事情就由你去办,具体问题你可直接找我。”

我向江西省委借粮的事,得到邵式平省长的大力支持,很快办妥。1954年,先念同志从湖北调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1955年10月我调到北京,先后任农产品采购部部长助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受先念同志的直接领导。

1958年7月24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任命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副部长,在那张浅褐色的委任状上,盖有蓝色的周恩来总理的签名章。从此,我开始了长达20余年的粮食工作生涯。

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粮食部,经周恩来总理提名,民主人士章乃器被任命为首任中央粮食部部长。副部长有陈国栋、陈希云、黄静波、聂洪均、喻杰、周康民等人。当1958年我被任命为粮食部副部长时,黄静波同志已经调离粮食部,陈希云同志去世,章乃器已划为右派,部长一职由沙千里担任。

我到粮食部时,实际主持粮食部工作的是第一副部长陈国栋同志。他记忆力好,工作能力强,为人正派,和蔼厚道。在工作上他坚决执行国务院对粮食工作的方针政策,但在庐山会议后被认为“思想右倾”受到批评。在“文革”中他受到很大冲击,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

从1958年到1982年退居二线时,我在粮食部工作20多年,基本上是在业务工作第一线,负责全国粮食的购、销、调、存工作,这是一项上挂中央、下连全国人民的

工作。那时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同志亲自抓粮食，连毛泽东主席也时时牵挂着粮食问题。

一旦总理办公室来了电话，我便立刻起来赶到中南海开会或汇报情况。

周恩来的记忆力非常好，他对国务院各个部、委上报的报表都要亲自过目，笔笔核算，任何微小的差错都逃不过他的慧目。周总理对国务院各部委的领导干部要求很严格，必须做到心中有数。管业务的副部长要把报上来的报表装在心里，当他问到任何数字，回答要脱口而出，不能错。这样，副部长们对自己主管的业务亲历亲为、兢兢业业才能达到要求。中央要求必须“三三制”，就是主管业务的同志每年要有三分之二的时间，大约八、九个月到外地，下基层，三分之一在北京。那时，我经常出差，为粮食工作几乎跑遍全国，行李简单，提起一只棕色小皮箱，说走就走。对历年来各个省的粮食产、供、销、调、存情况都能做到心中有数，我与各个省市的粮食厅、局的干部很熟悉，当周总理过问全国粮食工作情况时，就能够应答迅速。

1956年，陈云和周恩来等领导开展反冒进，把过大的建设规模降下来。进入1958年，批评反冒进的斗争升级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召开的一系列会议上，周恩来、陈云受到了点名批评。批评了反冒进，各地纷纷为经济上的冒进加热、升温，从而形成了贻祸惨烈的“大跃进”狂潮。

周恩来总理领导的国务院各部委工作如同走钢丝，

不能不小心翼翼。我不敢掉以轻心，工作上尤其要兢兢业业，仔细慎重，只有在考虑成熟时，才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像在“统购统销”的60年代，我初次提出收购议价粮食的建议，得到周总理、陈云和李先念的积极支持、推广，在全国粮食工作会议上，得到经济专家薛暮桥的赞同。可是在“文革”中被江青等人批判为“资本主义路线”而无法实施。

从解放后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人均粮食产量长期徘徊在600斤左右，难以适应国家建设发展速度和军需民食的要求，统筹安排全国粮食的供需平衡，是非常困难的。特别是在三年国民经济困难时期和“文革”十年动乱中，粮食供应方面的困难是最突出的，直接关系到亿万人民的生存和社会的稳定。粮食工作几乎天天牵动中央领导人的心，消耗他们的精力。那时，周总理为全国理财当家，夜以继日。先念同志勤勤恳恳地工作，他每天起得很早，到中南海岸边散步回来，就审批文件，翻阅有关粮食方面的报表，了解粮食的产、供、销、调、运等方面最新动态。到大家上班时，他已批完一大摞。碰巧上午请部长们来开会，他拿出已经批过的文件，有的部长还没看呢！在那些年月里，我作为主管粮食业务工作的副部长，几乎每天要同周总理或先念同志见面，有时甚至一天要见两三次。

在解放后国家粮食比较紧张的头30年中，江西、江苏、湖南、湖北、四川等省都为全国的粮食调拨作出过巨大贡献，其中以江西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在粮食部有这么个说法：“只有江西是个‘不倒翁’。”为什么呢？别的省粮食是有出有进，惟有江西是只出不进。解放后它每年至少要向国家调拨8—10亿斤粮食，包括在自然灾害最严重的三年里，这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是了不起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除新疆、西藏以外各省都有成千上万的百姓离家舍土，逃荒要饭，尤以安徽、山东、河南居多。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看到一些羸弱



赵发生（右二）在西安检查粮店

妇孺在南昌、九江沿街乞讨，心中很是惻然。他指示省民政厅长、独腿的老红军谢象晃：不论他们来自哪个省，都是中国的老百姓，不能让他们饿死在江西境内，一律要给他们饭吃。谢象晃遵照省委指示，在江西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上开设了粥棚，每日为灾民免费提供赖以活命的米粥。据不完全统计，江西的粥棚救助的灾民达数百万人次。

解放后江西为什么能很快把农业搞上去呢？一是因为江西省狠抓了农田水利建设；二是在1958年经过“头脑发热”后冷却得比较快，农业生产一直走在全国的前面。在国家三年困难时期，江西的粮食产量仍然稳定，总产量居全国第二位。

1961年9月17日，周恩来总理从庐山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带着一批省市书记，由杨尚奎陪同来到南昌，在省委举行的招待便宴上大家纷纷向敬爱的总理敬酒。总理笑着说：

“要敬就敬三杯！但我有个条件，干一杯酒，要增加你们省外调粮食一亿斤，好不好？”

三杯酒就是三亿斤粮食。杨尚奎明白，总理不到万般无奈之时，也不会给江西压下这三亿斤的外调任务。头年四、五月间，他到北京开会时，总理就特地来到他的房间求助说，去年全国有好几个产粮省，包括四川这样的粮食大省都遭了灾，估计今年生产形势也很糟糕，所以中央在粮食问题上遇到了越来越大的困难。北京、天津、上海的粮食库存现在已经挖空了，调进的粮食不够市场供应。如果不马上调一批粮食救急，这样的大城市一旦发生粮荒，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总理言辞恳切地说：“江西已经调出了十亿斤粮食，作出了很大贡献，而且你们自己也有困难。但是，和别的省比起来，你们还是好的。所以今天我特来和你商量，能不能再增调两亿斤，支援中央，救救燃眉之急？”杨尚奎向总理汇报了江西的情况，说：“灾情严重的地方，已经出现大批浮肿病人，个别县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公共食堂煮的‘饭’，基本上是红薯叶子呀！”杨尚奎流着眼泪说：“在猪肉、食油、禽、蛋之类都少到几乎没有的时候，一餐吃一斤米，就像吃根冰棒一样。干部直喊饿，我们不让喊，不让发牢骚。他们嘴一闭，牙一咬，挺下去。”可是，杨尚奎看到总理心事重重，眉宇间深藏着忧郁，答应回去统一一下认识，再勒紧一次裤带支援中央吧！

总理高兴地笑了：“我就知道老表的风格高！谢谢你，尚奎同志，我代表中央和人民谢谢你！”1961年，江西人民克服困难，仍外调了15亿斤粮食。



赵发生（右）和李先念在一起

共和国不会忘记江西人民的贡献。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的粮食问题十分吃紧。华中重镇武汉缺粮到了最紧张的时候，全市粮店的粮食只够销三天，居民的基本定量口粮每月都得分成几次供应。武汉钢铁厂职工在饥饿的阴影下，折腾超声波煮食物使其体积膨大了糊弄肠胃。粮库告罄，市里已经没有存粮，各单位还在告急。情急之下，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看到长江里有一条从重庆开往上海的过境大船，船上约有一千万斤供出口的大米。他眼睛一亮，当即决定扣船，卸下大米以应武汉之急。他也不管出口货物是一环扣一环的，这船大米务必按与外商签订的合同规定时间内运到上海港口，装上外轮，否则要罚以重金，是外汇，损失可就大了，而我国当时外汇十分紧缺。“外事无小事”，此事惊动了中央。周总理说：“要严厉查处这件事！”总书记邓小平说：“要撤王任重的职！”省长张体学以省委的名义给李先念挂电话，泪流满面地恳求：“请尽快拨一些粮食给我们。天灾人祸，人民在挨饿呀！我没做好工作，给我什么处分都没意见，只请求中央支持我们粮食！”

李先念急不可待地要我：“你能不能再向江西借点

粮,帮助他一下?”

我立刻乘飞机到汉口,一下飞机就见到王任重亲自来接我。在去宾馆的路上,他让司机把汽车开慢点,指着大街说:“你看,所有的粮店都关了门,外地人来汉口,有钱都吃不上饭。我们向邻区告借,只得杯水车薪。万般无奈才出了‘截船’的下策,受到中央的严厉批评,我没话可说,可老百姓在饿肚子啊!”

到了宾馆,我立即拨长途电话给江西,得到江西大力支持,他们同意借调三千万斤粮食给汉口,并约定当年秋后还给江西。另外我又从中央粮库调三千万斤粮食存在汉口。我告诉王任重:“这是中央的机动粮,如果你们急需时可经国务院批准借用。但要有个账,你们秋收后如数归还才行。”王任重同意了。他有了粮食,先还一船大米给上海出口,赶上了船期。我向他提出几个建议:“开些高价饭馆,主食卖贵点。一角多钱一斤的粮食可以卖三、四角一斤,不收粮票。”王任重都采纳并立即付诸实施。我在武汉三天,他整整陪我三天,我给他解决了紧急的粮食问题使他如释重负。

回到北京,我向陈云和先念同志作了汇报。他们认为饭馆采取收粮票的办法好,采纳了我的意见。后来陈云和先念同志作出指示:全国的饭馆一律收取粮票。这在当时对于节约用粮和保障社会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大跃进”的年代,各地都疯狂地大搞浮夸,虚报瞒产,把一亩地的粮食产量吹成上万斤甚至十几万斤,一时间中国的粮食似乎多得不得了。各地兴起大办食堂的风,居然号召“敞开肚皮吃饭”,根本拿粮食不当回事。

我是做全国粮食工作的,眼看着1958年的“大跃进”、大办食堂和严重的自然灾害给粮食工作带来的困难,忧心如焚。

1958年本是个风调雨顺的好年景,但在那年全国一折腾,青壮年农民去修水利、大炼钢铁,庄稼熟了烂在地里,却是增产不增收。以后遇到延续三年的大旱,粮食产量连续大幅度下降,三年平均年产量3073亿斤,比1957年减产21.2%,人均占有量减少170斤。

这时国家库存粮食已经越来越少,各地也库存无多,都纷纷向中央告急。为了平衡地区间粮食余缺,保证城乡粮食供应,惟有加强全国粮食的统一调度。中央决定成立中央粮油棉调运指挥部,由李先念挂帅,把粮食紧急调给脱销地区。当时还搞了“以早济晚”和“以晚济早”的季节性调剂,即每年夏秋季节,先把南方收获较早的小麦、大麦、早稻等调运到东北,接济东北秋粮登场前的市场供应;然后又在冬春季节里,将东北的晚熟粮食返调给关内

缺粮地区度过春荒。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在当时是迫不得已的,不过对保证军需民食还是起过一定的作用。

粮食产量下降,副食品供应匮乏,糠菜不济,饥馑波及城乡各地,特别是农村。全国粮食问题越来越严重。1960年9月,中央发出指示,要求搞“低标准、瓜菜代”,降低口粮标准,大搞瓜菜,大搞代用食品。当时由中国科学院建议,由中央推荐的代食品有玉米根粉、小麦根粉、玉米秆面粉、橡子面粉、叶蛋白、人造肉精、小球藻等。这些设想基本上是在实验阶段,数量很少,起不了什么作用。

由于粮食紧张情况加剧,人们营养不良,浮肿病大范围出现,农村饿死人的事时有发生。中央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动员家在农村的城市职工返乡,大约有一千万左右,以减少吃商品粮的人数;动员干部自报减少粮食定量。

在1959年夏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庐山会议上批判了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李先念以国务院财贸办公室的名义写给中央的报告,实事求是地指出:“把预算、信贷、物资的全面情况综合起来”看,真实情况是:财政结余并不存在,国家预算出现了赤字。当时参加庐山会议的张闻天到先念同志处了解有关情况,先念同志把情况和数字告诉了他,因此也被批评为“思想右倾”,并被指责“为张闻天提供‘炮弹’”。这使党内生活更不民主,人人噤若寒蝉,下情不明,给中央指导经济工作带来很大困难。黄克诚晚年回顾庐山会议的教训时,不无悲怆地说:“这个事件对我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巨大深远,这不是一人或几个人的悲剧,而是我党的悲剧。从此,党内失了敢言之士,而迁就、逢迎之风日盛。”

1960年进入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粮食问题愈加重,一些官员的浮夸之风还在通行无阻。他们顺着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口味向上报告说“形势大好”,“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对日益严重的水旱灾害,饿死人等不是隐情不报,就是避重就轻。在河南,1958年全省的粮食产量只有281亿斤,省委却吹估为702亿斤,结果导致了全省性的高征购,“反瞒产”。一些干部严重违法乱纪,哪个基层干部完不成征购任务,就被扣上“小彭德怀”的帽子,进行“反瞒产”。因向农民逼粮食而实行捆、绑、吊、打、捕等现象,屡见不鲜。农民处境异常困难,一些地区逃难的、乞讨的、浮肿病泛滥,几致十室九空。

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省一些地方受灾及饿死人

的情况陆续反映到中央,引起了重视。我到苏皖调查,沿途时常遇见结队逃荒要饭的、扒火车的。徐、淮地区的几个收容站住满了逃荒要饭的乞丐、盲流。看着这些饥馑的老人、目光呆滞的妇女和骨瘦如柴的孩子,我心如刀绞。我向柯庆施汇报时,提出要去淮南考察,他表现得很傲慢而且不耐烦,说:“华东的情况我们清楚,淮南没有问题。”

为了解决极为困难的粮食问题,1960年,李先念副总理提议进口一部分粮食,这是要承担一定风险的,因为“自力更生”是基本国策,毛主席又有“不吃进口粮”的指示。可是粮食连年减产,库存见底,救民如救火。周总理、陈云都支持这个提议,认为进口粮食对稳定国民经济、克服粮食紧张、保护农民积极性有利,因此得到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批准。

在进出口粮食的实践中,我们发现,国际市场上大米价格是小麦、玉米的1—2倍,出口1吨大米可以换回1.7吨小麦或2吨玉米。如果出口汇率较高的大米、大豆、杂粮,进口小麦、玉米,在外汇平衡的情况下,将多进口许多粮食,先念向总理提出后得到批准。实施后,我们国家获益巨大。出口粮食换汇最好的时候是1973年,1吨大米换回2.7吨小麦,我们那年出口300万吨大米,占世界第一。1971—1976年5年间进口粮食比出口粮食多187亿斤,进出口平衡后,另增加外汇收入7亿多美元,用于进口粮食工业的钢材及支援外贸。

60年代末,随着粮食产量逐年增加,粮食的经营和库存数量持续上升,仓库建设远远赶不上粮食储存的需要。那时国民经济尚未完全恢复,资金材料非常缺乏,粮库连做露天粮屯的席子也难以买到。这时,黑龙江省明水县发明了用一把草、一把泥建设的粮仓——“土圆仓”。它不需要钢材、木材、水泥等紧俏材料,造价低廉,技术含量不高又很实用,引起了我们的重视。1969年6月召开的全国粮食工作改革经验交流会上,推广建设“土圆仓”的经验。

大量建设“土圆仓”,缓和了粮食仓容不足的困难。它代替席穴露天保管粮食,改善储粮条件,对促进粮仓机械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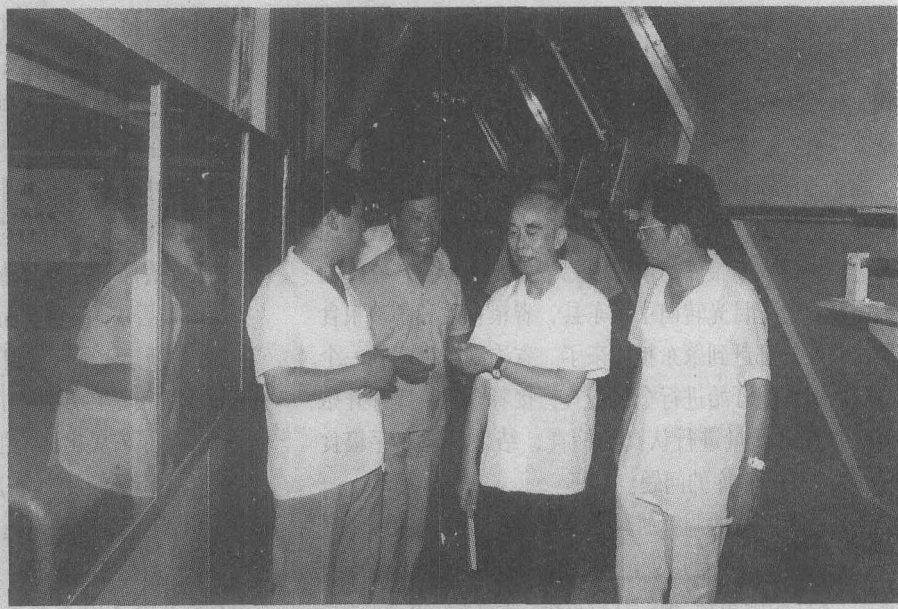
起了一定作用。

随着经济情况好转,粮食入库量大幅度增长,“土圆仓”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在沿海港口和一些交通枢纽地区建成一批现代化的立筒库;北京、天津和东北三省建成了大批以砖和钢筋混凝土结构的砖圆仓;南方发展拱顶高房仓;上海建起楼房仓;还有的地区建起小型钢板仓;还有大量的露天储粮货场。粮仓机械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文革”中粮食部受到的干扰比较大,第一副部长陈国栋等人被“打倒”靠边站了。经周总理提议,毛泽东批准,由国家计委副主任余秋里、国家经委副主任谷牧和林乎加组成“小计委”搬进国务院工作。国务院管业务的部委也在周总理的安排下组成“小班子”。在粮食部建立两套班子:大班子是以造反派为首的大多数人参加搞运动的所谓“抓革命”。其他的副部长有的被“打倒”,有的“靠边站”,搞业务的就剩下我了,于是组成以我为首的“促生产”小班子。

我为什么能在“文革”中侥幸不被打倒呢?第一,我1932年参加红军,赤贫出身,造反派抓不到我的“把柄”;第二,生活上我不搞特殊化,与职工和基层干部关系融洽,在抓“走资派”时他们保护了我;第三,在两派群众斗争中,坚持“不表态”,说我是“泥瓦匠”。

“文革”十年,不仅搞乱了经济,更是扰乱了人心。加上管理不善,一些缺乏有效监督机制的部门就很容易被钻了政策上的空子。1977年粮食系统净亏损猛增到70亿,比往年增加了20个亿。这些亏损不是由地方负担,而



赵发生(右二)在哈尔滨视察粮食工厂

是由中央财政负担。这20个亿是从中央财政部反映出来的,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极大重视。

1977年11月的一天,华国锋、李先念把商业部主管粮食工作的负责人找去开会。那年各省市粮食厅局资金都有亏损,几千万、几亿元的都有,其中以黑龙江省亏损最大,一年亏损竟达10亿!

华国锋说:“你们打算怎么办?”

我说:“给我两年时间,一定要把亏损扭转过来!”

华国锋听了我的表态,有点意外,说:“你们如果真的能在两年时间内扭转亏损,我给你们放鞭炮!奖励你们2000万元鞭炮钱。”

第二天,我就带了一个工作组奔赴黑龙江,这年我已经62岁。邓飞副部长带了一个组去吉林。几天过去了,粮库领导只是提及造成粮库亏损的表层原因。工作组分析,这些因素确实可以造成某些亏损,但不是造成重大亏损的根本原因。仅仅在肇东粮库,就亏损近亿元人民币,究竟原因在什么地方?我带领工作组直接进驻粮库。

一天,我从粮仓旁边走过,顺手抓了一把粮食,回到办公室一看,是一把带着冰碴的葵花子。我心里一沉:这摊水不就是政府用来购买粮食的钱吗?原来国库中无数的钱就是这样化成了水!基层粮食部门从农民手中收购农产品是有质量标准的,其中之一是含水量,在一定含水量以下适合于保存,不生虫、不霉变。就是超过标准含水量在粮食表面也不应见水分,当然不会成为冰碴。外行也不会用粮食价格去购买冰碴(水)的。基层粮食收购部门连这样不合格的农产品都收购,还收进县粮食仓库,实在是严重的失职!

且不说葵花子表面上的冰碴,它本身的质量如何呢?我一一嗑开葵花子,30%空壳,70%是瘪籽,成熟饱满的竟然没有一粒!我愤怒了。我干粮食工作这么多年,走遍了除去西藏以外的全国粮库,还没有见过一个粮库收购、储存这样的农产品的,这是对国家和人民的犯罪!我在北国边陲小县一个粮库的愤怒震撼了黑龙江全省,省委书记潘复生也把目光转向了肇东县,省粮食厅和各县粮食局两级领导都赶到肇东粮库来了。省委副书记率领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开始进行全面调查,接着全省粮库都开始对库存粮食质量进行认真的检查,结果发现库存粮食60%都有肇东粮库的问题。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组认为造成粮库亏损的原因主要有:一是用工浪费,临时工很多,冬天是冰天雪地,无法晾晒粮食,他们就没事做,直到来年6月;二是材料浪费,粮库里堆了许多几年用不上的席子、苫布、木

料等,造成浪费。为了解决粮食高水分问题,采取先收购,付部分款,但不入库,由农民在家里炕上烘烤。第二年春天,粮食系统在辽宁省召开东北三省粮食局长会议,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在粮食工作上及其它工作上都有了根本变化,黑龙江只用了一年就实现了扭亏为盈。全国粮食收购亏损20亿的问题,也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扭转过来,比我当初承诺的二年扭亏提前实现。

华国锋亲自给粮食部批了2000万的鞭炮钱兑现了。这类款项我们不能随便动用,最后还是进了大财政。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在计划经济时期,粮食收、购价格长期比较低廉,从原则上讲这没有什么错误。中国那时只能“以粮为纲,纲举目张”,泱泱大国,“无粮不稳”嘛!但是,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由于工业产品价格比较高,而农产品价格低廉,在短期内实行还可以应付,时间长了就一定会加大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伤害农民的积极性。谷贱伤农,中央也考虑到这一点。于是出台了一个“提高粮食收购价,销售却维持原来的价格不变”的政策。作为应急措施本是无可厚非的,但从根本上说却违反了经济规律。国家对粮食收购进行补贴,农民虽然高兴了,市民也不吃亏,只是苦了国家。这叫“政策性亏损”,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成为国家财政上的沉重包袱。尽管它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一旦成为“既定方针”,谁也不敢多说什么。粮食工作人员只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是人民把“粮食”这份家当交给我,我不能不为之筹谋。

1962年在粮食计划会议上,我提出收购议价粮问题,就是用高于平价粮的价格收购农民手中的余粮,提高农民出售余粮的积极性;同时将这批粮食高价供应市场,这叫“高进高出”,减少国家补贴。现在看来是天公地道的事情,在当时却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经济学家薛暮桥认为我的意见合理可行,周总理、陈云和李先念同志也认为有道理,粮食部多数副部长也表示赞同。但是更多的人不同意,害怕部分提价会造成社会不稳、人心不定,这个提案当时被否决了。随着社会向前发展,人们的思想开始变化,才逐渐接受了议价粮的观念。

议价粮是在计划经济时代打开的一个小小的缺口,它既调动了农民出售余粮的积极性,使农民增加了收入;又带动了市场经济,为工业和民用粮食打开了更多的货源渠道;对于国家来说既能多收购粮食,免除这部分的粮食补贴,还能略微增加一些收入。粮食系统从单纯赔钱变为有赔有赚,积极性也大大提高。

(责任编辑 刘家驹)

重访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 冯兰瑞

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是 62 年前我去延安时路过、停留了一段时间的地方。1939 年国民党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川东青委书记、我的领导杨述同志被捕。当时我正在重庆做秘密工作，同时又从事公开的青年群众救亡运动，已经暴露了，国民党当局三次动手抓我。为避难我于 1939 年秋到北碚育才学校教书。1940 年特务追捕到北碚，幸得当地区委书记王士槐到育才来紧急通知，我才匆忙转移，在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约一个月，党中央南方局决定送我回延安。与我同行的还有一位南渝中学的女同志尹锡康。

记得离开重庆“八办”的前一天，负责输送干部的廖似光同志（凯丰同志夫人）跟我谈话。她对我撤退的安全问题十分关切，亲切仔细地交待必须注意的事项，教我如何应付可能遇到的盘查，为我取了假名字，扮做中央银行高级职员，是奉调去西安工作的。送我们去陕西的是一位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他在褒城（今勉县）办了一个酒精厂，是个很好的统战关系。廖要我对他也不能暴露身份，只能说是银行职员，而对外又要称为酒精厂的职员。最后发给我们每人一笔路费，第二天还让一辆小轿车送我俩到七星岗长途汽



1946 年冯兰瑞（左）李昌结婚纪念

车站，使我们顺利离开重庆。

我们从重庆出发，过成都、绵阳、剑阁、广元，进陕西，又经宁强、汉中、秦岭、五顶山，到达褒城酒精厂，次日又乘原车到宝鸡，再乘火车到西安。这一路因为汽车破旧，路不好走，竟走了十几天。火车抵达西安，我俩就按照廖似光的嘱咐，一下车，连西安火车站是什么样都没看看，立即坐车直奔七贤庄一号“八办”。虽说一路上也和同车的人一起游山观景，但紧张的心情此刻才松弛下来，就像回到了家一样，感到安全了。

二

2002 年 5 月中旬，我重返西安故地，先参观了陕西历史博物馆，然后去看“八办”。

七贤庄是一条小街的名字,地处西安城内西南一隅,靠近后宰门,往来行人很少,周围非常僻静。从博物馆乘车,很快就到了。“八办”的大门,门右边悬挂的牌子原来是“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西安办事处”,现在换成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纪念馆”,白底金字,叶剑英老帅题写,左下方有署名和日期。大门左面台阶尽头贴墙有个约一米高的底座,上面矗立着长方形的说明牌,黑底白字,也很大方清楚,中间特大号字是:“西安 八路军办事处 旧址”。上面一行小字:“全国第三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我们在纪念馆门前照了两张相。

过去的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现在成了珍贵的革命遗址,难得的是仍然保持了当年的面貌。院外仍然是安静的小街、朴素的门厅,院内临街房屋是纪念馆办公室,仍然是那样简朴,当年伍云甫主任和工作人员的住房仍然只有一桌、一椅、一张木床。院中保留着中央领导同志董必武、林伯渠、周恩来……还有宣侠父等住过的房间。上了几级台阶从门外看进去,仍然还是那样简单朴素。

要说现在的“八办”与当年有什么不同,我认为最大的变化是占地面积扩大了一些。原来在七贤庄小街上,只有两个院子属于“八办”,一个是“八办”本部所在的一号,一个是招待所七号。现在七号没有了,当年全国各地的热血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闯过国民党的重重关卡,徒步穿越八百里秦川,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其中许多人都要到西安“八办”停留几天,或接关系,或办手续。“八办”招待所就像是个“驿站”,送往迎来,好不兴旺。如今成为革命的纪念馆,这个“驿站”历史作用已经完成。另一方面,“八办”却由一个院落变成了四个院落。工作人员介绍说,为建纪念馆,把和一号院相连的三个院子买了下来,打通了。确实,我们从一号院往左看去,就发现有三个古色古香、建筑精致的月宫门(圆形的门)贯通着。这个小小的建筑与原来的平房很是协调匹配。最后的一排长长的展厅,共有约八间,看来也是四个院子的最后一排房间改造的。展厅面积虽远不能与刚才看过的历史博物馆相比,但作为一个地方的八路军办事处纪念馆,也可以了。

纪念馆的女同志特别领我们去看了一个残

留的水井。此井位于第二排房屋尽头的墙角,是从第一进院到第二进院的必经之地。她问我这个水井是否同以前一样?我说过去没有看到过。因为一到七贤庄,伍云甫主任就宣布纪律,去延安的同志住招待所,不许外出,以免发生意外,也不许到办事处乱串,我们是严格遵守的。西安是“国统区”,“八办”处在白色恐怖包围中,内部有很多机密,有一些中央领导人往来,暂住,必须严格保密。我当时住七号招待所,只是第二天跟着一位小八路到一号院理了一次发。

这个残留的水井,没有了提水的吊桶,只有残存的辘轳和缠在上面的干枯破旧的井绳。原来1940年我路过西安,住“八办”招待所近一个月,从没想到“八办”的工作人员就是用这件十分原始的工具打水,供应我们这许多来往人员饮用的。想到当年“八办”战士们的辛苦,不胜感慨。看过水井,她还领我去看当年的理发室。这是一个较大的房间,面积相当于两个中式平房的自然间,里面的设备也保持原样。旧桌上放置理发工具,屋角一个木制的脸盆架,已经很旧。屋子中间一个长方形凳子,是供理发的人坐的。不明白的是理发者头顶上还挂着一块厚厚的黑乎乎的不像是棉被又不像棉门帘的东西。这位女同志解释说,是天热理发时用绳索拉动煽风的。问我还记不记得,我确实记不得了。大约因为我到这里理发时天气还不怎么热之缘故吧。

三

随即我走进一间会议室。一进会议室,“彭德怀小屋”五个字已清清楚楚映入我的眼帘。过去一看,门是关着的,只能透过上半部的玻璃看到里边的布置。迎面一张彭德怀的照片,一张单人床,上有床单和薄薄的军毯,桌子只能看到一角,桌前一把藤椅。再看墙上的说明,原来抗战期间,时任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的彭德怀同志,曾经八次过往西安,都住在这里,此小屋因而得名。说明牌上还记载着彭总当年怒斥国民党“反共专员”何绍南,使何不敢再去绥德当专员,从此绥德就归入了陕甘宁边区的事迹。

“说明”下面,是住过此屋的过往人员名单:胡乔木、王若飞、许光达、李昌、毛泽民、罗世文。

再下面是在这里住过的西办人员。

李昌住过西安办事处,我听说过但未知其详。回京后问起当年情况,李昌回忆说:1938年临汾沦陷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总队部搬到西安,当时他还是全国民先队总队长,民先总部在西安师范学院的前院。一天清晨,陕西省青委书记毕於红同志通知李昌说,得到内部消息,国民党陕西省党部要抓他。李昌赶紧清理机密文件,准备转移,警察已到门口。原来是当地警察局派出所来催民先总部去登记。李昌当即随他到派出所,

说,我已见过你们省党部书记郭紫锋,正在按程序办手续。李昌得知该派出所所长是东北人,还乘机向他宣传全国人民团结抗日的道理。告别派出所,他就雇车到了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正在西安的林伯渠主席觉得情况紧急,就决定李昌到宣侠父家中暂避。宣侠父与胡宗南是黄埔同学,在陕西很有名望。国民党武装特务到西安师院扑了个空,就追到宣家搜捕。李昌这时正躲在宣侠父床上帐中,军警没敢进屋。林老得知后,连忙带着“八办”随员以探望宣侠父为名,去宣家让李昌夹在同去的八路军中间回到办事处。为防备国民党军警闯进来搜查,又派人送李昌到新安旅行团陕西办事处藏起来,待风声渐小,才接李昌回办事处。不久,林老决定李昌转移去武汉。李昌遂扮成八路军军官,由“八办”护送到开往武汉的火车站。这就是离开西安之前,李昌曾住“彭德怀小屋”的经过。

这次来西安,见到李昌在“八办”住过的小屋,不啻是一个意外的收获。我马上拍照,并将“彭德怀小屋”的说明拍下来,留做纪念。

四

再穿过一个院子,我们来到“八办”最后一排房屋——纪念馆展厅。这里集中展出了美国女



作者 62 年后重返西安八路军办事处

记者史沫特莱和斯诺夫人的照片。这些照片生动地记述了她们同情中国革命,不辞艰苦,远渡重洋,来到中国,支持抗战的国际主义精神。展览生动表现了史沫特莱数十年坚持报道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和抗日战争,对世界说真话的“无冕之王”的高尚情操,也记录了她与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的革命友谊,感人至深。还展出了斯诺夫人与斯诺先生一起,在中国多年的活动。斯诺夫人继续完成丈夫的遗志,写了一本《续西行漫记》,这是以前不知道的。

往事如烟,祖国如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们这一代饱经风霜,历尽艰险的幸存者,这次重访“八办”,回顾历史,深感又受了一次革命传统的教育。我想,现在的年轻人大部分不知道、不理解历史,八路军西安办事处建为纪念馆,无疑是十分必要,很有远见的。不过作为纪念馆,对青年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来说,内容还显得单薄一些。如果有更多的与当年“八办”有关的我国革命者事迹和历史充实其间,使内容更突出、更丰满一些,展出的效果会更好。该馆似也有此考虑。临别时副馆长说,他们不久将赴北京,访问一些老同志,收集资料。

(本文作者系李昌同志夫人)

(责任编辑 仲文)

中共“九大”内幕琐忆

● 迟泽厚

1969年4月1日至24日,即在全国(台湾除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半年之后,“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九大”召开时,笔者正在广东“支左”,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办事组副组长。大会秘书处规定,每省可派一名工作人员与会,省革委会领导决定笔者以秘书身份参加这一工作。会议期间,笔者不仅像代表一样出席全部大小会议,还要负责办简报,参加大会秘书处召开的工作会议,并参加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选举的计票工作。由于参加活动较多,接触面广,特别是各省、各大军区参加大会的秘书中,有些还是笔者多年旧交,不免交流一些彼此关心的信息,因而,对这次大会的所见所闻,至今也难以忘怀。50年代,笔者曾参加过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和“八

大”二次会议。同那两次大会相比,再对照中国共产党党章,“九大”的开法和大会期间发生的许多问题,令人匪夷所思。

评价迥异的会议

参加“九大”的代表共1512人。住北京饭店的中南大组,由广东、广西、湖南、江西、安徽五省区和广州军区代表团组成,召集人为广州军区政委刘兴元和江西省革委会主任程世清。

4月1日下午,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亲自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然后是林彪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4月14日下午,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仍是毛泽东主持。先是大会发言,安排发言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和纪登奎等9人。各人发言前后,毛泽东不时插话或提问,会场气氛活跃。大会发言后,举手通过了林彪所作的政治报告和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4月24日下午,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由林彪主持。大会选举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在大会副秘书长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后,林彪又作简短讲话,通报了国内外来信来电祝贺“九大”情况,随即宣布大会闭幕,此时是21时37分。

毛泽东对“九大”给予很高评价,寄予很大期望,说“九大”是“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希望“大会以后,可以在全国取得更大的胜利”!然而,“九大”以后的历史发展,却大出毛泽东的预料。

迟到的会议

“八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举行一次。“八大”是1956年开的,到召开“九大”时,已经过去13年了。

为什么不能按时或稍微早些召开“九大”?江青在一次接见群众组织代表时揭开了其中奥秘:开会的时机要有利于“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她念了“文革”中“揪”出来的、以刘少奇为首

被认定是“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一长串名单,说这些人都是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如果是在“文革”前召开“九大”,那么,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将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有的还会进入核心领导机构,这样,就会大权旁落,“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岂不也要落空?江青讲到“现在”,不无得意地说,经过这场“文化大革命”,这些人都现出了原形,一个个都被斗倒批臭,问题自然都解决了,再开“九大”,进入中央的自然都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人了。

其实,推迟也罢,提前也罢,一切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需要与否。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有利的时机,就是最佳的开会时机。

神秘的会议

在1969年4月1日晚由新华社发布“九大”开幕的新闻公报之前,关于会议的筹备情况,对外采取了极为严格的保密措施。“文革”中,砸保密室、抢档案和向社会抛档案借以打击对手,是“造反派”的拿手好戏。特别是在一大批“造反派”进入共产党的各级权力机关之后,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保密观念和保密制度已经被破坏殆尽。但是,这次对“九大”的保密,却出现了奇迹。

出席“九大”的代表未经过选举,是由各级革委会“党

的核心小组”推荐定的,其中不少是红卫兵造反派的头头,很难对群众保密。为了切断与外界的一切联系,除极少数军政高级领导干部中的代表外,全体代表都在大会之前的三个多月,便以省市自治区为单位秘密集中,进行全封闭式的学习,随时准备出席大会。

广东省的代表集中在四面环水与省委机关一桥相连的小岛宾馆。眼看年关将近,进京还没消息,韶关地区的一位瑶族代表不干了,他提上自己的小包,不辞而别,桥头的哨兵把他拦住。学习班负责人闻讯大吃一惊,他问这位代表:“你不想到北京开会见伟大领袖毛主席吗?”这位代表一本正经地说:“快过年了,我家里就我一个男人,我不回去,过年的猪谁杀呀?”

这样的代表“路线觉悟”实在太低,只好叫韶关地区把人领走,另外调换一名代表,韶关地区革委会为此受到严厉批评。

一日复一日,一月又一月,终于盼来了进京通知。3月23日,以广东省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孔石泉为团长的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连同广州军区代表团的22名代表以及工作人员,由空军派来的一架伊尔-18运输机运抵北京西郊军用机场。飞机着陆的时间是19时10分,北京早已夜幕降临。这时间自然是经过精确计算的,代表们神不知鬼不觉地住进了宾馆。

参加“九大”的代表分住北京饭店、前门饭店和京西宾

馆。大会秘书处设在京西宾馆。各宾馆警卫森严,大门紧闭,代表一律不准外出;室内电话全部撤消,靠街的窗户不得打开,晚上须拉上窗帘。

终于等到4月1日下午举行大会,会场在人民大会堂。60年代的人民大会堂,只用于举行大型会议和中央领导人办公、接见活动,从不对外开放。平时四周遍布岗哨,不准群众接近,偏偏它又处于北京市区中心,过往群众无不对它充满了神秘感。现在,1500多名代表和几百名大会工作人员齐集人民大会堂,要想不让外界察觉,实在是一件不容易事。大会的组织者在这方面可谓煞费苦心。

上千人的大会最难保密的是乘车和进入会场。大会秘书处为此作了周密部署:

住各宾馆的代表一律乘大交通车,每车45人,定车定人,各代表团按顺序登车。

登车前,各代表团在宾馆楼下大厅集中排队候车,大交通车每次开来两辆,车门面向宾馆,刚好挡住大门,车刚停稳,门卫便打开紧闭的大门,代表们由代表团秘书或指定的人员带领,迅速登车,汽车很快起动。此后每隔三、四分钟,又有两辆大交通车开来。如此每个宾馆只需有六、七次,约半小时左右即可将全部代表接走。

行车路线是精心安排的。以住在北京饭店的代表为例,从他们的住处乘车直开人民大会堂,距离不到1公里,行车时间只需两、三分钟。但为

了掩人耳目,代表们的车子却背道而驶,向东开到东单,转而向南到崇文门沿前门东大街、西大街西行,再右转北新华街,兜了个大圈子,最后开进人民大会堂侧门院内停车,代表们就可隐蔽从容地由便门进入会场。

4月1日的大会,自始至终没有一人从人民大会堂正门进入会场。大会堂正门前的广场依然空空荡荡,不见任何大小车辆,大会堂四周的警卫战士仍像平时一样,或在哨位挺胸伫立,或在广场慢步巡逻。而此时的会场,用厚厚的深色窗帘把门窗遮盖得严严实实,看不到任何灯光人影,功夫下到这般地步,堪称滴水不漏。

大会于17时开始,毛泽东首先宣布了大会议事日程。接着选举大会主席团,共176人,名单已提前发给全体代表。毛泽东问大家赞成不赞成?下面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于是举手通过。然后是选举主席团主席、副主席和主席团秘书长。这时出现了富有人情味的一幕:毛泽东面带微笑地说:“什么人合适呀?我提议林彪同志当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不同意?”

这时会场出现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代表们发出会心的笑声。林彪赶紧把嘴向扩音机前凑了凑,大声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团主席!”

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站起来,笑着对大家说:“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当

主席团主席,大家同意请举手!”

代表们笑着高高举起右臂,林彪高喊:“通过!”会场又响起热烈掌声,接着是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声。

毛泽东接着说:“那就林彪同志当主席团副主席,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再次举手,热烈鼓掌。

毛泽东又说:“我提议周恩来同志当主席团秘书长,赞成的请举手!”代表们又举手,鼓掌。毛泽东高兴地说:“好,通过!”

于是毛泽东正式致开幕词。他没有讲稿,话也不长,但多次讲到要把这次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17时32分,林彪开始代表中共中央作政治报告。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以高亢激动的声音播出“九大”开幕的新闻时,确实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一些外国通讯社、报纸迅速报道了大会消息,或发表评论,对没有预先得知开会消息感到有些惊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一些中央领导人对此都深感高兴,好像是打了一场大胜仗。

“深厚的阶级感情”

“九大”代表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工农兵代表”占了最大比重。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中,有担任地区以上革委会领导的军队干部8人,县以上地方干部8人,其余42

人除个别厂矿企事业单位领导和所谓知识分子代表(1名技术员、1名县医院医生)外,全部来自工矿、农村,其中有些是“文革”期间才入党的新党员。而上海代表团一位“红卫兵”代表,竟然是1968年12月才发展入党,入党后马上当代表,而且被“选”进了大会主席团,接着又被“选”为候补中央委员,从入党到进入中央不到半年时间!这些人是“文革”的受惠者,因而,他们对“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由衷地怀有“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这种感情,在大会期间表达得淋漓尽致,当时的说法称为“表忠”。

4月1日开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致开幕词,口号声此起彼伏,讲话二十几分钟,竟被打断数十次之多。一些人也不管毛泽东讲到哪里,甚至一句话还没讲完,便站起来领呼口号。那时的口号都是成系列的,一喊就是一串,不能中途停下;有人领喊,大家就得跟着呼喊,而且要喊出精神来,不然就是缺乏“阶级感情”。一些党龄较长特别是来自军队和地方干部中的代表,深感听毛泽东讲话之机会极为难得,都全神贯注聆听伟大领袖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然而,他们的愿望却被无尽的口号声浪所破坏。毛泽东一开始就讲党的历史,从“一大”讲起,这是一个很有讲头的大题目。但是,会场的气氛却对他的讲话造成极大干扰,他也逐渐有些不耐烦了,不得不草草打住。最后,经大会秘

书处整理的毛泽东讲话稿仅有 649 字。他实际讲话时间少于呼口号的时间。

4 月 1 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九大”开幕的消息之后,大会秘书处

有限度地放宽了对代表们的保密要求,允许与外界通信。当时长途电话通话范围十分有限,不少青年代表纷纷涌向宾馆附设的电信所,满怀激情地向家乡或单位发电报,报告大会开幕和他们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景,要大家与他们分享这一幸福。有的代表从没有发过电报,在电信所工作人员帮助下艰难地起草电文,有的一写上千字,绝大部分是电台广播的内容。

青年代表入党时间短,不但政治理论基础差,文化程度也多数较低。但是他们也有长处,多数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冲杀出来的,经过“风雨”,见过“世面”,讲话不怯场,而且讲起来很有时代特色。汕头地区一位年仅 20 岁的大队妇女主任,在一次小组讨论会上说,她离开家乡时,社员们一再嘱咐她,到北京后见到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要多喊几声毛主席万岁。来到北京后,她激动得几天睡不好觉,她决心“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



“九大”开幕式

念念不忘阶级斗争,永远忠于毛主席,要“斗私批修”,努力掌握毛泽东思想。她说,私字像苦菜,挖掉还会长出来,私字不倒,江山不保,要坚决把私字扫地出门,让公字安家落户;离开了毛泽东思想,有脚走不上正路,有眼看不到阶级斗争。一位农民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介绍他所在大队开展学“毛著”运动的情况,说一些人原来认为学“毛著”当积极分子吃亏,“学得通,荷包空;学得透,人要瘦”,如今学“毛著”成为风气,农村风气大变,“以前老子说了算,儿子跟着干;现在不看爹不看妈,全靠毛泽东思想来当家”。这两位青年代表讲的,都属于当时流行的“套话”。但是他们运用得极为熟练,再加上丰富的表情,确实让一些老干部相形见绌。

毛泽东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这些青年代表可以不假思索地回答:阶级斗争。因而,“三忠于”(忠于毛主席,忠于毛泽东思想,忠于毛主席的革

命路线)的最高境界就是要狠抓阶级斗争。广东省博罗县黄山洞大队是全省最有名的学“毛著”先进单位,这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是个年近 40 岁的农民,他在小组会上介绍了他们党支部狠抓阶级斗争的经验。他们大队有个地主叫刘少奇,“文革”前,他们把这个地主的名字当成一条罪状,狠狠地批他:“你胆大包天!凭什么和我们的国家主席叫一个名字?”逼着这个地主改了名字。“文化大革命”中,原来的国家主席一夜之间成了“五毒俱全”的最大“走资派”,地主刘少奇也跟着沾边,大队党支部又把他拉出来批斗:“你就是刘少奇!你和北京的刘少奇是穿一条裤子的!”据说,经此一番批斗,社员们认识到刘少奇就在他们身边,从而大大提高了阶级斗争观念。

“表 忠”

4 月 24 日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那些青年代表们的无

产阶级感情再次得到极致发挥。会议于16时05分开始,会议的主要议程是选举第九届中央委员会。会场划分为七个区,每区设一个票箱,主席台上单设一个票箱。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分两次选举。16时28分,开始选举中央委员。由于主席团成员比大会场任何一个区的代表都少,因而主席台上的投票先行结束,主席团成员都回到各自的座位。突然,一个排队投票的青年代表在把选票投入票箱后,没有跟随前面的代表返回座位,却转身快步向主席台走去。但见他双手扶着主席台的前沿一撑,两腿一蹬,便轻松地跃上主席台,然后快步到前排中央,依次把手伸向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领袖们自然都一一与他握手。这位代表的成功举动,使许多怀有同样愿望的青年代表受到极大鼓舞。霎时间,有许多青年代表从投票的队列中或从座位上向着主席台跑去。原来躲在大幕后面的警卫人员纷纷出来阻拦,却顾此失彼,还是有不少人成功地冲到毛泽东、林彪和周恩来的面前,如愿以偿,成了“最最幸福的人”。最后,台上的工作人员不得不在台前组成一道人墙,才使局面得以控制。

大会结束时,再次出现了狂热的“表忠”场面。林彪宣布大会闭幕,毛泽东等坐在第一排的中央领导人刚刚离席,坐在会场前部的许多青年代表,几乎在同一时间蜂拥而上,一瞬间把主席台上摆的茶杯、铅笔、纸张全部抢光。

具有这种狂热表现的并不限于那些年轻的代表,个别老党员代表也不甘落后。在讨论林彪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政治报告时,海南岛的一位有30多年党龄的代表提出:新党章的总纲中,有一段对林彪的评价,写明“林彪同志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他要求把这段文字也写入政治报告中。有人笑着说:“你的意思挺好,不过,这是林副主席的报告,他怎么能说自己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呢?”不料,这位代表勃然变色:“这是广大党员的心愿和要求嘛,应该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反映嘛!”

这种人在中国政坛颇不少见,历久不衰。

“复古”

代表们到达北京后,大会秘书处负责人向各代表团秘书宣布会议期间的作息生活制度,说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在生活上要“复古”,住房、坐车、伙食都要从俭,为全国做榜样;代表们不论原来身居何职,都要打成一片,体现政治上平等的原则。据说伙食标准原曾考虑每天8角,最后才定为1元。

这次会议确实开得比较俭朴。吃饭10人一桌,凭票就餐,桌上基本不见剩菜。广东省代表团的58名代表,除团长孔石泉和早就在党内被称为“元老”的陈郁、王首道外,都是2至4人共住一房,广州军区参谋长阎仲川和广东省军区司令员黄荣海住在一起,

与原广州市委书记焦林义同住一房的是一位青年教师。除在京的极少数高级党政领导干部外,代表们外出开会和参观都坐大车。大会没有发放或制作任何纪念品。晚间看文艺演出,座位按代表团划分,前后不定。笔者有两次发现朱老总 and 董必武同志坐在广东代表团的后面,感到很不自在。演出的节目他们大概都是看过的,但是,是否参加代表团的活动,看不看革命文艺演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他们也是马虎不得的。4月26日,在天桥剧场演出革命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散场后,笔者见到朱老总由两名警卫战士搀扶着,站在剧场大门外等车。人们潮水般涌出剧场,朱老总的车子一时调不上来,他就一脸木然地站在那里继续等着,笔者顿觉一股悲辛涌上心头。这年,我们尊称的“红军之父”已83岁。

但是,要求别人如何如何的人,却未必身体力行。每次演出,“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总是先在剧院的贵宾室休息,到了演出时间,才在有关人员的前呼后拥下入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江青。他们在预留的大片最好的席位入席。此时全场观众还得热烈鼓掌对他们表示欢迎、致敬,演出结束时,大家又要起立鼓掌欢送他们退场。

如此选举

历次党代表大会对中央委员会的选举,都是会内会外关

注的焦点,这是观察中国以后若干年政治动向的最重要的依据。特别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巨变,中国今后向何处去?“九大”的选举,不但是全国人民,而且为国际所注目。

第九届中央委员会的格局,其实早在196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就已基本定下了。内定参加这次中央全会的“八大”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只有59人,仅为在世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人数的三分之一,其余三分之二绝大多数在“文革”中成了“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或“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些人既然无权参加中央全会,自然也就不能再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除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外,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其余74人,他们之中一部分是以江青、张春桥等为代表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暴发户,再就是中央直属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革委会和各大军区负责人。除个别人外,这些人后来都进入第九届中央委员会。

按照大会议程,从4月15日开始酝酿选举中央委员。先是由各代表团提出候选人名单,很多代表在提名时表示:小组提名有不少困难;以毛主席为首的主席团最了解全面情况,最了解党的历史,考虑问题最周到,对主席团提出的名单我们完全信赖,坚决拥护!

大会主席团将候选人分为四类:第一类是“中央文革

碰头会”成员和“八大”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第二类是“革命领导干部”;第三类是军队干部;第四类是来自基层的工农代表。对四类候选人提出了大体比例,要求总数控制在210—250人。各代表团提名相加实际为493人。经过综合平衡,在4月20日召开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由周恩来代表主席团提出了一个274人的候选人名单:第一类60人,其中有原曾任青年团中央第一书记的“八大”中央委员胡耀邦,据说因他认错态度不好,决定让原山东省委书记、“八大”中央委员谭启龙替换;第二类35人,周恩来特别提出其中的余秋里和原新疆党委第一书记王恩茂。说余对开发大庆油田有功,王有代表性,而且愿意改正错误,所以建议把他们作为革命干部的候选人;第三类99人都是军队干部,周恩来特地解释说,在四类候选人中,都有解放军代表,这是由军队的光辉历史和“文革”中参加“支左”和“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担任领导这一现实情况决定的,是完全合理的、必要的;第四类80人,其中产业工人46人,贫下中农25人,其他劳动者1人,“革命知识分子”8人,周恩来说,知识分子人数似乎少了点,但是实际上不止8人,因为革命干部和军队代表中都有不少知识分子,他本人就是一个。

在“文化大革命”中呼风唤雨,一直以毛泽东的化身自居,凌驾全党之上的江青,在4

月20日的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却突然表现出“伟大的谦虚”,说“我现在还是提不要选我,我觉得很狼狈”,“如果我还能退居幕后,做个无名英雄,那就好得多”;与此同时,她还借机为她的女儿及紧跟她的毛泽东的侄子毛远新大造政治舆论,说代表们都要求把他们两人选进中央,但毛泽东对身边人要求很严,本着亲者疏、疏者亲的原则,不赞成对他们两人的提名。当时巴结江青的大有人在,有人提出江青“一定要选上”,她是“众望所归”。

毛泽东在4月11日和4月23日两次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谈选举问题。在4月23日的会议上,毛泽东说,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应该是全国工农兵代表会(苏维埃)。主席团的候选人提名总的是好的,起码没有刘少奇那一伙吧?至于公道不公道,只能说是大体公道,因为很多人他都不了解,甚至没有见过。有些该选进来的人可能没有提名,可是把名单增加到500人,也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只能大体是这样子了。

毛泽东在两次会上都谈到党内“反对派”,或曰“对立面”的问题。他点了10个人的名字:陈云、朱德、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陈毅、徐向前、邓于恢、张鼎丞。说他们这些人:“功劳也有,错误也不少,检查甚多,但别人不满意,我看算了,够了,看行动了。”这10人中,李富春、李先念、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

剑英,属“二月逆流”成员,“二月逆流”主要代表人物谭震林则早已被打成“叛徒”,被排除于“九大”之外;至于朱德、陈云等人,则被说成是一贯“右倾”的“机会主义分子”,简称“老机”。但是,毛泽东却主张把这些人作为对立面选进九届中央委员会里。他说:“不把这几个犯错误的老同志选进去不好。党内有几个反对派有什么要紧?你反你的嘛!”这时,许世友忿忿不平地说:“反一两年可以,反几十年怎么行!不过,我们坚决听主席的,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康生也说:“昨天中央机关组还叫朱德同志写书面检讨。”毛泽东说:“算了。我们看他们,他们也看我们。开‘七大’时,王明、张闻天他们就不相信我们,以为非把他们打倒不可,结果,选了他们还是犯错误。但是,如果不选他们,可能坏得更快。他们不改怎么办?地球还不是照样转!”

但是,把这些“对立面”选进中央委员会,并不是无条件的。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席团秘书处作出规定:既要保证这10人当选,又不能让他们得到高票,据说这样才能使这些人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促使他们转化。为此,各代表团受领任务:要把哪些人投或不投这10名“对立面”的票,落实到“人头”;各代表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后,必须以“三忠于”的高度、以党性保证,按照要求投票。各代表团不敢马虎,由代表团领导亲自动员、布置,有

的甚至作了演练。大会秘书处还不放心,于4月23日晚以小组为单位进行了预选,对结果感到满意。

4月24日下午,进行正式选举。到会代表1510人,仅有2人请假。分两次投票:16时28分开始投票选举中央委员,16时52分开始投票选举候补中央委员。投票结束后,主席团成员与全体代表退席,合影;大会工作人员紧张地先分区计票,最后汇总得出选举结果。完全是手工作业:口唱、手写、拨算盘,用了近两小时。

20时57分,重新入席,林彪宣布请大会副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王良恩宣读选举结果。大会主席团提名的170名中央委员和109名候补中央委员全部当选。会场响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毛泽东以全票当选,虽然是天经地义、意料之中,大家仍报以热烈掌声。林彪获得1508票,大家也报以热烈掌声,掌声过后,可以听到会场有小声议论。会后有权威人士透露,林彪为了表示不能与毛泽东平起平坐,他自己和他妻子叶群投了反对票。周恩来获得1509票。风头正健的江青获得1502票,虽然只少了8票,但这8个敢于在江青名字上面打×的人,却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的危险。江青是很看重这8票的,事后曾秘密作过调查。江青的军师张春桥1496票,少的14票也不可小看。

10名“对立面”完全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当选:

朱 德 809票:

陈 云 815票;
李富春 886票;
陈 毅 867票;
徐向前 808票;
聂荣臻 838票;
叶剑英 821票;
邓子恢 827票;
李先念 922票;
张鼎丞 1099票。

从得票情况看,在“文革”前“名气”越大得票越少,朱德得票率还不到53.6%!真不知如果有那么几十个人不听招呼,不按要求投票,这场选举将如何收场!

选举中还有另一类候选人,也受到代表们的格外关注。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聂元梓、王效禹、李再含三人。

聂元梓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以带头抛出被毛泽东称为“中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而一步登天,她不仅是北京大学的太上皇,还是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但她仍不满足,竟把她的人马派往全国各地,插手全国的“文化大革命”。她的手下称她“老佛爷”,表示对她的敬畏。

王效禹原是山东省一个不大不小的地方干部,因为最早出来支持和带领某些群众组织“造反”,而受到“中央文革小组”和毛泽东的赏识,不但一下子成了山东省的最高领导人,而且被任命为济南军区第一政委。但是,此人却无自知之明,掌权后仍一意孤行,依靠“造反派”在全省大肆镇压他们所说的“保守派”广大群众,实行恐怖统治。

李再含原是贵州省军区副

政委,他是军队率先造反的干部,他能靠地方“造反派”一下子把贵州省党政军大权都夺过来,并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承认。此人自命不凡,在贵州大树他的个人权威。当地有一种说法:全国听毛主席的,在贵州听李政委的。他成为毛泽东在贵州的化身。

在酝酿候选人名单时,还对四川的刘结挺、张西挺,山西的张日清、刘格平等领导干部中带头造反的头面人物提出异议,大会主席团为此分头做了不少工作。选举结果,刘结挺得1435票,刘格平得1117票,王效禹得1066票;聂元梓、李再含、张西挺、张日清作为候补中央委员入选,分别得937票、1256票、1400票和1152票。倘若实行差额选举,这几个人必然落选无疑。

选举中还有一件趣事:当王良恩宣布中央委员候选人、工人代表王白旦以全票当选时,会场立即响起一片议论声。这位工人代表看来毫无政治生活经验,他不懂得等额选举往往是知名度越低得票率却越高。此人在全国毫无名气,谁也不会故意把他划掉,而他自己又不懂得谦虚,结果使自己成了170名中央委员中,得票唯一与毛泽东平起平坐的人!散会后许多人都愤愤不平地大骂这位工人太不谦虚:“你比林副主席还能!”

陈毅蒙难

陈毅被认定是“二月逆流”的重要成员,他却被允许

出席八届十二中全会,而且,毛泽东还在会上宣布:要让陈毅参加“九大”。但是,他是要陈毅以“右的那一方面的……身份来参加九大”。

陈毅虽是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却是由上海市推选“九大”代表,因而他应参加上海代表团的

活动。大概是4月四、五号,陈毅碰上了一件尴尬事:他收到一封匿名群众来信,来信人称,从广播中得知“九大”胜利召开,陈毅被选为主席团成员。他敬佩陈毅的为人,认为他是一个光明磊落、表里如一、刚直不阿、敢说敢为的伟大革命家,希望他继续发扬这种革命精神,坚持斗争,多作贡献。从“文革”以来一直日子难过的陈毅,对怎样处理这封来信犯了大难:交出去吧,肯定又会招来许多麻烦;但是如果不交,岂不说明自己心中有鬼?再说,万一这是人家设的圈套呢?他最终把信交了出去。上海代表团负责人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得到此信如获至宝,先是要陈毅交代他的“阴暗内心世界”和“罪行活动”,自然不可能获得通过,然后便组织批斗。上海代表团是“造反派”的一统天下,人多势众,又曾掀起过“一月风暴”的大阵势,批斗火力极为猛烈。他们质问陈毅:“九大”胜利召开,全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决心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夺取更大胜利,为什么偏偏有人给你写这样的反革命信件,鼓励你

坚持反党立场,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敌?在揭批陈毅的“反党罪行”时,他们把历史旧账又翻了出来,从井冈山时期陈毅“勾结”朱德排挤毛泽东讲起,要陈毅承认他是一贯反对毛泽东的。这位当年曾统兵百万、豪气干云,也曾在外交场面风度翩翩、谈笑风生的共和国元帅,却在几十名“造反派”的围攻下有口难辩,怎样解释、检讨都过不了关。大会秘书处对此事也给予特别关注,连续出了几期反映批斗陈毅情况的简报,发给主席团成员。但实际上很多代表都知道这位陈老总“又挨批了”。好在大会的日程是早已排定,而且陈毅的“旧帐”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已经系统地清算过一次了,这次也只能是再“打打态度”,于是批了几天之后也就不了了之。

4月25日,毛泽东指定由周恩来、康生、黄永胜出面,召集主席团部分成员协商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选人名单。28日,召开九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机构,照例是等额选举,选举中央政治局委员19人。“二月逆流”成员中“三老”之一的李先念和“四帅”中的叶剑英,被提名入选,原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陈毅未被提名。

至此,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画上了一个留下许多隐患的句号。

(责任编辑 刘家驹)



王众托院士和他的“元决策”

● 张天来

历史的脚步迈进 1986 年的时候，设在维也纳的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来了一位中国的教授，他就是中国系统工程专家王众托，是这里的第一位与外方共同主持国际合作项目的中国研究员。

王众托 195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电机工程系，同年 8 月进入大连工学院电机系，1954 年开始筹组工业企业电气化和自动控制专业，并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

细心的朋友会问，王众托本来不是研究自动控制的，现在怎么成了系统工程专家了呢？王众托告诉我，在自动控制的研究中，他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一些自动控制的问题，在自动控制范围内不容易解决，而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工程范围内就比较容易解决。因为一个具体问题不仅涉及技术、而且涉及经济、社会以及人的行为等方面。

粉碎“四人帮”后的 1977 年，在教育部召开的学科规划会议上，王众托和其他院校的教师提出了建立系统工程学科的一些设想。之后，他参加出国考察，了解国外系统工程教育和科研工作，结合我国实际，确定了同实践紧密联系的方针，科研的重点，研究生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于是，我国高等学校第一批系统工程研究机构，在大连工学院等几所学校先后诞生。1978 年，他开始招收硕士生，1981 年开始招收博士生。

他们先后购买了两台小型计算机、三架微

机和简单的网络，王众托就和青年人一起投入了系统工程的研究。他们不走从理论到理论的路，而是坚定地走同实践相结合的路。在他看来，这条路广阔无边。他们很快就提出两种网络计划的新的分析与优化方法，并把它们推广应用到十几个厂矿企业，取得年增产值 6000 万元、利税 1300 万元的效益。在电力系统规划与管理领域，他们用一种新的优化方法开发的实用软件，应用于西北电力系统刘家峡到关第二条回路工程的分析和优化，电站比传统手工规划可以减少用水量折合电能 4 亿度。

就是在这个阶段，他和青年人合作的几个系统工程方面的项目获得国家级与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他们合作撰写的教材《分布式计算机控制与管理》，他自己撰写的《系统工程引论》，由电子工业出版社正式出版，前者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后者两次获电子部优秀教材奖。

在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王众托主持的研究项目是“整体发展研究专家系统：中国山西实例研究”。这个专家系统是智能型（融入人的经验）的，交互式的（人和计算机合作），集成化的，是对山西经济的整体发展研究。山西是我国的煤炭大省，山西煤炭究竟能够开发多少年？既然煤炭外运很困难，那么可以发展电力和化肥工业，把煤炭变成电力和化肥。既然吕梁有丰富的铝矿，正好用煤炭做燃料发电发展电解制铝业。这样，就要计算，煤炭开多少，运出多少，发电用多少，制作化肥和发展铝业要用多少。煤带来的污染问题，应用什么技术解决。在农业方面，对农业劳动力如何转移，乡镇企业如何发

展,缺水问题如何解决,等等,都作了过细的分析。最后,在计算机上进行统一的分析和计算,得出最佳的开发方案。全部工作整整搞了两年,到1988年完成。

鉴定委员会的专家们认为,这是一个具有相当规模与深度的决策支持系统,某些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项成果在国内外影响很大,王众托已经回国多年,他们的研究成果却被作为保留项目,长期保留在国际系统分析研究所。

就在维也纳这段时间前后,王众托指导几位青年人,在黑龙江的海伦,辽宁的喀左、海城和庄河等县,分别进行畜牧、农业以及整个社会经济发展规划的研究,实施的结果,仅在海城一地,1986和1987两年累计,即取得经济效益1.4亿元。紧接着,他们利用一些新的技术和方法,完成了“国民经济综合发展支持系统”的研究,在更大的范围内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二

我们已经知道,王众托在许多方面进行计算机辅助经营管理的研究开发,一些实用系统投入使用获得一个又一个的成果,常常可以享受那种胜利的喜悦。但他的头脑中也产生了一个不小的困惑,这就是也有一些系统,他们费尽心血开发出来,却并没有成功地投入使用。他知道,遇到这个难题,不是他一个,而是许多人;不只是中国的学者们遇到这个难题,实际上,这个难题也普遍发生在许多国家。大家都看到,计算机和它的广泛应用,是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成果之一。然而,在经营管理领域中,计算机的应用的确不够成功,更不够理想;而且,主要不是发生在技术方面,而是发生在人和计算机的关系方面。

王众托进一步深思,从系统工程的观点看,计算机辅助经营管理是由人与计算机协同工作的人机系统,因此,只研究计算机的一面,不研究人的信息处理过程和决策过程,是无法取得成功的。他热情而冷静地投入了这个研究领域,先后研究了国内外计算机辅助经营管理系统的开发与应用以及失败的原因等方面。研究结果表明:失败的原因不在计算机,而在于人。他提

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撰写了专著:《计算机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新的系统构成》。

王众托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最重要主张,就是要回答和解决实践当中提出的问题。他的课题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的支持,并被列为重点项目。他主持了一系列理论方法性研究和实例研究。2000年3月,在他主编的《信息化与管理改革》和撰写的《企业信息化与管理变革》两部专著中,研究了信息化与管理变革的理论和方法,论证了实现信息化必须同时实行业务流程再造和组织变革。这是一桩很大的科学成果,虽然对于这个问题的完全解决来说还只是一个开端,但毕竟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思路 and 方向。而在王众托自己看来,他的最重要的成果在元决策。用他的原话说,“这是我一生中比较有心得的成果”。他在百忙中竟然舍得拿出两个小时,非常兴奋地同我详细谈起了元决策的思考和研究过程。

“我们是第一家做元决策研究。”院士说。决策的理论和研究方法研究,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一般按自然传统的科学方法做,把一个问题形式化,环境清楚,信息完全,进行数量之间的关系描述,这种决策比较容易。用系统的观点来观察,加上复杂的人的因素,决策达到理想很不容易。决策,大体上可以分科学决策和经验决策。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根据以往的经验进行决策。我们看到,成功的决策固然很多,但失败的决策也实在是不少。 “我着重研究,为什么许多决策会失败?” “为什么我们要经常交学费,却学不到东西,下次还要照样交?” 院士说,“还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一次会议上,我提出要研究领导决策的问题。这是一个实际的问题,包括一些领导人的决策失败,作为理论,都应该研究,不涉及谁的威信等等。”

通常情况下,在决策失败之后,决策者要进行反思,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对决策本身也应该进行决策。就是说,在决策之前,先要决定怎么样进行决策,这就是元决策。”

“1986年,一位美国学者发表文章,认为在问题明确之后,选择具体方法,叫做元决策。我认为,他的高度不够。在我看来,在选择具体方法之前,应该发现和正确地提出问题,这个发现和提



王众托

出问题,比解决问题(选择具体方法)还要重要。”他以我国历史上的“大跃进”为例,“当时目标定错了,方向不对越搞问题越大。”1991年,他提出元决策的这个概念。后来,在维也纳的一次国际会议上,他提出并且阐述了这个概念;1994年,在他的专著《计算机在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新的系统构成》中,他专门写了一节“元决策的概念与任务”。

他认为,人类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地作出决策,有些得到成功,有些遭致失败。失败时怨天尤人,直到积累了大量经验教训,人们才从决策过程本身去找原因,经过总结,才逐渐形成决策理论和方法。

经过对决策成败经验教训的反思,人们发现在复杂的决策过程中,对于如何进行决策,也有一个筹划、抉择,就是说,也有一个决策问题。这种对决策进行的决策,叫做“元决策”。

他曾对元决策作出过比较全面、完整的定义:元决策乃是根据决策者和决策环境以及决策任务的特点,对决策全过程中决策风范、决策方式、决策步骤所做的选择。

元决策与具体问题的决策形成了一个两层

结构,决策者具有双重身份。一方面,作为具体问题的决策者参与决策活动;另一方面,作为元决策者,又要把作为决策者的自己和决策环境放在一起,作为元决策的分析对象。

王众托院士说,他常常用这样一个比喻:比如演戏,一个人往往又是导演,又是演员。导演和演员,两种身份,两个层次。导演解决整个一台戏怎么演好的问题,演员则只是一个角色怎样演好的问题。“要先做好导演,再做演员。元决策就是导演决策过程。”

他阐述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于,要有自知之明。“一些建立了功勋伟业的领袖人物,为什么会犯错误?就是因为他们往往缺乏自知之明。他们做了决定,但却不去想是不是会错。他们的豪情是需要的,但理性却要求思考。”说到这里,院士又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些外国人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思想,他认为不对,应该是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综合。他在山西看到恒山的悬空寺,那里供奉的是孔子、老子和释迦摩尼,恰好是儒、道、佛三家的首领,代表着中国人的思想。著名学者南怀瑾分析,儒家主张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佛家主张出世,在外边观看世界,不参加,比较悲观消极;道家,好像有两条腿,一条在世界之内,一条在世界之外。能够做的,一定做;不能做的,不做;道家主张能屈能伸,他们比较超脱。他说,从积极方面看,元决策者应该比较超脱,就有点像道家那样先把一条腿放在外边,也就是跳出自己看自己。“能做到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少了,但我们应该努力做到。”

“我提出元决策,也受到心理学的启发。”院士说,“心理学有元认知,是说在认知世界之前,要对认知过程有所了解。”“我的文章在英国一家杂志发表,论述了先当好导演,再当演员,人要能够从自己这个主体中跳出来……”

有人提出疑问,能够做到又是导演、又是演员这样的一身二任么?能够做到从自己身上跳出来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王众托从戏剧学中找到了根据。他说,戏剧学里有三大表演体系。过去对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

系,这个现实主义学派,要求演员表演得像真实生活一样,一旦上了舞台,就要完全进入角色,不管观众。所谓“第四面墙”理论,演员要在自己和观众之间树一面墙。布莱西特表演体系,要求演员有两重思想,一是要进入角色,一是要时刻想着观众。梅兰芳表演体系的特点,演员和角色应保持一定距离。你看那京剧,演员上来,先要自报家门,以演员身分向观众介绍角色,布莱西特把它叫做“间离效应”;而在外国戏剧中,演员没有自报家门的。“在我看来,元决策和具体决策,就应当像京剧的演员和角色一样,要保持一定的距离。你跳出来,就容易看出是否有错误。”他又举例说,大学时代的老师,有的上课时沉醉在自己的讲课内容中,旁若无人;而有一位老师,上课的时候注意观察学生的反应,特别注意最好和最差同学的面部和眼神,以调整自己的讲课进度。这种做法,就是跳出去。“但是,这样跳出去看自己,就是实行自我批评,不讲情面,自我解剖,实在是做不到。关键是难于跳出自己。”我国古代的哲学家老子在道德经中说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不但要自知,而且要自胜,克服自己的偏见,采纳更有益的意见,任用更有能力的人,这实在是需要更高的思想境界。

据院士分析,在正确估计自己的问题上,有两个极端:一种是特别自信,一种是特别不自信,都是应该注意克服的。我们提倡理性的科学,提倡元决策,就是要确定参加决策的适当人选,设计一个最好的决策过程,确定达到的目标和途径。什么叫最好?第一,有效性,能够达到目标;第二,及时性,如救火;第三,可操作性,让执行者、操作者要参加到决策过程中来,提高其可操作性。

院士说,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例如救火,决策困难,因为目标不清楚,你不知道火灾的具体情况,这个决策主要靠经验,靠直觉。所以,应该研究直觉。

他最后进行概括,认为要讲哲学。例如硬件和软件,定性和定量,人和机,要互相结合。西方基于分析的方法,讲究互补式的结合。中国更强调调整体,强调融合式的结合。例如我们的系统工程,只讲分析不行,要讲集成。这个观点,他在日

本进行有关东方系统思想研讨时多次讲过,引起过大家重视。

讲到这里,我激动地对院士说:“应该感谢你,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话。我想,这个元决策思想,可以让人类少犯多少错误,让人类的决策进入理性的思考和理性的科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由于决策错误而吃尽了苦头,就更加容易认识元决策的巨大意义。

三

2002年秋天,我们在大连理工大学访问九位院士的时候,正是这里的知识科学与知识管理研究中心成立的第三个年头。王众托被任命为这个研究中心的主任,这表明,他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

眼光极其敏锐的王众托,在看到1996年经济与合作组织发表的《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之后,就抓住了这个问题,用系统工程的观点进行深入思考。他认为,在今天的世界上,大家都希望在竞争中取得优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无创新能力。创新在哪里?主要是看能不能持续不断地形成新的知识。知识是资源,是生产要素,还可以成为资本,而知识又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的。不久,在广州举行的中国系统工程学会的年会上,他就提出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做《知识管理初探》,第一次论述了用系统工程的方法进行知识管理这个重要课题。1998年12月,他完成了论文《知识系统管理》,发表在1999年3月的大连理工大学学报上。这篇论文从知识管理的目的、要求、内容和信息支持等方面,进行了讨论,提出建立知识系统管理的体系结构。日本刚刚建立的一家知识科学院,听到王众托院士提出了建立知识系统工程的创新思路,马上在当年10月与大连理工大学签订了合作协议。

今年2月,中日双方在日本签订协议,成立研究开发性的国际知识科学与系统科学研究中心。

王众托院士同我几次谈到知识系统工程的研究。院士说,知识有两种:一是书本上的,课堂

上的,说得出来的,叫做言传性知识;另一种是经验,悟性,说不出的,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掌握的,叫做意会性知识,或者无形的知识。例如,骑自行车、游泳,别人教不易学会,你实践了,会了就是意会性知识。再高层次的,灵性。例如,在球场上,一个球队,事先没想到,突然一下子配合得非常好,力量发挥出来了;同外商谈判,两人配合得很好,事先并没有商定。这些,过去叫经验,现在也叫知识。知识的所有者,除了个人,还有组织。例如,企业的专利,规章,图纸,还有工作习惯,精神,等等。

在竞争中,常常要看意会性的知识。例如,招聘人才的时候,很注重面试,主要看你意会性知识水平如何。对一个组织来说,言传性知识容易买到,意会性的知识是学不会的。常常看到一种情况,一个很好的企业,关键人物一走,就迅速滑坡,甚至垮台,所以宁愿出高价把人才留住。对企业来说,知识管理非常重要。人走了,要把文字资料、经验总结等等留下来。你需要什么知识,已经有什么,差什么,都应该心中有数,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知识。你没有的,要培养人,要拿到知识。有了知识,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为此,王众托发表了几篇论文。他的第一篇论文的题目是《知识系统工程:知识管理的新学科》。他把有关知识的学科分做三个层次:第一,哲学,理念,来源,类型等;第二,科学原理性的东西;第三,技术层次,怎么用。第二篇论文《知识技术的多学科视角》,他阐述了知识系统工程是有关知识的组织管理的技术这个命题。他认为,我们的产品,有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更接近物质产品的是知识产品,所以,必须作为独立学科来研究。第三篇论文是《辅助策略分析的知识门户》,利用计算机网络收集、组织和管理知识。

院士打开电脑,让我看到了一个关于 WTO 的知识门户。进了这个门户,要了解有关 WTO 的任何知识,都能够找到。院士说,这样的知识门户,已经作成的不只一个。

第四篇论文是:《教育中的知识管理问题》。他提出,学校的知识,包括有形的和无形的两种。师生的创造力是无形的知识,要注意管理。

谈到目前正在进行的研究,他感兴趣的是系统直觉问题。他说,系统直觉是他所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东方的一种思维方式。东方思维的特点,比较注重整体性,综合性比较强,很大程度建立在直觉基础上,所以可以把它叫做系统直觉。在知识系统工程研究中,应该注意系统直觉的研究。在中国古代的农书、医书、兵书中,系统思想非常丰富,而且更多的是直觉经验。例如中医的望、闻、问、切,就是从整体出发的,构成了一个直觉系统。直觉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紧急情况下非常有用。直觉是从哪里来的?大约和遗传积累有关。有先天的成分,不都是后天得到的。当然,也有后天的成分。有一些知识,是靠直觉形成和运用的。例如,有一些工程师选择坝址,是可以凭直觉的;有一些机械师处理机械事故,也常常凭直觉做出判断。看来,科学分析和直觉是可以互补的。2002年9月30日,在日本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他提出了这个问题。

我找到研究中心副主任、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刘则渊教授,他赞扬王众托,说王的素质很高。“素质是什么?”他比喻说:“干粮吃完了,猎枪没子弹了,仍然能够开拓新天地,这就叫素质。”“任何一个陌生的问题,都能够找到解决的办法。王众托就是这种人,他具有很高的素质。”他进一步阐述和归纳:“具有调动知识的能力,驾驭能力的能力,就是素质,王众托具有这种素质。”

回顾对王众托院士的整个采访过程,我有一个最深的感触,那就是他实实在在地是一位跨学科研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科学家。他的丰硕的成果,包含着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巧妙融合的丰富内容。他的科学功底相当深厚,而且掌握了计算机这个当代最灵活而巧妙的工具。这样的科学家,实在是不多见的呀。

(本文选自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院士的足迹》一书,本刊有删节)

(责任编辑 程 度)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 王炳根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后,从日本回到新中国的冰心一家,便开始不太平了。先是儿子吴平被打成右派,之后是冰心的三弟谢为楫又被划了右派,一家人下放到甘肃。到了1958年4月,丈夫吴文藻也被打成右派,要他写检讨,挖思想根源。吴文藻是个极为认真之人,每天晚上都是面对稿纸,长叹短吁,怎么也下不了笔,也挖不出自己为什么要反党反社会主义?那些天的晚上,常常是到深夜12点,吴文藻总是默坐在桌前,冰心与他坐对,时不时写几行字,时不时又望望吴文藻。吴文藻脸无表情,写下的字撕掉,又写,又撕,他的纸篓里已经堆得满满的废纸。冰心便心疼地劝他别写,吴文藻却又坚持:“他们说我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还要挖根源,我怎么去挖,挖一些什么,我要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到国外去反好了,还要跑回国来反吗?”有一次,冰心曾试探地说,你就随便写一点吧,谈谈认识也行,别那么认真……吴文藻却不愿这样做。冰心就怕吴文藻想不通,总是千方百计地劝说开导。

其实,冰心的内心也是十分矛盾和痛苦,还要去劝说他们,她实在经受不了这种折磨,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家里的三个亲人都变成了右派呢?“我当时也和他一样‘感到委屈和沉闷’,但我没有说出我的想法,我只鼓励他好好地‘挖’,因为他这个绝顶认真的人,你要是在他心里引起疑云,他心里就更乱了。”

1966年9月,红卫兵冲进了住在和平楼冰心的家,抄走了许多的书籍、实物,包括冰心出国穿戴的旗袍、丝袜和手表等,办起了“冰心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展览”。烈日下,将一块大木牌挂在冰心的脖子上,上面写着“资产阶级太太、修正主义的黑帮作家谢冰心”,而吴文藻也被作为

摘帽右派、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被造反派押去批斗。和平楼中60多平方米的宿舍,有两间房子被封,一段时间,他们就生活在这个胆战心惊的环境之中。但是,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们都互相信任和支持,有时用语言有时也就是一个眼神,相互勉励,勇敢地活下去。后来,冰心在《论婚姻与家庭》中有这样的一段话,就是有感而发的:

有着忠贞而精诚的爱情在维护着,永远也不会有什么人为的“划清界限”,什么离异出走,不会有家破人亡,也不会有那种因偏激、怪僻、不平、愤怒而破坏社会秩序的儿女。

1969年底,吴文藻下放到京郊石棉厂劳动,冰心则在1970年初被发配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这时,他们都已届70岁的高龄了。这年的夏天,吴文藻随中央民族学院的教师,转到湖北沙洋五七干校,冰心才从咸宁调往沙洋,他们俩人都十分珍惜这种劫后的重逢。对此,冰心这样写道:

久别重逢后不久,又从分住的集体宿舍搬到单间宿舍,我们都十分喜幸快慰!实话说,经过反右期间的惊涛骇浪之后,到了十年浩劫,连国家主席、开国元勋都不能幸免,像我们这些“臭老九”,没有家破人亡,就是万幸了。又因为和民院相熟的同仁们在一起劳动,无论做什么都感到新鲜有趣。如种棉花,从在瓦罐里下种选芽,直到在棉田地里摘花为止,我们学到了许多技术,也流了不少汗水。湖北夏天,骄阳似火,当棉花秆子高与人齐的时候,我们在密闭塞塞的棉秆中间摘花,浑身上下都被汗水浸透了,在出了棉田回到干校的路上,衣服又被太阳晒干了。这时我们都体会到古诗中的“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句

中的甘苦。我们身上穿的一丝一缕,也都是辛苦劳动的果实啊!

1971年8月,大西洋彼岸的一位重要人物,行将叩开神秘中国的大门的时候,改变了冰心和吴文藻的命运。为了迎接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央有关部门将冰心、吴文藻和费孝通等人调回北京,成立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译室,组织突击翻译和校正尼克松的《六次危机》。之后,又翻译了《世界史》和《世界史纲》等。这些书翻译的难度都是很大的,尤其是后一部是以文论史的“生物和人类的简明史”的巨著,只有靠渊博的学识与厚实的外语功底才能完成。冰心、吴文藻、费孝通等都是学贯中西者,搁置了十几年,如今又可以发挥作用了。他们都很高兴,像有一股使不完的劲,从攻读原著,到寻找各种参考书籍,全

都他们自己动手。她回忆当时情景道:

我们都在民族研究室的三楼上,伏案疾书,我和文藻的书桌是相对的,其余的人都在我们的隔壁或旁边。文藻和我每天早晨八点到办公室,十二时回家吃午饭,饭后二时又回到办公室,下午六时才回家。那时我们的生活“规律”极了,大家都感到安定而没有虚度了光阴!

回到书桌前,又有事可做了,冰心和吴文藻都感到,这一段生活,是十年动乱岁月中,最宁静、最惬意的日子。

粉碎“四人帮”之后,冰心和吴文藻都是七十好几的人了,但却极大地焕发了他们的青春。冰心不断地出席各种会议,写文章,批判“四人帮”的罪行,拨正搅乱了文艺思想。吴文藻更是有事情可做,中断了二十几年的社会学要重新

评价和恢复。当中国准备重新恢复社会学学科的时候,吴文藻深知自己肩上的重任,他几乎是不分白日黑夜地攻读从美国寄来的学术著作,企望将拉下了近三十年的课都补上来。

1980年对冰心来说是个坎儿,这年的初春,她和巴金等最后一次访问了日本。回国后,因为赶译马尔他总统的诗集,突患脑血栓住进了北京医院。在病情有了好转回到家之后,不想又摔了一跤,冰心只得又进了医院,并且动了手术,腿上安装了钢钉。此后便只能在家中几十平方米的斗室中走动,但还是又跌倒了。一年中三进三出医院,对一个已近80岁的老人意味着什么。但冰心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且豪迈地写下了“生命从80岁开始”的名言。

由于连续几次生病住院,冰心身体有些每况愈下。尽管她总是在精神上保持年轻和乐观,撑着自己,但毕竟年龄不饶人,规律不能抗拒。同时,吴文藻的身体也日益衰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必须要有人来照顾。冰心还有许多文章要写,吴文藻则有许多的研究课题需要去做。后来,组织上将各项任务交给了她的小女儿吴青来担任。



冰心(右)在赠书

这样一来,吴青一家也就都得与父母亲住在一块。可和平楼的小公寓,只有60几平方米,一家三代挤在一起。本来,冰心和吴文藻多年各居一室,便于各自做学问和写作,后来只好同居一室,腾出一个房间给吴青夫妇居住。有时冰心会对熟悉的朋友来点幽默:“瞧,我们老两口又‘破镜重圆’了。”直到1983年年底,冰心和吴文藻的住房终于得到了解决。他们一家从和平楼搬到教授楼,仍然在中央民族学院的校园内,可是比原先的住房宽敞多了,有了专门的客厅,有了齐全的冷暖卫生设施。搬进新居的冰心,非常高兴,她打电话告诉朋友:现在鸟枪换炮了,快来看看呀!

在新居,冰心和吴文藻用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房间,作为卧室兼书房,正墙上挂着周总理的照片。沙发的背后,挂着吴作人的熊猫图,两旁是1925年梁启超先生题赠给冰心的龚自珍的集句:

世事沧桑心事定

胸中海岳梦中飞

对于在这几度过的最后一段美好时光,冰心深情地写道:

1983年我们搬进民族学院新建的高知楼新居,朝南的房子多,我们的卧室兼书房,窗户宽大,阳光灿烂,书桌相对,真是窗明几净。我从1980年秋起得了脑血栓后又患右腿骨折,已有两年足不出户了。我们是终日隔桌相望,他写他的,我写我的,熟人和学生来了,也就坐在我们中间,说说笑笑,享尽了人间“偕老”的乐趣。

但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吴文藻在1985年6月27日,最后一次为他的研究生张海洋的论文提了详细的书面意见之后,又因脑血栓住进北京医院。之后,就处于昏迷状态。冰心这一回再也没有盼到吴文藻出院回家。

1985年9月24日清晨,电话铃急促地响着,传来吴平的声音:“妈妈,爹爹已于早上六时二十分逝世了!”冰心放下话筒,已是泪流满脸。吴文藻在84岁离去,按说也算高龄了,但一想到他们六十几年的相处相爱,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根据吴文藻的遗嘱,冰心将他平时的存款3万元捐给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作为研究生的奖学金基金,冰心想以此方式,继续吴文藻的社会学的梦想和追求。

冰心在写下《生命从80岁开始》之后,又迎来了她的第二个创作的高峰,她写小说、写散文、写回忆录、写杂文,无论是哪种文体,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地。她的小说《空巢》获全国短篇小说奖;她的散文《我的家在哪里?》、《霞》、《绿的歌》等成为新时期的美文经典;她的为教育呼吁、为社会进步呼吁的《落价》、《万般皆上品》、《无土则如何》等,尤其是《我感谢》、《我请求》等文章,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表达了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形成了她第二个创作高峰的显著特点。

然而,此时的冰心毕竟已是90多岁的高龄了。

1999年2月28日晚,冰心在北京医院逝世,享年99岁,比吴文藻整整多活了15年。然而,远去的吴文藻并没有离开过她。冰心在她遗嘱中交待,她死后,骨灰要与吴文藻合葬在一起,要用汉白玉作墓碑,在骨灰盒上写:江阴吴文藻,长乐谢婉莹。而汉白玉的墓碑上则可用谢冰心的名字。冰心之所以要作这样的交待,是因为吴文藻对她的称呼,永远是一个“莹”字,在吴文藻的心中,她是永远的谢婉莹。

2002年10月21日,冰心、吴文藻的骨灰,在儿子吴平、女儿吴青等家人的护送下,来到位于八达岭长城脚下的北京长城华人怀思堂内的驼峰之上。这里是他们的长眠之地,这里就在长城的脚下,八达岭水关的长城就在眼前,远处和近处的山岭,红叶装点。墓碑由整块的高达二米有余的汉白玉雕塑而成,周边呈毛石的自然状,上方是冰心与吴文藻晚年相偕的艺术雕像,下方是一个古铜色的小读者雕像,造像取自冰心1926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寄小读者》封面。中间磨平的石面上,是赵朴初生前题写的手书:

吴文藻 1901—1985
谢冰心 1900—1999 之墓

从此,他们两人永远地长眠在了古长城的脚下,并与中华文化名人雕塑纪念园中的叶圣陶、茅盾、夏衍、田汉、曹禺、徐悲鸿等一道,永远受到世人的怀念和瞻仰。

(王炳根:冰心研究会秘书长)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台湾女作家苏雪林生命的起点和终点

● 傅宁军

黄山脚下有个太平湖，湖北岸黄山区的永丰乡有个名叫岭下苏家的山村。村子虽小，却出了个名扬海峡两岸的才女苏雪林。

苏雪林的才华，无疑也浸染着故乡山水的灵气。她原名苏小梅，学名苏梅，字雪林，笔名绿漪女士，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代表性人物，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位置。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她就与冰心、丁玲、冯沅君、凌叔华并称为备受瞩目的“中国五大女作家”。她笔耕80载，执教50秋，出版著作达50部之多，在小说、散文、绘画、戏剧、翻译、学术等领域都有建树，是集作家、画家、学者于一身的罕见的文坛女杰。

苏氏家族发脉于四川眉山，为宋代文学家苏澈的后裔。500多年前，苏家世祖苏继芳做铜陵县令时，看中岭下这块三面环山流水向南的宝地，便定居下来。到明清时苏氏成为当地望族。民国之初，苏雪林祖父苏运卿辞官返乡，大兴土木，修宅院，建祠堂，造学堂。童年和少年的苏雪林，在这里度过了许多无忧的时光。

走进青山环抱之中的苏家村，黑瓦白墙，可以望见一棵百年桂树和一幢带院子的小楼。这小楼名为“海宁学舍”，缘于苏雪林祖父苏运卿在外曾任浙江海宁知府，有兴学重教的美誉，晚年



苏雪林

回乡给儿孙辈办私塾学堂。

苏雪林虽然是个小姑娘，但得益于祖辈的书香门第，也在私塾有一席之地。她天资聪颖，且与顽皮不羁的公子哥不同，格外珍惜读书的机会，尤其喜欢吟诵清代性灵派诗人袁枚的《小仓山房诗集》。13岁时，她灵感突发写下了七绝《种花》：“满地残红绿满枝，宵来风雨太凄其。荷锄且种海棠去，蝴蝶随人过小池。”她平生的第一首诗清新雅致，叫大人们十分惊奇。

苏雪林出生于1896年，1998年3月24日，她在台湾的台南度过103岁生日。5月

29日，她在66岁的学生唐亦男教授的陪同下，经香港中转，踏上跨越海峡返回故里的千里路途。她离开岭下苏家村已经73个年头，满头黑发的姑娘成为白发飘飘的老妇，

山村依旧清丽，乡音依旧亲切，只是岁月无情，故人难觅。当苏雪林被抬出“海宁学舍”，走上石条铺成的巷道不一会儿，她示意滑杆在旁边的一家院落前暂停。原来，眼前这典型的皖南民居建筑，便是苏雪林新婚的居所。岭下苏家村有个不成文的风俗，女儿出嫁不能在家办喜事，要到别人家做新房。苏雪林的未来丈夫是上门女婿，她父母就选了隔壁的同姓邻居，也是经商的大户人家。

苏雪林望着这个熟悉的宅院,感慨和沉思是复杂的。她的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虽然新郎门当户对,也是读工科的饱学之士,喜庆之时仍种下了不幸的种子。后来因为性格不合等因素,苏雪林终于与丈夫离异。她把丰富的感情交给了文学,与姐姐相依为伴,一直独身到垂暮之年。又见到新婚的居所,她眼里涌出了泪水,旁边的人不敢问她,有几个当年的小娃娃已经是村里的长辈,他们把漂亮的苏雪林和英俊的新郎封存在数十年的村史口碑之中。她触景生情,回想起了消逝的恩恩怨怨……

苏氏家祠已经列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高耸的院墙斑驳灰暗,门楣的木雕残破存留,然而不失气势庄严。祠堂内一块块的碑石,在讲述着苏氏家族兴盛的过去。不满足于私塾知识的苏雪林不顾家人反对,毅然报考了外地的学校。她没有像其他村姑那样安分守己,默默无闻地走上女人千百年的老路。

父辈人不会想到,在他们看来不听话的小女苏雪林,不是个低眉顺眼的小媳妇,日后竟成就一番事业,成为苏氏家族的佼佼者。虽然族谱载事的习惯是记男不记女,苏雪林是个例外。根据岭下苏氏族谱,苏雪林是宋朝文豪苏澈第38代嫡孙,为苏氏家族争了光,自然是苏氏门庭的骄傲。

家乡迎回了苏雪林,其实是对于她当年走出家乡的勇气的敬意。苏雪林不信“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出洋留学,成名后不忘报效祖国。抗战期间,苏雪林曾将自己的嫁妆、薪俸、稿酬和两根重五十两三钱的金条,全部捐献给前线的抗日将士。这件事登在报

纸上,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试想一个弱女子尚能倾囊相助,中国老百姓的爱国心不言而喻。她的许多爱国的作为,被家乡人传为美谈,她受人尊敬是因为有骨气。

苏雪林远离家乡,乡土观念却丝毫不曾减弱。在她的大量散文随笔中,家乡是她源源不断的生动素材。她用清新的笔触,写父亲、母亲、姐姐,写山村的过年轶事,写儿时的种种印象,一篇篇美文渗透着她的细腻感情。她在台湾出版的《苏雪林山水》,收入75幅美术精品,竟然都是描述岭下苏家村和黄山的风光,而此时,她凭的只是半个世纪前的记忆,那记忆如同封存地窖的老酒那样芬芳浓郁。

在苏雪林1998年回家乡时,坐着游船浏览了太平湖,也乘缆车登上了黄山之巅。她以百岁高龄,成为黄山风景区历年接待的贵宾中,年事最高的长者。1999年4月21日,苏雪林在台南辞世,终年104岁。

苏雪林对她的身后事早有安排。经苏雪林弟子的联络,当地政府的支持,从故乡走出去的苏雪林,又永远回到了故乡。

(责任编辑 刘家驹)



103岁的苏雪林回到苏家村

用草制云丝的女专家酆云鹤

● 罗先哲



酆云鹤

酆云鹤是我国第一位获得化工博士学位的女性,全国著名萱麻纤维化学专家,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之一,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五届全国政协常委、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共党员,曾担任纺织工业部和上海纺织工业局顾问、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

1988年12月14日,89岁的酆云鹤,无愧地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病逝于广州。她孑然一身,没有子女,丈夫也早已离她而去,她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她所熟悉的事业。而在她生前,每当有人问及她子女的情况,她总是乐呵呵地伸出五个指头说:“我有一个儿子,四个孙子。”在她的心目中,萱麻是她的“儿子”,黄麻、白麻、大麻

和胡麻就是她的“孙子”。

在20世纪80年代,我曾两次赴上海拜访酆云鹤。

1899年1月27日,酆云鹤出生于黄河尾间的山东省利津县庄科村一户贫寒之家。在酆云鹤6岁那年,一场洪水灾害,地淹屋塌,迫使她一家从利津县漂泊到泰安县,尔后,又从泰安流落到济南市。

父亲开了个小木匠铺。8岁的酆云鹤就给有钱人家当小佣人,扫地、做饭、擦桌椅,还要伺候东家小姐。15岁那年,妈妈想尽一切办法把她送进了一所免费学堂,和七、八岁的娃娃坐在一起读书。从认蚕豆大的字开始,凭着惊人的毅力和聪明才智,酆云鹤从一年级跳到三年级,从三年级跳到五年级,小学毕业后,她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济南师范学校。在济南女师,王翔千是她的国文老师,王利用教学的机会向女学生传播新思想、新文化,还从《新青年》、《觉悟》等进步书刊上选文章油印出来,发给她们阅读。正逢席卷全国的“五四”运动爆发,酆云鹤在运动中受到洗礼,浑身沸腾着“科学”和“民主”的热血。毕业前夕,她拒绝了家里已经给她安排好的婚事,决心报考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

她以山东省第一名的好成绩,考上了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院。

上了大学以后,酆云鹤的生活更艰苦了。她白天上课,晚上教“家馆”,挣点学杂费用。她自己做鞋、做衣服,穿着很不合时宜的粗布装,常常被人认为是进城帮工的老妈子。

酆云鹤于1927年考取官费留学,到美国俄

亥俄州学习化学工程。1929年夏季,天气闷热,学校研究院院长来到实验室,看到只有一个瘦小的中国姑娘还在做实验,浑身上下都湿透了,简直不懂得休息,院长命令她停止实验,否则就要取消她的成绩。鄧云鹤急切地说:“先生,我吃得消,我不怕吃苦,我的祖国需要科学。”院长被这个倔强的中国姑娘感动了。

1931年鄧云鹤获得博士学位,成为美国俄亥俄州大学第一个得到化工博士的女性。这消息曾在俄亥俄州新闻界轰动一时。那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很低下,谁要承认是中国人,往往要遭到别人白眼,但鄧云鹤总是毫不含糊地说:“我是中国人!”

回国以后,鄧云鹤到燕京大学教书。这时,东北沦陷了,张家口也失守,祖国的命运危如累卵。她决心到德国去学习爆炸学,用祖国大江南北遍地皆是草类纤维制造廉价的炸药,打击侵略者。

1933年秋,鄧云鹤到了德国。她随身带着几个装满了稻草、高粱秆、蔗渣和麻纤维的大草包。法兰克福的海关检查人员莫名其妙地瞪大眼睛盯着这些草包,实在不明白这个年轻的中国女学者要干什么。到柏林以后,鄧云鹤才发现,她要找的犹太教授已经逃到外国去了,她学习爆炸学的计划落空了,于是不得不利用随身带来的稻草等原料转向人造丝的研究。

她利用柏林人造丝机械实验工厂的设备,苦心钻研,反复实验,只用了两年的时间,就成功地从草类纤维的浆粕中抽出了质地优良的人造丝,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用草纤维制造丝的发明人。消息一传开,德国莱比锡大学立即提出,他们愿意授予鄧云鹤博士学位来换取她的学术论文。日本资本家也用高价聘请她当总工程师,以换取她的发明专利。对他们的要求,鄧云鹤一概拒绝。她斩钉截铁地说:“不卖!我要留给我的祖国!”鄧云鹤的爱国行动,使柏林实验工厂的经理柯亨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感慨地说:“中国人这样爱国,中国是大有希望的国家。”

1936年,鄧云鹤博士放弃了在国外的荣华富贵,满怀科学救国的志气,回到了祖国。可是鄧云鹤哪里知道,当时她心目中的神圣的祖国,却是个专制独裁的黑暗深渊。官富民贱,权势胜于

科学;能干的不如会投机钻营的,爱国的不如卖国的。外国人求之不得的科学技术,在中国却分文不值,贱如粪土。都说中国人刻苦、聪明,但中国人的聪明才智却尽付东流。同是一枝花,墙里不开墙外开,墙里不香墙外香;同是一个人,在外一条龙,在家一条虫。鄧云鹤把科学技术带了回来,却到处碰壁,吃尽了闭门羹。在沪、宁等地,她看透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腐败,怀着满腔愤慨离开南京到了重庆,那里有她丈夫开办的一个小肥皂厂。

中国是世界上纺织资源最丰富的国家,而国民衣衫褴褛者到处可见。为了解决人民的穿衣问题,鄧云鹤转向麻类纤维的研究。她对麻一见钟情,从1938年开始,她被麻缠了50多年,同麻类纤维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9年,鄧云鹤在重庆创建西南化学工业制造厂(简称西南化工厂)。工厂初建时,人员很少,规模很小,设备极为简陋,只有一台弹花机,纺织靠手工摇纺。后来才用100万元钞票购得一套印度小型纺纱机,能机纺部分棉纱。当时,大西南很多地区不产棉花,而产棉地区又大多被日军侵占,因此,抗战期间人民的穿衣问题相当突出和严重。面对困境,鄧云鹤决心利用工厂简陋的实验设备,为祖国研究价廉物美的麻纺织纤维,以满足社会生活需要。

众所周知,我国盛产苧麻,苧麻被誉为“中国草”。人们用麻类纤维织布已历史悠久,但这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麻皮上含有大量的胶质和腊质物,不把它去掉,就无法得到纺织用的理想的纤维。因此,利用麻纤维首先要过脱胶关。过去人们都是采用浸泡、刮青、漂洗的细菌脱胶法来获得干净的麻纤维,这种加工方法速度慢、质量差,只适用于手工摇纺,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

鄧云鹤在重庆西南化工厂,使用她在德国首创的化学脱胶方法,进行了苧麻加工变性的科学研究。在厂内简陋的实验室里,鄧云鹤苦心钻研,反复实验,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使她痛心的是,1940年8月下旬,日军飞机轰炸重庆,西南化工厂的厂房被炸为灰烬。面对一片狼藉的景象,她痛心地哭了。但是,困难吓不倒这位刚强的女专家,她所想到的是抗战,是祖国的需要,人

民的穿用。

鄧云鹤经过 200 多个日日夜夜的潜心研究和反复实验,终于创造出“先酸后碱、二煮一漂或二漂”的萱麻脱胶新工艺,成功地找到了使萱麻纤维均匀脱胶、适用于大工业生产的化学脱胶法。鄧云鹤纺出了比棉花纤维还洁白美丽的麻纤维,她给它起了个颇有深意的美名——“云丝”。鄧云鹤深情地把一缕缕云丝拿在手里抚摸着,好像是母亲抚摸着自己的女儿的长发,不时地用她自配的钢梳温柔地梳着。

“云丝”问世后,引起很大震动,当时曾得到国民党政府经济部批准专利 5 年。抗战期间,重庆西南化工厂大量生产的“云丝”,为解决人民穿衣问题做出了很大贡献。代棉产品有云丝布、云丝毛巾、云丝棉胎、云丝衣絮等,深受广大民众欢迎。1942 年初,在四川各厂家共同举办的展览会上,黄炎培先生题词称颂“云丝之美,既润且美,寒者遇之,雪里回春”。邓颖超、董必武、冯玉祥、李德全以及国民党元老林森、于右任等都前往参观,对云丝产品称赞备至。

“云丝”美名,传遍中外,一时间,电报、书信如雪片飞来,《纽约日报》的记者、美国的资本家也闻风而至,他们都想得到这个令人垂涎的专利。对于他们的要求,鄧云鹤一概拒绝地说:“不卖,我要留给祖国!”

鄧云鹤的萱麻纤维化学脱胶法发明不久,美国《纺织世界》杂志的“萱麻专刊”于 1945 年发表了一篇题为《引诱了我们一百年的萱麻》的文章。文章伤心地谈到:“萱麻从中国引进欧洲整整 100 年,引进美国也已 90 年了。当 18 世纪从中国引进夏布(即麻织品)时,大家都认为经营萱麻纺织可以一本万利。可是没想到近百年来,我们对萱麻的研究如瞎子摸象,没有找到那把关键的‘金钥匙’,反倒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实在令人心碎!失败的原因主要是不能得到均匀脱胶的麻纤维,无法在现有的机器上使用。”但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欧洲人踏破铁鞋无觅处的“金钥匙”,却被鄧云鹤找到了。

重庆西南化工厂由小到大,脱胶工艺设备日臻完善,出品越来越多,越来越精。其最盛时期全厂职工有 700 多人。在“云丝”生产中,鄧云鹤又引导麻纺生产进入新的境界:萱麻纤维变性和麻

棉混纺研究试验。她先从“云丝”在棉毛机上试纺做起,为了提高云丝的可纺性能,鄧博士又花了一番心血,终于成功地使萱麻纤维进行了碱法变性,有效地实现了麻棉混纺,这又是一次纺织工业上的突破。

为躲避国民党反动派胁迫去台湾,鄧云鹤于解放前夕辗转到了香港。不久,她响应共产党和人民的召唤,毅然放弃了丈夫已经为她办好了的去美国的护照和船票,从香港到达北平,光荣出席了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

新中国成立后,鄧云鹤受到党和人民的信任,连续三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被选为民建中央委员,被任命为国家纺织工业部顾问兼广东省化学研究所副所长。她全力以赴,继续向麻纤维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开拓前进。

经过几年的苦心钻研和反复实验,萱麻纤维变性获得了成功。经过变性处理的萱麻纤维,手感柔软,弹性好,易染色,不掉色,不仅完好地保留了萱麻纤维固有的优点,还兼有毛、丝、棉、涤的许多优点。试产的几批涤纶,质量都达到了高档纺织品的水平。有史以来,萱麻纺织品第一次迈进了高级衣料的行列,引起了国内外重视。人们都热情地称誉它是“纺织园里的一朵新花”。当这种价廉物美、柔软挺括的产品在上海试销时,争购的人们竟然把柜台挤倒了。这是多好的纺织品呀!连外国经营纺织业的企业家也都纷纷来信来电索求资料。

鄧云鹤一心扑在自己的事业上,她的丈夫曾多次恳求:“什么时候你把麻丢开,我们就有了家。”她没有理会,一如既往地把全部精力和感情交给了麻。丈夫终于在 1961 年离开她到国外去了。她几次打算跳楼自杀,但是一看到娇柔雪白的“云丝”,一想到还没有实现让祖国人民穿得更舒适、更美观的夙愿,她又决心坚强地活下去。

1966 年,一场践踏民主、摧残科学的暴风雨席卷祖国大地。老专家鄧云鹤成了“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受到所谓“群众专政”。她的实验室被封闭了,资料也被毁掉了,每天的任务除了挨斗就是扫地、扫厕所。这位严谨的科学家,连扫地也都一丝不苟。让她扫三层楼,她却连门口附近的马路也扫得干干净净。接踵而来的却是层层

加码,从一天扫三层楼增加到九层,直把她累得喘不过气,走不动路。当时,酆云鹤已是67岁的老人了,她几次昏倒在回家的路上。只有一个跟随她多年的老阿姨,常常倚门候望,跟踪寻找,把她扶回来,给她洗伤口,给她喂米汤……

1977年7月1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邓小平分别接见了酆云鹤,认真听取了她的汇报,对她关于发展我国麻纺事业的设想表示赞赏与支持。1978年,酆云鹤出席了第五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政协常委。同年,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遵照李先念同志的批示,为促进萱麻纺织工业的发展,酆云鹤由广州调到上海,担任上海纺织工业局顾问,同时还兼着广州化学研究所名誉所长。1979年8

月15日,已经80岁高龄的酆云鹤实现了多年的愿望,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党的温暖,人民的信任,使酆云鹤焕发了革命的青春。为了进一步完善萱麻纤维化学变性的生产和开发我国萱麻资源,她不顾年事已高,不辞辛劳,忘我地奔波于广州、长沙、武汉、重庆、株洲、南宁、兰州等地。每到一处,她都深入车间亲自动手。

1979年,她在上海试制较大批量磺化变性萱麻产品,生产出了毛型麻涤花呢以及绢麻织物和棉麻产品等30多个品种、60多个花色。这批磺化变性麻织品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展销,深得好评。1981年经国家科委鉴定,荣获发明奖。1982年8、9月间,酆云鹤应甘肃省负责同志的邀请,亲临兰州,组织甘肃轻工研究所、甘肃纺织研究所、兰州第一毛纺厂、兰州棉织厂等有关科研单位和工厂成立试验小组,利用当地设备,根据她的大麻脱胶新技术,组织攻关,只用了半



酆云鹤(左二)和她的秘书等1988年在广州

个多月的时间,就解决了难度很大的大麻脱胶问题,从而为大麻纺织开辟了广阔的前景。1984年,她先后四次应邀去湖北和山东指导开发萱麻产品,并被湖北省省长黄知真聘为湖北省纺织技术顾问。1985年至1988年,已经耄耋之年的酆云鹤,为了开发我国的大麻、胡麻和罗布麻生产,发展我国的萱麻纺织工业,曾三下湖北、两进江西,深入四川,远走新疆和广西南宁等省市。

多年来,酆云鹤没有离开过药,也没有离开过工作。医生不得不多次对她发出“警告”,酆云鹤总是向医生恳求说:“时间太宝贵了,我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多做些工作。”

1988年12月7日,已经是89岁高龄的酆云鹤博士,由上海到广州参加广州化学研究所30周年学术活动。12月14日由于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

(责任编辑 刘家驹)

平津保军事斗争中的 “怪胎”王凤岗

● 李 克

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
见风使舵的跳梁小丑
心毒如蝎的杀人魔王
显赫一时的“反共英雄”
客死台湾的一介囚徒

平(北平)、津(天津)、保(保定)三角地带,在八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中,因其战略地位显要,成为敌我必争之地。在这里,涌现了无数可歌可泣、永彪青史的英雄,也出现过一些由特殊环境孕育的“怪胎”。王凤岗就是这种“怪胎”之一,永远被绑在“耻辱柱”上的小丑。

丧天良叛国投敌

纨绔子弟出身的王凤岗,是地处平津保三角地带的新城东双铺头人。他自幼善交往,学校读书时即结盟拜把,成为沿大清河 36 编乡 36 友之一。

在新城南关行宫完小,因欺负女生,曾被学校开除;乡师毕业后,在前渠堤村当教师,玩枪走火打死夫役,被解雇;回家后,其父王自高让他带雇工下地,他怕苦不干;让他经管榨油作坊,他又漫不经心,气得王自高骂他是“废物小子”。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和军警南退,日寇占领县城和铁路,乡村盗匪横行,王凤岗自感安全不保,即组织武装护院。随后他也曾随潮流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又过不惯艰苦生活,加之对其职务安排一直不满,终于和他 36 友之一的亲日分子、地主裴鸿运一起投降

日寇,在涿县当了“皇协军”。

为取得日军信任,王凤岗不断带领“皇协军”向我抗日根据地出击。我抗日县长张乃东等十余同志,就牺牲于他们的袭击中。王终于取得信任,当上涿县伪警备队副队长(队长由伪县长兼任)。

为便于自己发展,王凤岗又经好友李适斋、黄介民,打通在北平当伪教育委员的马耀三的关系,与伪省府上层沟通,于 1943 年秋调回王原籍新城,任伪警备队副队长。

回到新城,他嘴里说的是“难忘新城父老”,心里想的却是利用人地两熟之便,尽快发展个人势力。原新城伪警共 600 人,加上他从涿县带来的亲信谢大谦、石友、王秀山及他们的骨干队伍 200 余人,共编为四个大队。

王凤岗自认为羽翼丰满之后,屡屡出击。今天东村抓人,明天西村围剿,甚至远途奔袭马踏营,捕杀我区长陈琳等 30 余干部和战士。1945 年初得知我县委书记尹景芬等住在交渠村,令亲信王秀山率百余伪警包围,尹景芬率众奋勇突围,不幸中弹牺牲。区长杨铁隐蔽在兀术营,被坏人告密为王部杀害。

诡计多端的王凤岗,还令其所属冒充“八路”,夜间潜入我游击区,抓捕我村干部、进步人士和堡垒户群众。如梁各庄的高顺、温屯和谢子久;高桥、北堡上等村的李云书、宋景云、刘茂、肖旺,其中有的被杀后还割头示众。

1945 年春,日军和王凤岗伪军奔袭米家务、谷岗等地,围剿我十分区领导机关受挫。王凤岗

老羞成怒,接受谢大谦建议以水代兵,将十里铺大桥堵死,提开永定河金门闸,引永定河水入白沟河,然后掘堤放水,致使新城、雄(县)、定(兴)、霸(县)的数百村庄房倒屋塌,百万亩麦苗被淹。

改换门庭姓了“蒋”

任何的垂死挣扎,都挽救不了日伪失败的命运,1945年冀中抗日根据地开始了反攻,先是解放了河间、任丘,后又攻克了新镇、霸县。

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王凤岗惶惶不可终日。他同谋士李适斋等再到北平找马耀三委员讨教,马斩钉截铁地说:“守住阵地,决不向八路军交一枪一卒。蒋总裁也明令日军只准向国军投降。”谈话中并说,蒋已委任孙连仲为河北的接收大员,孙是老乡,雄县龙湾人,撬开孙家的门,有什么事都好办。

果然,通过马耀三很快与孙连仲挂了钩。王凤岗在北平首次晋见孙连仲时,趁孙问及家乡情况,王便夸耀自己如何清内、策反,杀了多少共党和八路等,并转弯抹角表白自己是怎样的假亲日真反共。

其实,王凤岗的那点历史,孙连仲已从马耀三口中了解个大概,知王是个反共好手,此点可以利用,哪还顾及他。孙连仲便用蒋介石“只问行为,不问职守”的话宽慰他。王心领神会,冒险返回新城,拿掉日本“太阳旗”,换上了国民党“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把自己的队伍,说成是国民党的“先遣军”。

鲜血换来的“顶子红”

王凤岗自有了孙连仲这个靠山,有了国民党这个招牌,肆无忌惮地网罗地主豪绅、土匪恶棍,作其队伍的耳目和依靠,加强其统治区的控制,骚扰或蚕食我解放区。

王凤岗连续制造多起惨案,如10月10日,我定(兴)、新(城)县委在临时住地白沟镇演戏,庆祝抗战胜利,第一天晚上,即被其骨干王耀南、吕庆俊率部包围,杀害我县委秘书朱均、组织部部长安平、副部长徐建新等17人。同时又远途

奔袭李云台、李鱼池、大青冢、义和庄等人民区政府机关驻地,杀我区委书记、区长等干部李子玉、杨得山、张顺、李敬亭、韩慎之、杜克、陈万邦、王义等多人。此后,王凤岗得到时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北省主席孙连仲的嘉奖,并任命王为新城县长兼保安司令,不久又提升为新(城)、固(安)、雄(县)、容(城)、定(兴)五县联防司令、伪河北保安十六团团长。

王凤岗为报答国民党这个新主子,进一步巩固其所占区,不择手段疯狂屠杀我军政干部和革命群众。他组织派遣黑杀团将新城附近孙家湾、五里屯、湛杨庄等村的共产党员孙占、马玉昆和我解放区干部有过接触的革命群众20多人杀害,然后填入护城河冰窟。

王凤岗一再违反停战协议,距三人小组到北堡上谈判不到一月,便勾结定兴伪军头子赵玉昆部约千余人,将我县大队长李瑞增率领的一个分队40余人包围在衣巾村。我指战员被迫自卫,顽强抵抗,终因寡不敌众,李大队长以下30人牺牲。

王凤岗得意忘形又偷袭方官、鱼池、堡上、王庄、曲堤十余村,抓捕革命干部群众百余人,其中有51人先后被杀。

凭着沾满人民鲜血的双手和以重金打通关节的伎俩,王凤岗总算爬上伪河北省十专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的宝座。

孙连仲被蒋介石免去保定绥靖公署主任职务后,军事大权统归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傅为确保平津,下决心争夺西起北平,东至天津,南界为大清河的这块三角战略要地。在国民党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文指挥下,集中十六军8个团、十三军四师2个团、保安七纵队及各县保安队共约3万人,于1947年8月6日开始对我大清河河北解放区实行铁壁合围,企图一举歼灭我军主力,摧毁我解放区各级组织。

这天拂晓,西线和东线之敌首先顺大清河包剿而来,随即严密封锁河岸,以图切断我军民去路,然后顺平(北平)、大(大名)公路,津(天津)、同(大同)路直插我解放区腹地,切块分割,拉网扫荡。我分区主力和各县游击大队与敌周旋,避实击虚,坚持十余天后,为避敌锋芒,减少损失,只好转到外线作战。

王凤岗抓住发展其势力的大好时机,先后派出亲信李适斋(后改名李逢会)、张义斋、王润伯等到固安、永清、容城等地当县长,派他几个老部下分任保安支队长。他又用征兵、抓兵、雇兵等手段扩大兵源,使他的部队迅速发展两个旅、七个团、四个支队。大清河北“八六”变质后,国民党军主力以驻防、封锁、控制地面为主,王凤岗的地方团旅,便成了国民党主力部队庇护下围剿我游击队和地方干部的鹰犬。王凤岗在其统治区按保甲征兵征粮,对我游击区则抓兵抢粮。在霸县梁庄、寨上一次抢走小麦15万斤;永清县十几户的郑家窑一次抢走8车粮食。固安县200多户的纪家营,因强征暴敛一半多人家断炊。最可恶的是,拼凑地主还乡团,反攻倒算,屠杀贫苦农民。大王村反动地主张树堂勾结伪乡长朱景增,杀害我农民积极分子杨印堂、妇会主任刘香芹等8人。辛立庄反动地主刘子恒、刘克华、刘文锋组成的还乡团,以伪善面孔欺骗农民回村后暗杀。据统计,王凤岗所辖区的雄县、固安、霸县、永清四县被杀害的革命群众都在千人以上。

傅作义给了一个蜡头坐

“八六”以后,王凤岗自感兵充粮足,坐在河北省十专区专员的位子也坦然了许多。但中秋刚过,王凤岗得到情报,说解放军冀中军区主力正在大清河南集结,而傅作义的十六军风传要调走,王凤岗忙令秘书吴言诚急电省保安总部,祈转十六军长袁普暂缓转移,以利巩固大清河北的戡乱成果。

受命于危难的傅作义,自担任国民党华北“剿匪”总司令以来,就没有过过好日子。整个战场越来越吃紧,特别是罗历戎的第三军清风店被歼,很快石门(石家庄)又落入解放军之手,想挽回败局,又不能对蒋派军增援抱幻想,就考虑把主力集中,以确保平、津和平汉、平绥、北宁三条干线。瞻念前途,越觉渺茫,然而河北省频频转呈平、津、保三角地区捷报,说该地匪患基本肃清,王凤岗部戡乱有功云云。傅作义在1948年1月23日来新城前线视察时,接见了王凤岗。陪同傅作义接见的有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文。

傅对王早有所闻,但从没见过此人。在书写

着周亚夫名句“柳营春试马,虎帐夜谈兵”的王公馆里,王凤岗毕恭毕敬向傅作义作了汇报。所述内容,无外乎击退共军多少次进攻,剿灭多少县区共党分子之类。傅作义虽对眼前这位背叛过共产党、当过汉奸的地头蛇并非赏识,也不能不夸他几句“统治有方,灭共有望”的话,鼓励他再接再厉,实现戡乱计划。

谈话不足两个小时,在王凤岗看来最为重要的,莫过于傅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大意是:形势发展很快,扭转危机有望。为此必须从大局着想,将主力迅速收缩到铁路线去,机动使用。大清河北防务,凭王凤岗部实力,满能对付。若有共军主力进击,我机动部队定会及时支援,万无一失。傅作义这番既给个高帽戴、又给个蜡头坐的话,弄得王凤岗无话多讲,只好说:“傅总过奖,鄙人听便。”

华北“剿匪”最高司令官傅作义的接见,尽管给了王凤岗一个烫手的山芋,但在他看来,也不失一次值得夸耀的机会。他逢人便讲,身边的人跟着鼓噪,上司趁机再向上上司邀功,终于时机到了。

老蒋赐见风光一时

河北省保安司令部一份报告送达南京国防部,说平津保三角地区有个王凤岗,其势力由一个县发展到十数县,由一个团发展到两个旅、十数个团,剿共很有办法。蒋介石得知甚为欣慰,除批示照准国防部介绍其经验外,还拟在南京予以召见。

1948年的5月5日,王凤岗在伪河北省保安司令部政工处长李仲平陪同下,奉召搭乘中航班机赴南京。他先向国民党主办的一个中央干部训练团作所谓剿共经验报告,又分别拜见了秦德纯、陈立夫、陈果夫、邓文仪、谷正纲等军政要人,还曾晋谒蒋介石,而后又去广州拜见行政院长孙科。如此众多的军政要人接见,使王凤岗出尽了风头,内心的喜悦,溢于言表。至于当时新闻记者对他丑态的描述,对他“政绩”的讥讽(如他称中共的土改是抄袭的,他搞的才是真的),早统统置于脑后了。

傅作义对王凤岗南京召见后到处吹嘘,虽也

相当蔑视,但在1948年夏季划分清剿区时,还是任命王为第二清剿区(即伪河北省第六、第十两个专区)司令官,王凤岗在河北地位进一步显要了。

王凤岗自南京北归,兴高采烈,见人夸耀他受到的礼遇,以“剿共英雄”自傲。岂知覆巢之下必无完卵,国民党整个败局已定,小小王凤岗又怎能逃脱覆亡命运?

被拒之门外的丧家犬

自从傅军主力龟缩铁路沿线后,三角区只剩王凤岗的保安旅团,我军即不断出击,深入其腹地,扫除岗楼据点,收缴伪大乡后备队枪支。王凤岗自诩“固若金汤”的统治区很快发生动摇,不仅新(城)、雄(县)、固(安)、霸(县)交界成为游击区,连固安城也一度失手。

1948年10月2日,王凤岗突然接到我军七十五团进驻大清河北板家窝的情报,王错误判断情况,认为我七十五团孤军深入,自投罗网,迅疾命令其王牌部队保安一旅及其余团队,全力以赴围歼我板家窝部队。3日拂晓,战斗打响,遭到我坚守阵地部队的猛烈还击,保安一旅自恃兵力胜我数倍,蜂拥而上,双方打得难解难分。这时,王凤岗突然发现,其西北方向、东北方向都有敌情,尤其是西面有部队直朝其指挥部插过来。王凤岗大呼上当,赶紧撤兵,但为时已晚。原来王凤岗部队已陷入我冀中主力七纵队二十旅的包围之中,王凤岗中了我佯攻保定、诱歼其主力于大清河北之计。我军采取一路突破,多路合围,多路突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的战术。从上午9点全线打响,一直打到12点以后,打得匪军溃不成军,大小庄一带开阔地,简直成了敌人的坟场。经四、五个小时激战,王凤岗的“王牌”保安一旅3000余人被歼。

从此,王凤岗一蹶不振,连吃败仗,在平津战役前夜,他连自己经营多年的新城老巢也不敢守,收罗溃散士兵、返乡团两三千人,直退守到良乡、丰台。

形势急转直下,1948年11月2日全歼东北蒋军47万余人的辽沈战役结束,傅作义已是惊弓之鸟,北平四城紧闭,严禁其主力外的残余部

队进城,并风传要改编到傅军主力中去,王凤岗一时成了丧家之犬。

11月10日王凤岗接到华北“剿总”通知,到铁狮子胡同开会,宣布部队整编方案。王凤岗自恃上有后台,总想在编制上讨些便宜,与宣布整编方案的新任省主席楚溪春还有一番争吵,但傅作义一到场,王凤岗等又敢怒而不敢言了。

关于统编地方杂牌武装一事,辽沈战役时,傅作义趁蒋介石曾来北平之机当面请示过蒋,蒋表示赞同。所以傅理直气壮地教训王凤岗说:东北为何败,共军为何胜,关键在统一指挥。东北败了,廖耀湘负责任;我统率不好,我负责,仗打到这个地步,没统一指挥行吗?

王凤岗无能为力,其残部乖乖地编入一一〇军,驻守永定门外。

逃往台湾死于非命

解放军兵临城下,平、津解放在即,王凤岗自知血债累累,不可饶恕,便偷偷同十六军军长袁普、十三军军长安平山逃往青岛,后转南京,后又逃往台湾。

其间,逃到广州的国民党行政院长阎锡山拟组织敌后反共救国军,王凤岗欣然从命,曾收罗其逃往南方的亲信拟以房山、涞水山区为依托,再向新(城)、涿(县)一带发展,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实现反攻复国梦想。

一切梦幻破灭后,王凤岗逃亡台湾,据说曾在南投县任职,又跟胡宗南在澎湖前线帮闲。后来竟因军政之间、派系之间矛盾,王凤岗也卷了进去,定了个大陆内奸的罪名抓了起来,经国民党国防部长陈诚说话才免了一死,但长期监禁,既不准本人申诉也不公开审理。王凤岗在狱中忧郁成疾,于1962年病死。

(责任编辑 洛松)

补正

本刊2002年第12期第8页《叶剑英一生两件大事》一文中第7行漏排有误。全句应为“……让二十军和十一军的部队开往九江、德安等地区而后以三个军的兵力消灭叶、贺部队。”特此补正,并向作者、读者致歉。

《炎黄春秋》编辑部

中山舰舰长 李之龙 改革楚剧

● 刘作忠

楚剧,旧称哦呵腔、黄孝花鼓戏、西路花鼓戏,形成于清道光年间。黄孝花鼓戏形成初期,仅在农村元宵节玩灯时演唱,俗称“灯戏”,其演员均为农民、手工业者,多属业余自娱性质。后来逐步出现农闲演出的“麦黄班”和常年演出的“四季班”。

官府一直禁演花鼓戏,艺人们长期在禁令未达的农村或易于逃避缉捕的地方演唱,偶尔进入汉口,也只是深夜演出后即走。到了光绪二十八年,汉口租界的外国人从“文化多元化”和经济利益考虑,允许黄孝花鼓戏正式进入租界的茶园常年公开演唱。

由农村进入九省通衢、人文荟萃、剧种繁多的汉口演出,是黄孝花鼓戏的重大转折。黄孝花鼓戏为顺应城市观众的需要,广泛吸收、移植东路花鼓戏、天沔花鼓戏、汉剧、秦剧、文明新戏的剧目,日益增多故事连贯、情节曲折、有始有终的连本戏,从而改变了最初以小戏、折子戏为主的演出格局。流行地区由武汉、黄陂、孝感等地迅速扩大到全省。

1926年9月,国民革命军攻克武汉后,黄孝花鼓戏艺人成立了工会,名“湖北进化社”。“黄孝花鼓戏”改名“楚剧”。“湖北进化社”随之改名为“楚剧进化社”。楚剧从此跨入了新时代。

李之龙,1897年生于湖北沔阳西流河杜家



李之龙

窑,1912年考入武昌外语专门学校英语科,课余与同学组织话剧社,创作并主演新话剧《叶老爷现丑记》。1915年,他考入烟台海军军官学校,因发动水兵和校工罢工,反对校方克扣军饷,被军校开除学籍。1921年秋,李在上海结识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接受马列主义,回武昌从事革命活动,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初,他任中共汉口地方委员会执行委员,旋赴广东任苏联顾问团团长鲍罗廷的英文翻译、秘书。5月,李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毕业后留校协助周恩来主持政治部部务。1925年2月,他任黄埔军校学生军教导营党代表,并

与陈赓、蒋先云等组织血花剧社,任社长,创作并主演话剧《新时代》。同年10月,李之龙晋升为国民革命军政府海军局政治部少将主任。1926年1月,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将军衔),兼任中山舰舰长。3月20日,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李被秘密逮捕。在3个月的图囹中,他以笔为枪,创作出反映义和团运动的《国魂兮归来》,反映鸦片战争的《此恨何时灭》等剧本。6月李之龙获释,派往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总政治部负责宣传工作,兼任新剧团主任。9月,李随北伐军到达武汉。12月,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接收汉口新市场(今民众乐园),定名为中央人民俱

乐部(血花世界),李之龙任俱乐部主任,从此开始致力于楚剧改革运动。

李任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后,即在大门口张贴“先烈之血,主义之花”的大幅标语。其墙头廊柱上,用油漆书写着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格言,并设有演讲厅。李立三、吴玉章、瞿秋白、邓演达、刘少奇、周恩来、宋庆龄、何香凝等先后应邀在此发表演说。

在李之龙领导下,血花世界先后公演了以义和团运动、鸦片战争为题材的《国魂兮归来》、《此恨何时灭》和以现实革命斗争为题材的《二七惨案》、《革命军来了》、《三个商会会长》、《工厂主》、《夜未央》、《弃妇》等新剧。1927年2月,在收回英租界的强烈呼声中,还排演了新剧《孙中山伦敦蒙难记》,李之龙亲自扮演孙中山,演得栩栩如生,颇受观众好评。

楚剧进化社在血花世界除演出传统剧目外,还演出了根据日本作家菊池宽名剧《父归》移植的《父之归家》,由唐性天根据德国作家歌德名著《史维拉》改编的《费公智自杀》等。“旧瓶装新酒”,中国人演外国戏,此二剧在武汉上演后,轰动一时。

为了提高楚剧艺人的文化素质,李之龙于同年3月组织成立了“楚剧进化社演员训练班”,亲任主任。他邀请社会名流分别为训练班100多名学员讲授各种文化艺术知识。他本人讲授《演员的修养》,在讲授中强调演员要注意人格修

养,求艺术的精进,要把楚剧的演出看成是宣传革命、教育平民进步的需要,不可只顾赚钱吃饭。

在李之龙“提高楚剧剧员人格与生活待遇”的主张下,楚剧艺人先后参加了慰问北伐伤病员、声援上海罢工工人、救济灾民等多项义演,并与苏俄姊妹歌舞团、京汉名伶同台献艺等等。这些活动,扩大了楚剧的声誉,提高了楚剧的社会地位。

李之龙十分重视楚剧剧目,他赞扬楚剧的唱词是“极优美的民间文学”。他主张发扬楚剧长于表现社会问题的优势,更多地反映妇女与婚姻问题、大家族制度问题、遗产继承问题、纳妾蓄婢问题、童养媳问题等。

1927年3月22日,由李之龙改编、导演的《小尼姑思凡》正式在血花世界大剧场演出。楚剧名伶李百川、张桂芳、沈云陔、段殿坤等应邀轮流演出。

为了排演好《思凡》,李之龙满怀革命激情,以火辣辣的语言撰写了《导演法》,将歌剧、话剧的一些艺术手法运用到楚剧的排演场。他是楚剧发展史上第一个制定导演构思的执行导演。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李之龙奋笔疾书讨蒋檄文。次年2月8日,李英勇就义于广州黄花岗,年仅31岁。噩耗传至武汉,在白色恐怖中的楚剧艺人们悲愤填膺,大家冒着生命危险偷设李之龙之灵位,以寄哀思。

(责任编辑 刘家驹)

欢迎订阅《炎黄春秋》

爱国团结 弘扬中华文化
求实存真 秉笔直书今古大事

《炎黄春秋》是纪实性综合月刊。面向现实,纵观历史,着眼国内,兼及海外,对古今中外的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依据翔实的史料,秉笔直书。誉人不增其美,毁人不益其恶,在期刊之林具有鲜明特色。

本刊拥有一大批高水平作者。他们有的是资深的革命家,是重大事件的经历者;有的是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对国内外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有深入研究。他们的文章具有较高的权威性和史料价值。

没订上,没买到,您莫急,请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办理补购订阅手续。没有时间限制,不另收邮费。

《炎黄春秋》每月4日出版,大16开本,内文80页,60克双胶纸;彩封,157克铜版纸。每期售价4.80元人民币。

西南联大民主精神长存

● 张 彦

在中国教育史上,曾经有这样一所特殊的大学,

她诞生于抗日战争的烽火之中,却荟萃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名校的大师巨匠;

她坐落在条件艰苦的云南边陲,却吸引了大批仰慕名师、向往民主自由的莘莘学子;

她前后存在的时间不过短短九年,却培养出了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闻名的杰出人才;

她,就是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二战期间一所有着卓越成就的战时大学。

这是2002年11月1日下午在北大纪念西南联大建校65周年大会上,朗诵《西南联大赞歌》的一段序曲。

“西南联大”早已不复存在,为什么今天还要这样隆重纪念?讲话和演出,深刻而形象地给人们展示出这样一幅历史画卷:这所在“七七事变”后经历万里迁到昆明落脚的战时大学,一直处在物价飞涨、社会动荡、日机轰炸不断的恶劣环境下,师生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无法保障。三校原有的图书、仪器和设备大部分未能带出,办学的物质条件极差。教室和宿舍都是以土坯做墙、铁皮或茅草为顶的平房,实验室只有简陋的设备。学生大都靠助学金或者课余打工过日子,老师的微薄薪金也难以维持一家生计。著名的诗人、学者闻一多先生为了养家糊口,只能凭借他的篆刻艺术挂牌治印,常常刻印到深夜。校长梅贻琦的夫人韩咏华,为了贴补家用,精心制作豆沙米糕送到冠生园去寄卖,取名“定胜糕”,表示坚信“抗战一定胜利”。

尽管如此,带着三所名校优良传统来的联大教师们,自始至终怀着抗战兴国、敬业育人的信

念,勤勤恳恳地从事教学工作。在不到九年的时间里,先后有8000名学生就读于西南联大,毕业的3800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新中国成立后,原联大教师被评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有71人,学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有88人;定居海外的原联大师生被评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的有4人,其中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李政道。获得新中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杰出科学家中有8位是联大校友。在人文科学方面,联大校友中涌现了许多政治家、文学家、哲学家、社会科学家,有的已进入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担任教授、研究员、高级工程师、高级新闻工作者等各种职务和各级干部中的骨干,更难以数计。在台湾和海外,有突出成就者也不乏其人。在抗日爱国民主运动中,当时就有“民主堡垒”之称。同学中有一千多人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留在学校学习的则是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主力,在联大兴起的“倒孔(祥熙)”运动(1942)和“一二·一”运动(1945),在全国都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闻一多先生和十多位联大同学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抗战胜利北迁复校后,回到北方三校的联大师生们是平津民主运动的主力之一,成为中国当时“第二条战线”的重要构成部分。留在云南的则有很多人成为解放战争中人民解放军滇桂黔纵队的骨干。应该说,在中国教育史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西南联大都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为什么西南联大能在那样的条件下作出这样大的成就和贡献?这是国内外许多人都很感兴趣并进行研究的问题。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

教授易社强 (JOHN ISRAEL), 以西南联大为课题进行研究达十年之久。他的一本近 500 页的巨著《联大——战争与革命中的一所中国大学》, 已于 1998 年由美国史坦福大学出版。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也已经多年从事关于西南联大的研究, 并在日本学术刊物上多次发表评说联大历史的系列文章, 这次, 他专门和夫人一道从东京赶来参加了纪念大会。

学者专家们虽然对此作出了各种各样的分析, 但却一致认为, 西南联大的师生继承和发展了“五四”运动和“一二·九”运动的“爱国、民主、科学”精神。当时坚持抗日救国、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共同认识和信念, 就是大家克服种种困难的动力。而且, 久负盛名的北大、清华、南开组合后, 师资阵容冠于全国, 老师们的学识、治学方法、学风、敬业精神、道德风范以及艰苦奋斗的作风, 时时刻刻使青年学子受到教育与熏陶。

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 已经不知多少次在各种场合下表露了他对培养他的西南联大的无限感激和眷恋。他在回忆他在中国的大学生活时说过: “今天国际上, 非常出色的第一流学者中, 有科学方面的, 有工程方面的, 有文史方面的, 很多是联大当时造就出来的……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我一生非常幸运的是在西南联大念过书, 因为西南联大的教育传统是非常好的, 这个传统在我身上发挥了最好的作用。”

主持西南联大校务的梅贻琦校长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他有过一句名言: “所谓大学者, 非谓有大楼之谓也, 有大师之谓也。” 他一贯突出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在大学的特殊作用, 历史业已证明确实如此。为克尽学术自由的使命, 他一向推行蔡元培先生“兼容并包”的办学主张。在清华和以后的西南联大校园里, 始终汇聚着学术思想的各家各派, 因为学术是需要自由的。在联大教室

里, 一个教室里在讲唯物主义, 另一个讲的可能是尼采哲学。联大学生回忆起梅校长时, 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忘不了, 他始终以民主思想、学术自由的开明政策为治校原则, 他对左右派的思想兼涵并容, 从不干涉。

西南联大的艰苦历程和基本精神, 在 11 月 1 日的纪念大会上, 正由众多白发苍苍的老校友和一群来自三校的年轻学生, 通过朗诵、歌咏、舞蹈以及化装表演闻一多的《最后一次演讲》, 再度表现出来。在场观看的年轻人看到, 在这样艰苦的物质条件下, 因为有了民主、科学和爱国主义与学术自由的精神环境, 却培养出了这样多的杰出人才, 他们的表情是无限向往与敬佩的。扮演闻一多的, 是清华大学电机系三年级一个 20 岁光景的学生。为了这次短短的演出, 他读了闻先生不少的作品, 才领会了一点为坚持联大精神而英勇牺牲的教授的浩然正气是从哪里来的, 参加这次演出以后, 了解到有过这样的一个学校、而且培养出这样大量的人才, 他震撼了。当我在电话里听到他激动地对我谈他的感想时, 我很自然地联想起, 当年执教于西南联大的教授、如今已经 92 岁高龄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为纪念西南联大 65 周年亲笔书写的贺词: “时代虽然发生很大变化, 联大精神依然十分可贵”的涵义是什么。

(责任编辑 刘家驹)



40 年代初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校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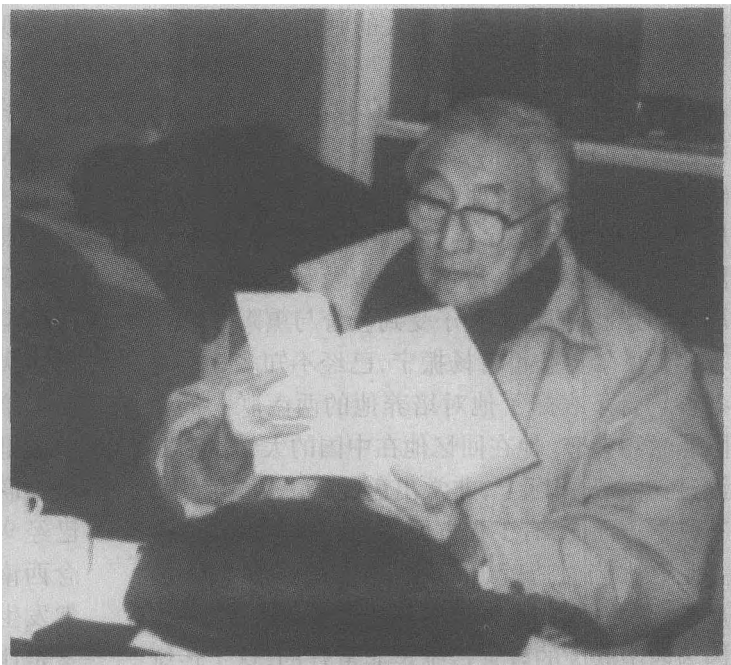
《温济泽纪念文集》出版记

● 杨兆麟

在人们的殷切期盼之中,经过有关同志的不懈努力,《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终于和读者们见面了。和温济泽并肩战斗多年的老友们,和他在各单位一起工作过的同事们,曾经受教于他的同学们,他的亲密的家人们,都可以告慰他在天之灵了。我们几个参与编辑工作的人,了却了深藏在心中三年半之久的夙愿,总算没有辜负各位作者付出的精力和心血。

当读者拿到这本文集的时候,会首先看到封面上的“永远的怀念”五个大字,署名“胡绳”。当时,这位受人尊敬的老学者已经沉疴在身,难以执笔为文,却正如他一贯的严谨学风,工工整整、一笔一画地写下了这五个字,并且郑重签名。据我们所知,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题写书名,见字如见人,成为他留在人间的珍贵遗墨。文集的封底,印着温老笔录的一首古诗:“春蚕不应老,昼夜常怀丝;何惜微躯尽,缠绵自有时。”表明了他“做人的准则:‘春蚕作茧,不知疲倦,微躯断尽,在所不惜’”。他在晚年赠给朋友们的这一诗句,同样是留在人间的珍贵遗墨。

编委会聘请于光远、李锐二位耄耋学人担任顾问,他们不仅欣然同意,而且都撰写了饱含深情的纪念文章。李锐在文章的最后,引用温老生前所写《告别二十世纪》一文中的话:“我一生经过大小八十一难,得到了一部真经,这部真经是:迎接未来世界的机遇和挑战,最重要的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勇往直前,义无反顾,坚持创新,勇于创新。创新是我们民族的灵魂,创新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的动力,人的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科学发展是无止境的!世界发展也



温济泽

是无止境的!”李锐衷心希望“温济泽的朋友们,都不要忘记他最后的留言”。于光远在文章中说:“温济泽是一个好人,所有了解他的人都这么说。他很正直,也很温和。他特别勤奋,老了仍旧笔耕不辍。”这句话说得非常朴素,真实、生动地刻画了温老的为人和精神,值得人们仔细品味。

当年曾经在新华社共事、又同属社排球队、可谓名副其实的“老战友”方实和我,受命担任这本文集的主编。我们怀着战友情和使命感,在晚年又一次合作,颇为默契,也很愉快。我们认真拜读了所有的文章,那流露在字里行间的肺腑真情,使我们深受感动。尤其是阅读了几位老人的文章以后,沉思默想,时常情不自禁,热泪盈眶。温老 1929 年参加革命,1936 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经常称共青团为“我的母亲”。1932

年由于投身抗日活动而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和他同时被捕的原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超,撰写了《我与温济泽在苏州单人监狱度过的岁月》。这位90老人记忆还十分清晰,叙述非常具体,使我们看到温济泽这位忠贞的革命青年,在铁栏中坚持斗争的身影,他刻苦攻读马列主义著作和自然科学书籍,为他以后长期的革命工作奠定了丰厚的理论基础。由于他立场坚定,工作积极,1936年还在国民党的牢狱中就转为中共正式党员。虽然在延安大家都叫他“小温”,而在交往和言谈中,无不感到他既年轻又老成,原来他早已有了不平凡的革命经历。文集中收入了原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院长翟定一的500字短文,末尾写着:“1999年6月16日口述于病中,妻罗文珍记录。”当编委会的约稿信寄到的时候,他已经身患绝症,卧于病榻,艰难地口述了《深切怀念温济泽同志》,文短情长,高度赞扬温老“为人宽厚,待人诚恳,乐于助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是坚持真理,忠心耿耿,兢兢业业,为党为人民鞠躬尽瘁”。我们一字一句地阅读,倾听了一位垂危老人发自胸臆的诚挚心声,深知它是多么宝贵。我们不久就得知,仅仅在他口述此文的一个星期以后,也随着温老和我们永别了,那500字真是非同寻常啊。当年和我们同在新华社工作的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廖盖隆,获悉噩耗,内心哀悼,表述为文,撰写了《纪念我的朋友温济泽》一文,称颂他“是一位品格高尚、学识渊博,又为人民作了许多贡献的好共产党员”,他“尊重真理,富有思想,且为人忠厚,以谦和、平等、民主的态度待人”,“绝无害人之心,也无防人之心。正因为这样,他在多次政治运动中吃亏挨整,走着一条坎坷的人生道路”。廖盖隆工作勤奋,生性乐观,大家亲切地称他“老盖”,不过体弱多病,不久也永远离我们而去了。读者在本书的目录中看到,翟定一、廖盖隆的姓名上,都标识着已故者的黑色,会感到几分沉重。我们因胡绳、翟定一、廖盖隆都来不及看到这本文集的出版而深为遗憾。新闻界的老前辈、同样是90岁高龄的谢冰岩,和温老是“小同乡”,有着70年的战友之谊。他的一只眼已经失明,另一只眼为青光眼所折磨,仍然奋力撰写了3000字的长文《一瓣心香献老友》,然后用放大镜一个字一个

字地校对了一遍,真是难为他了。他们在中学时期成立了“稚鸿社”,出版反帝、反封建、探索人生和国家前途的刊物《稚鸿》,虽然自己感到有些幼稚,却怀抱鸿鹄之志,在广阔的天空翱翔,任凭雨暴风狂,而顽强不屈,展翅霄汉。温老在晚年把一百多篇文章编辑成书,终生丹心不变,取名《征鸿片羽集》,刚刚出版,就赠给我一本,并且以我熟悉的字体,在扉页上写道:“我是一只鸿雁,在漫长的征途上,苦苦地飞奔了这么多年,经受烈日晒,狂风吹,暴雨淋,雷电轰,剩下这稀疏的片片羽毛。”我反复阅读,深知他自谦的这“片片羽毛”分量有多重!

温老的女儿温飏和外孙女杨捷的文章,真实具体,感情细腻,使我们了解他对后代的严格要求和细心关怀,娓娓道来,感人至深。他像一头老黄牛那样勤奋耕耘,忙于写作,在间隙中不忘对女儿的关注、教育,借用鲁迅的话说:“我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甚至是血啊。”他十分推崇方志敏烈士的高风亮节,让女儿和外孙女用心学习《清贫》一书,使优良的革命传统一代一代传下去。杨捷写道:“姥爷是一个关心青年、平和宽厚的老人,一个一生实事求是、追求真理、具有高尚品格的人。姥爷走了,而我将带上他留给我的精神财富,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上前行。”

在我最后一次阅读文集的校样以后,不由得长长舒了一口气:“终于做完了一件事。”此时此刻,几十年的种种往事,再一次浮现在眼前。从延安清凉山到瓦窑堡(即子长县)史家畔的窑洞,从太行山麓到滹沱河畔的农家小院,乃至北京城里的办公室和宿舍,温老和我们一同工作和生活,度过了战争年代和青春年华,经历了几次政治风暴的考验,又都从中年进入了老年。他是我的兄长和领导,我目睹了他是怎样工作、学习和生活的,聆听和感受到他那种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精神。他待人接物那样温和、谦恭、平易,没有一点令人生厌的“官僚口气和故意摆出的架子”。他的言谈,他的笑声,不时在我耳边回响。读者朋友们,不论老年人还是中青年,也不论和他相识还是不相识,如果从这本文集中受到启发,有所收获,就是我们编书人的最大心愿了。

(责任编辑 程 度)

漫画家张谔的战斗人生

● 黎 辛

张谔是我久闻大名的漫画家与美术活动家。可是,到1942年初我调到延安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作副刊编辑时,才认识他。

“漫画成家 广告立业”

报社编辑部在延安东关

渚凉山西头的十孔石砌窑洞中办公,工作人员住在东边石砌的两排窑洞中。我调来时山上没有空窑,临时住在山下的石窑里。张谔住的石窑大约比我住的高10米,在我斜对面。一天中午下班我从办公窑回住处,忽听有人拖长声音喊:“噢!——黎辛!”

我抬头,见张谔向我走

来,“是黎辛同志吗?你好,我是张谔。听说你是新来的副刊编辑,我是美术科长,我们是文艺的同行,我想认识你,到我窑里坐坐吧。”他说着转身往回走,我跟在他的后面,来到他的窑洞。窑外有小平坝,窑门上贴着对联:“漫画成家,广告立业”八个美术字。我说《解放日报》有什么广告?只有报眼上有时登个启事或声明,没什么商业广告。他说这是暂时的,我在《新华日报》当美术科长也管广告,报纸的广告是大有可为的。

张谔是一个身高一米八、体重约90公斤的大个子,但行动灵活,很有朝气,对人和蔼可亲,没有文艺家的架子,说话总是笑着。

他让我坐坐,我说该打饭了。他说打饭来我这里吃,我有红烧肉,味道还不错,是用国统区进口的大头菜烧的,延安的酱油不行。他边说边从书桌下的凳子上端出一锅红烧肉来。揭开锅盖,果然,肉香诱人。他问:“你打麻将吗?我东边两孔小窑住的是中央印刷厂厂长祝志澄,他老婆在外单位,星期六他老婆回来他才来



张谔漫像

江有生

住。你们副刊的陈企霞星期日也常来，我们四个人打麻将。你要是打麻将就好了，我们打，谁输了做两斤红烧肉请客。”

“讽刺画展”

1942年2月15日至17日，延安美术家协会在军人俱乐部举办“讽刺画展”，展览一室为蔡若虹的作品，二室为张谔的作品，三室为华君武的作品，每人展览20多幅漫画。

2月15日，《解放日报》文艺栏第82期出版专刊，发表三位画家的《作者自白》。文中说：“为了画展的举行，我们很高兴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能让我们指出它的缺点，也就是我们大家的缺点，而得不到压迫和损害。我们为什么不应该对这社会有更高的热爱？我们就将以这次的画展来表达我们的热爱，我们的画展的主旨是揭发旧的思想意识中带过来的渣滓，它附着在新的社会上而且腐蚀着今天新的社会。”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文化水平提高了》等漫画，揭示了生活中“不健康的，不合理的，可笑、可鄙的，甚至可恶的事情”。

当时报上报道讽刺画展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展室“挤挤拥拥，说说笑笑，空气十分活跃”，“观众五千余人，把窑洞的门都挤坏了”。延安参加整风学习的干部与党员总共才一万人左右，参观画展的人数却占了参加整风人员的半数，很不常见。

麻将牌局

3月中旬，舒群调报社接替丁玲任副刊主编，住在张谔西边祝志澄让出来的一孔小石窟里，陈企霞和我常去，晚上没事四个人就打麻将、吃红烧肉。张谔嘴里说输牌赌二斤红烧肉，一般都是他请客，他慷慨大方。星期天遇上舒群夫人回来，有时也烧菜加餐。

博古社长路经这里有时也进来看看张谔和舒群，他知道张谔处常打麻将，有时遇见张谔时，他哈哈大笑地说：“张谔你喜欢打大牌，什么时候我来打一次，一定叫你不成，赢你两斤红烧肉。”博古是说说玩笑而已，他工作忙，早上六时起床去上早班，晚上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从不跳舞、打牌，他哪有这个闲暇？张谔说：“你只说干不干是嘴把戏，谁知道你的本领怎么样？”有一天，博古终于进到张谔的窑洞来打牌，他坐在张谔的上手，我坐张谔下手，舒群坐张谔对面。博古脑子灵，他记得谁打过什么牌，估计谁手里有什么牌或可能要什么牌。一次，舒群打一张“发财”，张谔说：“碰”。博古说：你“碰”什么？张谔说：“碰”发财呀。博古说：“刚才黎辛打‘发财’，你为什么‘碰’？”张谔说那时他还没有“对儿”，怎么“碰”？博古从自己的牌里拿出一张“发财”，说：“黎辛打一张，舒群打一张，我有一张，你凭什么碰？你是偷黎辛打出去的‘发财’凑对碰的，不

行！”张谔争辩：“我明明是一对‘发财’，你不让我‘碰’，讲不讲道理？”博古要张谔把从“地上”拿的“发财”交出来，把“地上”换“发财”的那张牌拿回去。张谔拿了张“北风”进去。博古说：“不对，你打全幺九，你拿出来换‘发财’进去的是‘三条’。”说着便把“三条”给张谔。这样，张谔和不成，却让我和了牌。摊牌时，博古笑着说，“张谔你好大的野心，你要和清一色全幺九对对和，你要的‘东风’我这里有两张，‘白板’我也有。”摊牌时，张谔感叹说：“‘东风’我可作麻将，如有一张‘白板’，我这副牌就厉害了。”

到1942年4月3日正式开始整风学习，我们就不打麻将了。以后几十年我都不打了，虽是娱乐，太费时间。

张谔的漫画与“拳头”

张谔为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画了许多漫画。1942年7月2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第一幅反法西斯的漫画。张谔预言希特勒必败的作品，他用屠格涅夫的诗句作标题“幻影消失了，留下的只是现实！”画面画的希特勒是只大蜘蛛，在丝丝紧扣的蜘蛛网里垂死挣扎，耐人沉思。

张谔的漫画表现了抗日战争与反法西斯战争的重大事件，意大利法西斯的墨索里尼垮台了，张谔画《墨索里尼“荣膺”第一名》，三个法西斯头子带头赛跑丑态毕露，第一

名墨索里尼摔出跑道，希特勒也将跑到终点。

1943年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调集二三十万大军，阴谋进攻延安。张谔的漫画《“四大领袖”之一》，揭露了所谓抗战“领袖”的蒋介石两面派的真实面目。画面上的蒋介石一边朝着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尔，这是同盟国的“四大领袖”；另一边朝着希特勒、墨索里尼与日本天皇，这是轴心国的“四大领袖”。

为配合整风学习与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号召知识分子放下架子，改造思

想、立场，张谔的《老子天下第六》，画了一个妄自尊大的傲者戴着眼镜，军帽戴在后脑袋瓜，上衣有9个钮扣，口袋插着3支笔，得意忘形地站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与毛泽东挂像前张望。

张谔在延安发表的绘画数量仅次于华君武。

胸怀纳百川

当报上发表各个山头美术家各种形式的作品时，张谔组织稿件不分山头，不讲流派，也不论名家与新人。报上发表

的漫画名家有蔡若虹、华君武、黄铸夫、陈叔亮、钟灵、彦涵等的作品。木刻名家有胡一川、陈铁耕、沃查、马达、陈叔亮等作品；还有青年木刻家古元、罗工柳、华山、焦心河、夏风、计桂森等的作品。报上这些内容与形式丰富多彩的美术作品，可说是美术科长张谔胸纳百川的功劳。

华君武发表漫画，也发表连环画，如《相差不多》，一组连环画左边画法西斯罪行七幅，第八幅：墨索里尼倒毙在地；右边画国民党反动派罪行七幅，第八幅画个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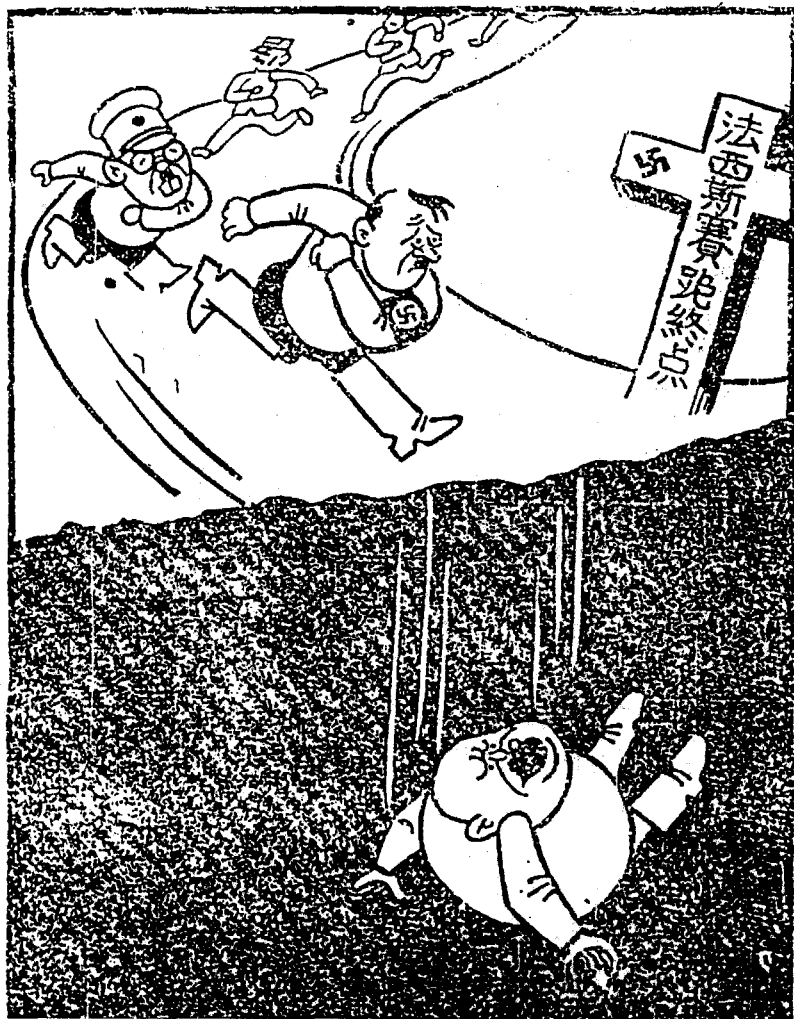
木刻家也画连环画，如夏风的《劳动英雄孙万福》。

古元木刻的《秧歌》，以秧歌这民间艺术形式表现群众的艺术活动，刻绘得生动形象，让读者感受到民间艺术的情趣与魅力。

印刷厂锌版极少，后来完全绝货。报上需用领导人头像，英雄模范头像，或者专栏小报头时，怎么办呢？便由张谔绘画，工人把它刻在木版上印刷出来。其中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与副主席李鼎铭的头像。

地图、插图、美术字

读者阅读战争新闻，总想要看到与之有关的地图。当时由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封锁，延安非常缺乏地图，为报纸绘制地图的任务便落到张谔身上。1941年5月19日报上发表社论《地中海形势》，张谔不仅绘制一般战争形势图，还



墨索里尼荣获第一名 作者 张谔

绘制了《地中海形势图》、《苏联西部边境图》、《日本陆军分布图》，给读者阅报以方便。绘制地图的资料，个人、报社资料室都没有新的国内外地图，张謇只好跑去外单位借用，画完再还，再画再借，不厌其烦。发表地图

没有锌版，只好木刻，而木刻的地图上又不便有许多美术字的地名，张謇便与工人商量，在木刻上打洞嵌入铅字。

鲁迅先生说：“书籍插图，原意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的情趣，补助文字所不及，所以应是一种宣传画。”张謇受到了启发，认为党报发表的文学作品也应该有插图。副刊发表黄钢、杨思仲、冯牧的报告文学《我们的中队长在山林中》，有古元作的木刻插图。发表赵树理的小说《李有才板话》，张謇请木刻家罗工柳与杨君作插图。孔厥的弹词插图则是由木刻家力群作的。张謇重视给文艺作品作插图，可以加深读者对作品的理解，又可增添读者审美情趣，与作品相得益彰。

1942年整风初期，报上发表整风论文，读者难以理解，张謇有时也请画家插图。如5月5日发表艾思奇的一篇文章，就请华君武插图二幅，其中一幅，描绘“不要落井下



林伯渠(左)李鼎铭头像 作者 张謇

石”的意思。

《解放日报》美术插图水平之高，数量之多，在新闻史与文艺史上是罕见的。在今天报纸印刷出版技术进入高科技时代，借鉴和发扬《解放日报》为文学作品插图的优良传统，仍有其现实意义，照片是不能代替美术插图的。

当年中央印刷厂的字体很少，报纸的新闻标题只有老宋体和黑体字两种，显得单调。张謇便向博古社长提出他写美术字，为头版头题作标题字。开始只为头版头题写，后来他的美术字写多了，其他标题也用。给新闻报道写标题字需及时，张謇便每天清早与新闻编辑一起上早班，写完标题字即赶往排字车间，与工人师傅商量印刷。

毛主席接待三位漫画家

毛主席说过“漫画还要发展”。漫画家希望见见毛主席

面陈请教。我记得，那是1942年夏天的一个下午，蔡若虹、华君武、张謇与舒群一路去枣园毛主席的住处。

蔡若虹回忆当时毛主席接见的情况：“我记得清清楚楚，毛主席接待我的第一句话是以张謇的介绍开始的。张謇对主席说：‘蔡若虹就是蔡公时的侄儿。’”蔡公时是著名的外交家，在济南与日本侵略者办外交，被日本鬼子割舌头，挖眼睛，刺刀向着他的身体乱刺……死得悲惨壮烈。

蔡若虹记得当时是张謇先请毛主席谈谈对讽刺画的意见。华君武对毛主席说：“您只要谈谈我们作品的缺点就行了，我们都希望听听您的看法。接着，毛主席对我们看了一眼，才慢吞吞地开了口。他说：‘讽刺是批评的一种手段，我们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当然也不会把讽刺关在门外……批评也好，讽刺也好，说话总要说得符合事实……要避免片面性，不以偏概全。’接着这段

话，毛主席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幅漫画的标题是《延安的植树》，是几棵没有发芽的光秃秃的小树干，这表示树都没有种活。我看，这哪里是延安种的树呢？大概是清凉山下种的树吧！如果延安二字改为清凉山就对头了。’”

华君武告诉毛主席，这幅画是他画的。蔡若虹向主席解释：“清凉山是《解放日报》和抗日大学所在地，是知识分子的集中点，清凉山下种的树都没有种活，这是华君武画讽刺画的根据。”

说话间，蔡若虹向毛主席说他特别喜欢《新民主主义论》。“毛主席没有马上回答，停了一下才慢吞吞地说：‘知识分子这个名称不太好，什么知识分子不分子，应该说他的本行，应该是脑力劳动者。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是一个娘生的双胞胎兄弟，都是被压迫者。有压迫就必定有革命……革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这次接见，毛主席和大家谈得很投机，就着一碟凉拌豆腐，一碟青辣椒，一碟西红柿，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话匣子打开了，无所不谈。张謇问毛主席，想申请入党又觉得自己条件不够，怎么办？怎么申请入党？怎么作党的支部书记？华君武说上前方打仗他敢冲锋陷阵，但怕被俘受刑，问毛主席怎么办？毛主席说，“我告诉你，一旦被俘受刑，你心中想着人民。”不知不觉到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了，几位文艺家向毛主席告辞。主席一直把他们

送到枣园门口，握手告辞时，毛主席又语重心长地重说一遍“要想着人民”。

张謇为革命鞠躬尽瘁

张謇于1945年10月5日在《解放日报》入党了。在早年参加左联及革命文艺活动的文艺家中，张謇入党比较晚，这是因为他严格要求自己，总觉得自己还不够党员条件。

张謇1931年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毕业，1929年时已参加以田汉为首的南国社进步文艺活动，1932年夏在上海参加左翼美术家联盟，并任支委，这期间编过许多美术报刊，参加过许多革命文艺活动，1938年任武汉《新华日报》社美术科长。他是文艺家中“吃公粮”较早的干部。

1938年10月，张謇受命去香港为《新华日报》社采购照相制版器材与聘请照相制版技术工人。在香港，受八路军驻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指示，到上海沦陷区约请蔡若虹、夏蕾夫妇去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工作。1939年4月，张謇带领蔡、夏夫妇及制版工人何耀东、林阿九和一批照相制版器材，经越南、昆明、贵州等地，崎岖转折到达重庆。这时《新华日报》已从武汉迁到重庆，张謇和制版工人等留下工作，蔡、夏夫妇奔赴延安。

1940年张謇从重庆到延安时，带着照相制版器材与制版工人，还带有医务人员与医药品，这是延安极为需要的。

他们长途跋涉，通过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层层封锁。张謇对外的身份是八路军少校副官，押运军车一辆、人员20名、物资若干。到某封锁线时，被国民党反动当局扣押，历时16天。张謇块头大，穿着校官军服，佩带少校军衔，说话声音洪亮，振振有词。他坚持不让敌伪检查物资，那些军阶较低的敌人怯他三分。张謇一面安抚同志，一面与敌斗争，临危不惧，有勇有谋。到16日后，张謇终获胜利，一行人连车带物朝延安进发。同行的许多人中以为他真的是押运副官，而不知他是一位漫画家。这段传奇经历一直传为佳话。

1946年，张謇调往香港作经济工作，为解放区购买两船物资，一船如期到达，另一船途遇台风，不知刮到何处去了。张謇急坏了，这都是解放区急需的东西啊！怎么向组织交待呢？幸好经过风浪洗礼，这艘不屈的船装着完整无损的物资，漂到了解放区。张謇又胜利了。

1962年，张謇任中国美术馆副馆长，协助刘开渠，为美术馆的建设，特别为我国历代美术家优秀作品的收藏、研究、陈列、出版以及对外交流作了许多工作。在工作中他从不营私谋利，千方百计为馆里收藏优秀美术作品，个人却从不收藏一幅，一生为公，“两袖清风”。

张謇1995年5月去世，时年85岁。

（责任编辑 方 厚）

汉代张释之断案不唯王命

江仁宝

张释之是南阳堵阳人。汉文帝时,以贤选为郎,累迁公车令、中郎将,后任廷尉。廷尉是封建皇朝中专门主管司法审判的最高官吏。

据史料记载,汉朝时期大多数廷尉办案时,都是专看皇帝的言行脸色行事的,法律则搁置一边。武帝时,廷尉张汤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史记·酷吏列传》说:“汤决大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这就是说,在断案时唯皇帝之命是从。皇帝欲加罪者,他必定严判;而皇帝欲释放者,他则想方设法,绞尽脑汁,予以宽免。后来,杜周为廷尉,一切效仿张汤,专门对皇帝察言观色,唯王命是从。《史记·酷吏列传》指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有人责问杜周:“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旨为狱。狱者固如是乎?”杜周则厚颜无耻地回答道:“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这充分说明,皇帝的个人意志就是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即使公布于天下的成文法或非成文法,也都必须置于皇帝的诏令之下,这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法律的一个鲜明特征。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张释之敢于公然违背君命,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坚持依法断案,这对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的司法官吏,不能不说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典范。

《汉书·刑法志》说:“及孝文即位……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所谓“罪疑者予民”,就是对那些证据不足或有疑问的案件,都减轻或免除其刑事责任。如此断案,当然是“刑罚大省”,减少冤狱。这虽然非张释之一人之功劳,但却说明作为“治国安邦”的廷尉,对维护封建法制来说,其地位与作用是相当重要的。更值得指出的是,张释之不仅做到不屈从于皇帝的权威,不察言观色,刚正不阿,坚持依法断案,尤其是他有胆有识,据理说服汉文帝重视依法办事,更有着独特之处和不可磨灭的功勋。

张释之说:“法者,天下公共也。”这就是说,天子立法后要与庶民共同遵守,这是我国古代在适用法律上无高低贵贱、一律平等的思想。早在战国时期,新兴地主阶级思想家商鞅、韩非等人,为了反对贵族的特权,都提出

过“刑无等级”、“法不阿贵”的进步主张。直到汉朝初期,在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确立之后,仍有人要求在适用法律上应当做到:“尊贵者不轻其罚,而卑贱者不重其刑。犯法者虽贤必诛,中度者虽不肖必无罪。”张释之对法的认识,同上述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这种思想也为后人所遵循。如唐朝,唐太宗非常重视法律的制定和实行。他说:“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

张释之还指出:“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意思是说,法律既然有规定,就应当依法断案,不能任意轻重,更不能任意更改法令。如果置法律规定于不顾,仅仅按照皇帝或个人的喜怒哀乐去断案,那就必然要破坏法律的权威和尊严。这一点,可以说是汉朝初期地主阶级的有识之士对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正确总结。他们认为秦王朝短促而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封建君主专制统治者自己破坏了自己制定的法律。他们“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刑罚暴酷,轻绝人命”。结果上行下效,人人自危,阶级矛盾加剧激化,不但破坏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关系,就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突出显露,四分五裂。有鉴于此,汉朝初期一些有远见卓识的地主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则把统治者自己能否依法办事、取信于民,看作是直接关系到封建政权命运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不仅仅是汉代,就是汉代以后有的朝代如唐、晋等也都继承了这种有法必依、取信于民的思想。

张释之还说:“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这就是说,皇帝如果亲自处理这类案件,欲杀欲族,悉听尊便;但是,一旦皇帝把这类案件交给廷尉来决断,廷尉就只能依法断案,而皇帝也理应尊重廷尉的职权。这在当时条件下,张释之不顾个人得失,敢于向封建专制的君主提出并坚持作为国家最高司法官吏对案件审理的决断权,这对于维护封建法律制度的尊严,做到依法断案,应该说在历史上起到了一定的进步作用。皇帝有时的暴怒、专横与干预也没有动摇张释之维护法律尊严的信念,“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他据法力争,并且针锋相对地提出:“今盗宗庙器

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相比之下,那些专门屈从权势,言听计从,助纣为虐,断案随意的后来者张汤、杜周之流,就显得十分卑鄙无耻,为世人所唾弃!”

但是,张释之所主张的依法断案,归根结蒂还是为了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稳定,维护封建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当然,也应该看到,封建法律制度终究把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保持在一定的极限之内,超

越这个限度就是违法。这个道理,无论对剥削者或是被剥削者来说,在理论的适用范围上,统统如此,概莫例外。因此,在封建社会里那些能够体察民情民意、依法办事的官吏,终究要比那些破坏法制、践踏法制、残害百姓、专以刑杀为威的酷吏,更有利于保护社会生产力和传统文化,更有利于促进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推动社会的进步。可见张释之断案不唯王命很值得今人借鉴。

(责任编辑 宗文)

书 名	作者或主编	定 价	邮 费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1966-1978)			
	杨胜群 田松年	27.00	4.00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郭汝瑰 黄玉章	68.00	7.00
邓小平时代(上下册)	杨继绳	32.00	4.00
外国人怎样评论毛泽东(全四卷)	萧延中 全价	88.60	10.00
“传说”的传说		28.80	4.00
从奠基者到“红太阳”		20.00	4.00
在历史的天平上		19.50	4.00
思想的永生		20.30	4.00
刘少奇之路: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	朱永红(全四卷)	69.80	7.00
我向总理说实话	李昌平	23.00	4.00
一盏明灯与五十万座地堡	严 秀	12.50	3.00
沧桑十年——为了悲剧不重演	马识途	33.00	4.00
永远的怀念——温济泽纪念文集	方 实 杨兆麟	25.00	4.00
马克思主义与改革开放	胡 绳	12.00	3.00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刘杰辉 张国华	25.00	4.00
中国改革开放史	朵生春	66.00	7.00
无罪流放	贺 黎 杨 健	24.00	4.00
陆定一传	陈清泉 宋广渭	29.80	4.00
杨尚昆回忆录	杨尚昆	25.00	4.00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徐 晓 丁 东 徐友渔	26.00	4.00
陈昌浩革命生涯	范 青 陈辉汉	38.00	4.00
我们都经历过的日子	季羨林	24.00	4.00
没有情节的故事	季羨林	25.00	4.00
枝蔓丛丛的回忆	季羨林	26.00	4.00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李 锐	29.50	4.00
思想解冻的春天			
——大转折日日夜夜(卷一)	张湛彬	24.40	4.00
红色风波中的交锋与较量(上下册)	曾繁正	39.80	4.00
呼喊——当今中国的五种声音	凌志军 马立诚	23.80	4.00
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	凌志军 马立成	22.80	4.00
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命运	吴 江	20.00	4.00
张学良世纪传奇(口述实录上下册)	唐德刚 王书君	69.00	6.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跨过厚厚的大红门	章含之	30.00	4.00
老三届朝歌——尘劫	丁小禾	22.80	4.00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共和国重大决策的来龙去脉》由《党的文献》编辑部组织编写的,旨在将从“文化大革命”前夕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十多年间党和国家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各方面的一系列重大决策以及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依据翔实可靠的材料,以史、论相结合的方法,将其来龙去脉呈现给读者,从而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所走过的这段历程。

《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这部长达一百余万字的著作是在军委张震副主席的热情鼓励及关怀下写成的,由萧克将军题写书名。此书重点研究了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在抗日战争中的相互关系;概述了正面战场的战况和战绩,回顾了成就与过失,还历史以真实面目,借以启迪后人,指导未来。

《交锋》一书以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围绕三次思想解放的过程,把20年来中国改革进程中复杂的交锋呈现在你面前,是一部震撼人心的改革开放史。它贯穿了一条防“左”反“左”的主线,《交锋》中描述的许多事实,是首次在国内披露。

你想知道轰动一时的“皇甫平事件”吗?你想知道令京师震惊的四份“万言书”吗?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69号

邮 编:100045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

本期: 终审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审校 赵友慈

炎黄春秋杂志社 举办羊年新春联谊会

2003年2月17日，炎黄春秋杂志社邀请在京的部分顾问、编委和作者聚会畅谈，副社长方实主持会议，社长杜导正致辞，并向大家汇报了杂志社的工作。杜润生、李锐、曾彦修、于光远、李普、何方、范敬宜、宋木文、钟沛璋、曲润海、刘志琴、冯征、王金锐等先后发言，希望编辑部坚持实事求是、爱国大团结和以史为鉴的办刊传统，与时俱进、不断创新、扬长避短，把刊物办得更好。与会专家学者还提出了许多办刊建议。

出席联谊会的还有（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聪 王 才 王戎笙 王俊义 王春瑜 王强华
方 隍 尹 骐 冯 健 朱厚泽 许人俊 齐明昌
刘 青 刘爱芝 纪希晨 李慎之 李 犁 李维民
李升旗 沈仁干 杨天石 杨克现 杨兆麟 杨继绳
陈大斌 陈四益 陈 模 苏双碧 谷秀敏 张广友
张天来 张文彬 余焕椿 金 凤 官伟勋 林 耀
赵淮青 顾永高 袁 鹰 高 放
殷 毅 鲁 淳 廉 冰 薛德震
薛攀皋 戴 煌 薄会川等。

本刊的 徐 孔 程理嘉 吴 思
刘家驹 庄建平 赵友慈 郝爱存
舒元璋 胡竟成等也出席了会议。



炎黄春秋 YanHuangChunQiu

2003/3 总第132期

- **舆论监督的回顾与探讨**
- **我为共和国经管粮仓24年**
- **冰心一家在共和国的劫难与际遇**
- **牢记“反右派”斗争那段历史**
- **“花生夜间开花”谎言破产记**
- **汉代张释之断案不唯王命**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国内统一刊号: CN11-2817/K

国内邮发代号: 82-507

定价: 4.80元